

專題報導：
災難下的空間與韌性

城

鄉

通

訊

NO.

41

四月號

APR.2026



目錄

編輯室報告

..... 1

專題報導

鏟下一條路：

專訪城鄉所的「鏟子超人」..... 4

當安全成為高牆：

治理知識斷裂下的馬太鞍超級堤防..... 14

規劃專業的實地協力：

馬太鞍堰塞湖災後行動小組..... 22

屋企樓下：香港大埔宏福苑災前災後，

屋苑遊樂場的故事..... 34

教職員動態

為台灣找個未來：彭立沛老師專訪..... 44

多重身份的交織與自省：

康旻杰老師專訪..... 48

校友涸流

在路上的旅人：李易安學長專訪..... 53

跨尺度的空間規劃經驗談：

于欣可學長專訪..... 58

城鄉陸生十五年：訪談錄..... 63

所學會動向

不只是里長辦公室：

學生會主體性與服務期待的拉鋸..... 86

城鄉評論

回望半世紀：

新世代需要/想要什麼樣的城鄉精神？..... 88

活動紀實

馬太鞍溪流域周邊部落

立體地圖製作工作坊..... 94

BP'S PICKS 靈感清單

..... 100

各位讀者好，本期《城鄉通訊》以「災難下的空間與韌性」為軸，編輯室嘗試從不同地方的災難現場出發，追問的不只是建築物的倒塌與重建，更是在這之中，國家治理、民間自救與空間正義之間的拉扯與交涉。

在這一期的四篇專題報導中，我們並排記錄了數個截然不同的現場。城鄉所同學在2025年9月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後，以「鏟子超人」之姿迅速動員前往花蓮光復，鏟土、推車、互助，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在政府失能的縫隙裡，民間的行動力與互助網絡究竟能走到多遠，而「熱心奉獻」與「真實幫助」之間也並不必然對立。第二篇報導關注馬太鞍溢流事件後，所上學生自主發起的行動小組，也積極思考著「規劃專業能做什麼？」，從起先扮演資訊轉譯到的角色，到實際走入災區，陪伴居民一同關注重建議程。第三篇報導，把目光轉向原住民族土地徵收課題，透過個案叩問，在法規之下，原住民族的空間權益如何在以安全為名的堤防工程中遭到逐步蠶食。第四篇稿件越過臺灣海峽，聚焦香港大埔宏福苑，2025年11月的一場大火奪去168條性命、逾千戶失去家園，作者霍漢橋追問：在例外狀態的運作下，一座遊樂場的消失如何折射出居民主體性的萎縮，以及當前香港公民社會在重重限縮之下，仍以微小行動回應的那一分韌性。

在教職員動態的單元，我們同時訪問了彭立沛老師與康旻杰老師。現任職國發會副主委的彭立沛老師，帶我們進入地方創生政策的實際運作，從審議流程、青年培力到他對臺灣生育率、糧食安全與高科技發展取捨之間的深刻憂慮，勾勒出一位規劃者對「我們要留下什麼樣的未來」的持續自問。而即將卸任所長的康旻杰老師，則在訪談中重返他三十年來介入都市聚落保存的田野，談及從剝皮寮、寶藏巖、蟾蜍山到桃園過溪的每一段「看似沒有路、再找路」的過程，以及他從意向化社區、都

市生態交錯帶到「自體都市再生」的理論探索；訪談的末尾，他也坦率談起身兼規劃者、學者、所長與照顧者多重角色的重量，以及面對田野不足的自省。

校友洄游這期邀請到了兩位個性鮮明的校友。早在進入城鄉所之前已遊歷各國並擅用地圖說故事的李易安學長，以外媒駐台記者身份重訪公館樓，他以「移動」作為串連畢生興趣的公約數，從搭便車的民族誌到晶片地緣政治報導，談及拋棄的自由、邊界的魔力，以及為何他認為自己整個人生都還在同一趟旅行裡面。于欣可學長目前擔任荷蘭臺夫特理工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我們越洋連線與他聊起城鄉所的啟蒙、溪洲部落的參與式規劃實踐，以及他長年研究後的核心追問：參與式規劃的「效果」究竟是什麼？學長以工具箱與工具集的對比提醒我們，規劃者不只要會使用工具，更要懂得在工具之間穿梭，看見不同尺度下彼此連動的效果。而活動紀實方面，本期也記錄今年228連假於花蓮糖廠舉行的模型工作坊，在陪伴在地一同製作的過程中，更加認識家鄉的土地也刺激了對於新生活的想像。」

此外，本期也收錄了「城鄉陸生十五年」的訪談錄，在陸生政策走入歷史之際，十位返回故鄉的城鄉所校友一同回望：當初為何選擇來到這個「專門製造抗爭的系所」，城鄉所的批判視野與參與精神，又如何在各自的職涯與田野中被轉譯、實踐或消磨。林玟圻的投稿，則為城鄉五十的節點留下了「城鄉所繫」旗幟的發想緣由，是一份關於這四個字如何凝聚不同的想像、又如何讓城鄉所在街頭上重新找到位置的文字見證。

這期的稿件讓我們看見，不論是在光復市街的淤泥裡、宏福苑遊樂場的廢墟旁，空間的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NO.41 APR.

創辦人	畢恆達
發行人	康旻杰
指導教師	王志弘
本期主編	宋燁博
封面製作及美術編輯	宋燁博
文字編輯及排版	宋燁博、林彥彰、紀懷超、 張維哲、曾曉渝

(以上按姓氏筆畫排列)

投稿請洽：thentunews@gmail.com

失去與重建，從來不是純粹的工程問題，而是關乎誰能留下來、誰被迫離開的政治問題。在災難的各種現場中，仍有人頑強地鏟土、繪圖、立旗、述說，這正是城鄉所「繫」的所在。敬祝讀者們閱讀愉快。

城鄉通訊編輯室 2026.04





鏟下一條路： 專訪城鄉所的「鏟子超人」

◎ 撰稿：張維哲 | 受訪人：張博鈞、張哲誠、林辰韋、王翊慈、李誠、陳曄、黃允則

2025年9月23日，在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後，對花蓮的光復鄉產生極大的災情。短時間內的大量泥水衝入家園、人員撤離不及，造成部落極大的破壞，其中，最顯著的破壞莫過於溢流事件後光復街道上所覆蓋的大量泥巴。面對此般情景，臺灣許多民眾湧入災區協助救災，因為清理大量淤泥需要鏟子，因此這群熱心民眾也被稱作「鏟子超人」。在城鄉所，也有同學們在災害發生後快速籌組相關行動，前進當地協助救災。這期專欄，城鄉通訊團隊也訪談了幾位前往當地救災的同學，他們在災害發生後的一到兩週迅速地準備並行動，在當地最需要大量人力協助恢復的時候積極投入。這群人或許有著不一樣的原因進入當地，或許在當地有不同的行動路徑跟救災經驗，但這種盡己所能互相幫忙，卻是我們在訪談過程中能夠深刻感受的。

本期通訊，我們分別訪問了R13的林辰韋、張博鈞、張哲誠同學、以及R14的王翊慈、黃允則、李誠、陳曄同學，這七位同學都在災害發生初期就投入災區救災，而我們也從動機開始問起。

動機：起身動念的那一瞬間

博鈞是土生土長的花蓮人，當我問起動機，他沉思了一段時候後跟我說「就是自己的花蓮，就去幫了」。那個時候，剛好遇到所上在募集物資，所以想說跟也有意願去花蓮幫忙的哲誠一起行動，協助物資的運送也藉此去當地幫忙。博鈞一幫就是六天，這六天他開著家裡的車，盡力地載著志工、物資來往花蓮市區與災區現場。哲誠在2018與2019年的暑假曾經在光復工作，在當地住過四個月的他，看到發生嚴重的災情後心中也有許多感觸，看到有朋友因此受災，更讓哲誠想要幫忙。「那個時候受到朋友的照顧，所以在想可以投入一己之力幫忙」。

辰韋跟允則都是東華大學的校友，回憶起為何要去救災，他們都首先跟我說到在東華的經驗。辰韋聯想到了2024年的花蓮地震，當時還在東華的辰韋看到很多老師與同學的研究室、房間、系館都受災慘重，他想起當時要協助老師收拾研究室時的寸步難行：「我們首先要清出一條路跟確認物品該如何處理」。也因此，看到馬太鞍的溢流災情時，辰韋就很想衝過去現場幫忙，畢竟「人類應該要人溺己溺」。溢流發生時的允則，則是剛進入碩班、離開花蓮不久，事件發生後，允則就聽到了東華的學姊在救災上面找不到人協助，因此允則就開始在實習課的課程群組中詢問有沒有同學要一起加入，於是，允則就這樣找了同屆的翊慈、陳曄、李誠一起前往救災。

「那個當下我覺得我很行動派」。回想起當初決定救災的動機，翊慈跟我說，一開始確實被大量的報導跟畫面所影響，促使他想要「做些什麼」。剛好適逢所上的同學有在募集幫助馬太鞍的物資，當時就開始想著自己有什麼方法能夠盡到幫忙的心力，剛好收到允則的訊息，就這樣決定加入。「翊慈是一個契機，他把救災講得很像是想要去就可以做的事情」陳曄也回憶起一開始想要投入的理由，或許是被翊慈的行動力所感染，但另一方面，他同時也瀏覽了許多社群軟體，發現要前往救災其實不用加入一個特定的組織，而是可以具有彈性地安排，「而且看到新聞畫面覺得那邊真的很需要幫忙」。李誠則是跟我說「就是一個衝動，我當下就覺得我一定會做這件事，有人一起去的話就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就這樣在允則的詢問下，大家很快地訂好住宿、確認時間並出發。





▲ 光復車站前充滿鏟子與雨鞋

事前準備：成為「可靠」的志工

但從確定出發到抵達當地的這段時間，同學們也沒有閒著。災害發生初期，物資狀況仍然浮動，出於擔心自己的前去造成當地物資提供的壓力，或是準備不充足反而造成麻煩，同學們也透過各種管道提前準備。辰韋、允則、李誠都回憶起那個時候一直在四處「找雨鞋」，他們跑遍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李誠也跟我說他的準備原則：「我會設想很多可能性，我那時準備了很多塑膠袋，我接受到的資訊是地方不缺物資、是缺人，因為物資有更大的團體發送，去的時候就把自己的東西準備好，不要拿到當地的物資」。後來辰韋也跟我說，事後才知道很多雨鞋都被買去花蓮，所以他那時的準備就只有帶齊救難包。

翊慈則是在出發前在臉書社團瀏覽過大量資訊，這些社團內有當地志工告訴大家當地狀況與需求，並且會告訴你如何做個人的準備。「因為這樣才能知道你當下要去哪裡」，翊慈認為出發前看資訊非常重要「做好這些準備才可以好好地幫助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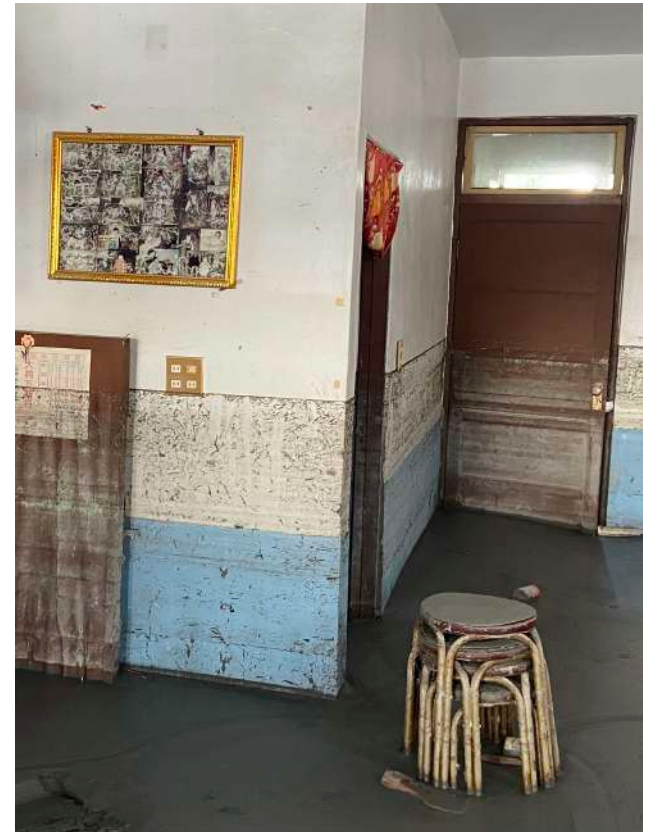
辰韋也與我分享他當時所關注的平台「鏟子英雄」，這個平台將災區相關資訊整合，用圖面的方式呈現出哪幾戶、哪些地方需要志工幫忙、哪裡可以休息與補給。當然，辰韋也透過東華朋友的社群平台，掌握各種交通、現場狀況等資訊。

前面提到的所上募資小組當然也緊鑼密鼓地籌備，哲誠想到一開始為何籌備募資小組，其實是來自於陳亮全老師的課堂上，剛好講到了防災與安全的議題「博鈞是在地人、維嫫想要募資，所以很快就籌備起來了」。因為人力有限，所以募資小組其實沒辦法攜帶體積過大或是數量過多之物資，因此團隊以成人紙尿布、女性衛生用品等關鍵物資為主，向所上的同學老師開啟募資，再藉由哲誠、博鈞的幫忙，讓物資能夠順利地抵達災區的重要物資節點--光復糖廠。

志工出發：面對災區的泥濘

所上同學出發協助的時間以及天數都各有不同。哲誠與博鈞選擇開車從花蓮前往光復，當時交通情況尚未明朗，因此他們選擇從海濱慢慢開往光復。但隨著越來越接近災區，路況也呈現越來越混亂。博鈞回想車子翻越海岸山脈後，由上往下看到被泥水所覆蓋的災區，「很明顯肉眼可見，一大片的土地被覆蓋掉」，同車的哲誠也表示：「剛看到這副景象，從山上俯瞰過去都是一片泥濘，感覺很難過，有種一切的樣貌都變了的感覺」。

「開車過去的時候，會很像戰地，都是軍人在指揮就在想之後打仗會不會也是這種情況。到處都失能的狀況，就是有種戰時的感覺，軍人接管所有道路，沿途都是軍人跟憲兵」。博鈞回憶到那個時候，光復市中心的物資中心詢問，並加入在地協會的群組，也是透過建立聯繫才發現，其實災害初期很多資訊都還很混亂。辰韋則是在災害發生初期搭火車抵達光復，他與我描述「那個時候進入災區很像小白的狀態，只能一臉茫然的不知道要幹嘛」。但在光復車站前已經有慈濟等團體進駐，因此辰韋也在車站前廣場領取了面罩、護目鏡、袖套等「新手裝備」，當然，這時候也發現了車站前有大量的二手雨鞋，原來在臺北買不到的雨鞋都出現在這裡了。他與我描述火車站如何作為一個重要的人員、物資節點：「出車站有台鐵人員指揮引導，走出來就看到紅十字會、慈濟等團體組織，其實是很有機的各自組成，不是很核心的協調」。



▲ 災區家屋內部，牆壁可見水淹高度。

陳曄、李誠、翊慈與允則一行人則是選擇直接搭乘火車前往光復。陳曄回憶起在火車上的印象，搖搖晃晃的火車上，只要從下面往前看，就可以看到「跟樹林一樣密密麻麻的雨鞋，我從來沒有看過在火車上有那麼多人要做同一件事」。走出車站後，一行人更被眼前的景象震懾：漫天的泥沙與沙塵捲起，地上都是乾掉的泥巴。陳曄跟我說：「當下的感受很難形容，就是很像戰爭後的場景，或是很像在世界末日，呼吸的時候都有感覺到空氣雜質，大家都戴著口罩」。從光復糖廠一步一步走到市區的哲誠也提到，越靠近市區，泥濘就讓人越來越難以步行，加上淤泥的臭味蒸騰，讓過程更加難受。博鈞想起第一天跟哲誠徒步的經驗：「一下橋就很難走，那天跟哲誠卡在土裡卡了好幾次」。

專題報導：災難下的空間與韌性

但在這樣的環境，李誠也觀察到，其實走出車站就可以看到很多搭好的棚架，代表著許多團體組織都已經進駐。「其實現場是很有秩序的，不是各做各的事情，一出去就有很多物資發放，所以光復物資是足夠的，因為都可以給鏟子超人」。在慌亂的災區現場保持的秩序，陳曄以公民社會來比喻那時的所見所聞：「好像看到『公民社會』很強大的組織能力，變成很多官能的有機體，組織很完善、要什麼有什麼，譬如想要擦臉上的泥巴就有濕紙巾、想擦雨鞋就有人拿水來」。相較於對於災區印象中的混亂與資源稀缺，由於大量的人力與物資在短時間內湧入，光復的大家也展現出強大的韌性，透過不同組織，在不同的救災崗位上發揮效用，用最快的時間達到人力、物資的分配最大化。

拿起鏟子：成為超人的身體養成

在水災淤泥影響範圍廣大的當地，同學們又是如何開始展開救災行動？辰韋說起第一次抵達光復時，當地派出所剛剛恢復運作，他一開始在光復市區漫無目的地走著，想說哪裡有需要幫忙就會被招下來，後來，辰韋來到一家機車行幫忙清理淤泥。哲誠則是在糖廠協助完物資調度之後，也來到市區，但他後來得知，許多獨居老人的家戶區都很需要幫忙，因此哲誠更是有目的性的前往獨居老人分佈較多的街區幫忙。陳曄、李誠、翊慈與允則一行人下了火車後跟著人流走，他們觀察到大家都要走到受損比較嚴重的街區，人們才會開始分散幫忙，因為當地的各家房屋都很需要人力協助，接著一群人進入了一家民宿協助鏟土。相較於大家逐漸在災區找到協助的對象，博鈞則是全程專注於協助親朋好友清理家園。



▲ 光復車站前作為物資與人力的重要節點

同學們對於「鏟土」的共同經驗，莫過於他是一項看似不斷重複，但在過程中卻仰賴自身對肌肉、施力的不斷調整，才能讓身子能夠承受數個小時的勞動。尤其是在部落所面對的泥土並非局部分佈，而是整個街道遍佈，哲誠與我分享：「挖土的過程腰痠背痛，因為當你清出自己家戶的泥土的時候，隔壁的也會清出來，這個時候，隔壁的泥土反而就流回去你幫忙的那戶」水往低處流，泥漿也是，因此同學們要克服的不僅有身體上的勞累，更要在其中發展出鏟土的策略。像是哲誠後來就發現了工具的使用差很多，譬如災區常見的圓鍬或是鐵鍬「效率就有差，施力點也不太一樣」，所以在每次「看似」重複的挖土、鏟土的動作中，哲誠慢慢地找到適合的工具、最省力的角度。

另一方面，救災當然不是單打獨鬥地鏟土，還需要志工們的協助配合。辰韋在光復重災區佛祖街救災時，就體會到了災區彼此配合的井然有序，「一排的人彼此互相分工，前排的人鏟前面的土、後面的人接力把土運出去。那個時候在搬一個很大的木櫃，大家雖然互相留意幫忙跟提醒，但當下還是九個人花了很多的力氣把大櫃子搬到旁邊去，那個時候就有人被木頭刺傷，大家就呼喊醫護組：『哪裡有救護人員？』喊完就有人跑來進行包紮急救。」所有人都在為了清理災區而共同努力並各司其職，一個人接著一個人試圖把救災的效率最大化，辰韋的經驗中，救災的現場其實更存在著許多的互相照顧「我反而是慶幸的，因為馬上就會有人能察覺到你的工作」也因此，辰韋也對於救災的經驗很感動「雖然這種分工方式很土法煉鋼，從鏟土接力到長途的像傳烽火一樣地傳遞訊息，是讓我很感動的部分」。

陳曄在幫忙時也有類似的感受，他想起了一開始協助時，就有志工在一旁說明如何做事情跟使用工具：「好像是不同器官，各自負責很多工作，像是推推車、刮土、鏟土等等」。推了很多趟推車的允則也接著補充，他發現這個分工互助的網絡不只出現在志工之間，連國軍也一起加入：「推推車好幾趟之後，國軍就有挖土機把門口的土挖走，我有種被信任的感覺，因為國軍都知道這裡有志工挖土，所以他們會去做其他譬如搬運的工作」這也能看出，面對龐大的受災範圍，各種救災單位需要的是互助的網絡，志工往往用人力、勞動與工具替人力不足：大型機具無法深入的民宅由志工清理，接著再由國軍用挖土機將志工們清出來的泥巴清運走。

跨單位的彼此協力，也讓災區能夠復原，博鈞與我分享，第一天讓他腳一直卡在淤泥中的道路，在三到四天後就可以看到原本的標線了。在災區待很久的他，也看到各縣市的災防組織前來協助：「各個縣市調度過去的重型機具幫助很大，因為第一天去就看到臺北市的機具跟人力在花蓮幫忙，後來也有看到宜蘭縣、屏東縣還有一些西部縣市，在一些民眾一開始不能去的災區，譬如佛祖街，主要人力都是軍人跟各縣市救災隊」。

在救災過程中，志工要面對的是在泥濘中行走的耗力，以及鏟土與推土過程的身體勞力，如此勞力密集的工作，若不是有當地緊密的志工、國軍等協助網絡的建立，單靠單打獨鬥恐怕很難成事。第一次進入災區，剛開始或許志工們都在學習，但在勞動過程中，透過動作與工具的轉換、其他人傳授教導或默默的心領神會，每個人也在災區找到了自己能夠協助的位置。



▲ 充滿污泥、蹣跚難行的災區街道



▲ 在地居民提供私宅給志工休息並成為中繼站

超人也會累：面對疲倦的調適

挖土、鏟土、推土，都是高度勞累的工作，更甚至要面對的是被淤泥所佔據的災區。志工們的疲倦與感受也是需要被理解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也是救災的一部分。同學們大多與我表示，當時的勞動高度密集，反而當下沒有太多的情緒波折，反而都是事後回想或是休息時觀察環境，情緒才逐漸湧現。

主要在重災區佛祖街幫忙的辰韋事後回想：「其實當下只覺得佛祖街蠻臭的，當下沒想那麼多，因為想說災區應該什麼味道都有，但直到傍晚要撤離時才從一起撤離的人們發現，其實剛剛有挖到的屍體，我才發現剛剛可能是死者的味道」於是，當下的辰韋開始覺得心有餘悸，原來自己跟死者離那麼近。陳曄也說了類似的經驗，當他們在休息時，觀察到某個車庫的淹水線，當地幫忙的阿姨才隨口告訴他，這戶人家裡有位長者就是這樣沒撐過去，「你能想像這麼濃稠的泥水，淹得比你高，你能想像這種恐懼嗎？」。

除了震懾、恐懼的情緒，同學們也開始回想當志工的原因以及當下幫忙的感受。翊慈想起救災當下做的事情都很重複，但看著淤泥漸漸被清除「能看到他漸漸地變好，莫名的有種讓心定下來的感覺，之前在臺北看著這些災害的影像，到了光復之後，才有種終於能做些什麼的感覺了」。在重複的勞動中，李誠跟我分享挖土、鏟土的過程「其實很辛苦，泥土比想像中的還難挖，依照我們的體能都沒辦法直接地往下挖，很像是整個身體在對抗泥土，但在過程中會很快地去轉換身份、知道一些救災細節，大家就會去想不同工具來幫助救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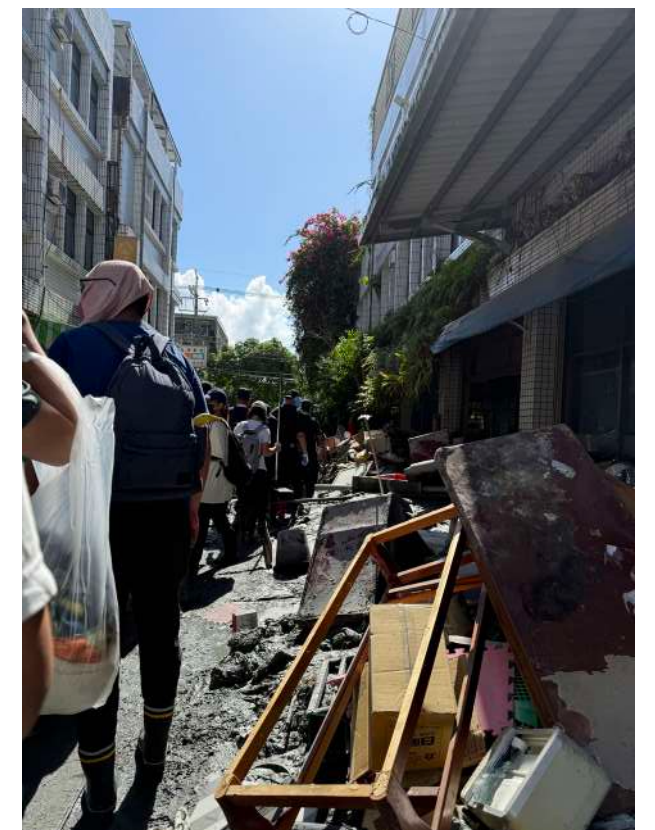
但除了對抗泥土之外，或許同學們對抗的還有救災的動機，以及大家如何看「鏟子超人」。李誠接著說：「在挖的當下會忘記辛苦，因為很像是機械式地一直挖，過程中就會忽略掉了身體的痠痛，我很享受在勞動的過程中，能夠感受到平靜，但又讓我想到很多人會說『我們去挖泥土是不是一種自我成就、自我感動、自我滿足？』」。李誠所說的，是網路輿論上有些人會認為鏟子超人的大量湧入，其實造成了災區很大的負擔，並且許多人的動機都是來自「自我成就」彷彿去了那邊就能夠有完成某件事的成就感。

李誠認為：「（自我成就）一定有這樣的成分在，這可以被理解成我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只是在這個過程中能不能幫助到他人，這本來就是並存的」。據此，陳曄也接著說「我們本來就要去互助貢獻啊，譬如自我的實現可以幫助到別人的，而且這不只是自我感動，更是大家一起感動」。辰韋也認為整趟救災存在著共同的感動：「蠻開心在台灣社會能夠一方有難、八方來助。在這次旅途中，來回都會遇到這種很臭很髒的時刻，因為我知道大家為什麼流汗、大家為什麼髒，因為我們都在光復一起救災過。」

感動之外：救災的見聞與反思

除了感動之外，在過程中，同學們也持續地觀察災區，譬如哲誠就看到了不同移動能力下避難的不對稱，根據哲誠描述，當時災區誤傳「第二次的水來了」，哲誠也跟著人群往某戶人家二樓避難。但那時他卻發現，那戶人家有個阿公遲遲不上樓，此時，他的女兒跟現場的大家都開始慌了，著急的呼叫著阿公一起上樓避難。後來，哲誠也發現「他是很在意他們家的東西可能會被沖掉，所以他是堅持要確定好所有東西、門關好、東西收好，才會上去避難」。哲誠與我說，很多長輩都很難請他們避難，因為他們都會帶入自己「家」的環境來思考，若是沒有這個家，災難之後長輩也沒有地方可以去，因為這個地方他們住一輩子了。這個長輩避難的故事，也可以使我們思考如何跟長者溝通防災，並且看到長者實際上的需求與想法。

陳曄、翊慈、允則與李誠一群人則是在幫忙的時候看到了部落之間存在物資、人力與資訊的分配不對稱。在救災結束後，翊慈與允則接著投入所上黃舒楣老師所開設的高階實習，持續用不同方式關注馬太鞍。在課程過程中，他們也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觀點以及在災害中被忽略的小部落，翊慈與我說：「救災的經驗帶我看到的是災害發生後的場景，高階實習後就開始看到更大的範圍，知道了那個時候沒有關注到的小部落位置在哪、去聽到他們為什麼被忽略，而這能夠幫助對大環境的理解」，他用兩種不一樣的方法，同時關注光復這個地方。允則也跟著補充，他認為馬太鞍的災情不僅有溢流的問題，在經過高階實習後，他認為這場災害更與基礎設施部署、人為發展有關。「沒有後來的高階實習，也沒有辦法看到小部落的處境」。後來也有加入高階實習的哲誠也覺得課程讓他用不同的角度對災害進行調查。



▲ 充滿志工的災區街道

專題報導：災難下的空間與韌性

博鈞看到的則是治理體制下的「失能」。他透過在花蓮郵局工作的朋友得知，災害發生這幾天，其實花蓮市的郵局塞滿了全國各地的物資，但在災區待過的博鈞卻發現，其實物資調度存在著落差。「花蓮市的物資送不到光復鄉，送到光復後的東西又卡在糖廠，所以能不能送到災民手中就是未知數。9月26號的時候，物資中心就說滿了，花蓮的郵局也都吃不消了，所以很多人在網路上說便當放到臭掉，那都是在光復糖廠那邊，蠻多物資就這樣被浪費掉」。此類人力分配與物資調度的問題，也反映在他的救災經驗上，博鈞說，他在光復糖廠晃一晃，就會被塞很多食物，但在災區其實水跟食物都很有限。「有天中午我去糖廠找吃的，剛好遇到花蓮縣的議員，他就提了好幾袋便當塞給我一大堆，我就想說不對啊，災區的人要怎麼辦，我其實也吃不下了，我就拿著便當走到災區看有沒有人要」。後來博鈞也持續觀察，發現在光復糖廠、花蓮市郵局的物資不缺，但到了災區卻人人說缺乏物資，代表著物資分配與運送出了問題，「我在光復糖廠拿的時候就都有（物資），但光復人就說很缺，因為他們在家裡也不方便來糖廠，這六天有送水跟便當的也都是民眾自發地去」。



▲ 充滿志工的光復車站月臺

在結束救災後，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關心著當地，並跟更多人傳達災區訊息，同時回憶過程持續反芻。除了允則、哲誠、翊慈加入舒楣老師所開設的高階實習外，陳曄回來後，鼓勵身旁的人若有意願當志工，可以去更多偏遠的部落協助，來讓資源跟人力的分配能夠盡力補足，這股「想做就做」的精神，他跟我說：「為什麼覺得可以直接去救災，還要去更偏遠的地方？因為有太多管道可以知道很多訊息了，所以才會想要用『走』的，把網絡中沒關注到的補起來」。辰韋則是在回程的隔週再次去花蓮救災，兩次的經驗讓他覺得災區有越來越恢復的感覺，他觀察到第二次去的時候，協助運送物資與志工的「小蜜蜂」貨車越來越多，也象徵著災區的交通能力在逐漸恢復。持續掛念災區的辰韋，在剛剛提到的鏟子英雄平台停止運作後，才更放下心：「連平台都完成任務，就比較能夠放寬心」。

隨著救災漸歇，「重建」才正要進行，這是一條漫長的過程。對於整個重建過程來說，鏟子超人或許只是初期協助復原的一環，但城鄉所的這群同學在協助救災後更是用不同的方式持續關注並繼續投入，搭建起的是持續運轉的協力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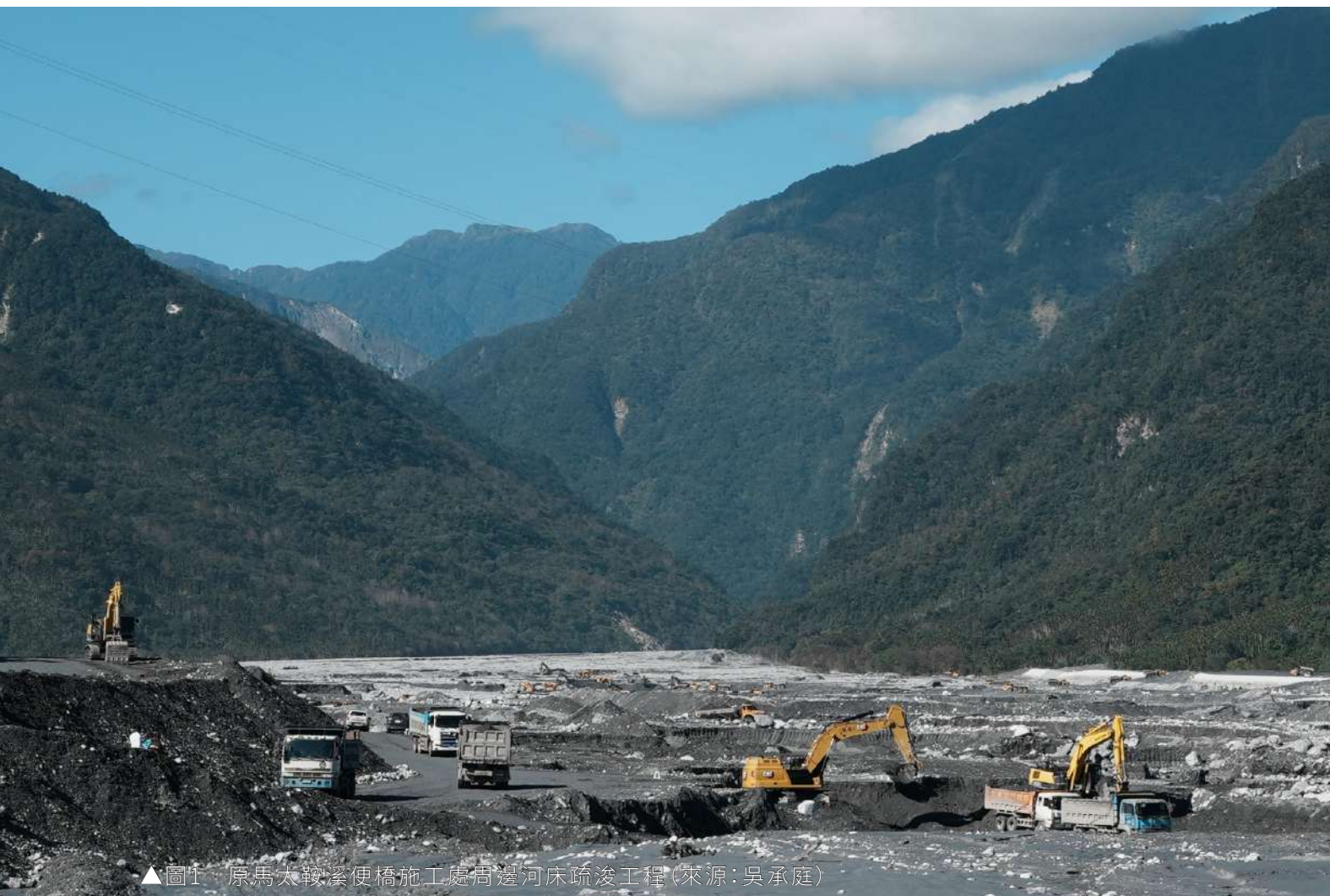


▲ 允則、陳曄、李誠、翊慈一行人與其他志工合照



▲ 志工、國軍協作進行救災

圖片提供：張博鈞、張哲誠、林辰韋、王翊慈、李誠、陳曄、黃允則



▲圖1：原馬太鞍溪便橋施工處周邊河床疏浚工程（來源：吳承庭）

當安全成為高牆：治理知識斷裂下的馬太鞍超級堤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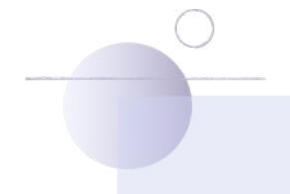
◎ 撰稿：李晨瑜、林妍伶 Sera·Mika | 編輯：紀懷超

一、序：堤防作為災後安全設施的象徵

2025年9月23日，花蓮的馬太鞍溪上游發生多次堰塞湖溢流，30分鐘內約1540萬噸的高含砂水流從壩體流出，越過下游南岸堤防，沖向沿岸數個村落。事件發生初期，「鏟子超人」撐起了媒體與大眾對災難的關注，接續登場的，則是傅崐萁委員、花蓮縣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政治角力。這些充滿戲劇張力的畫面，將馬太鞍堰塞湖事件推向新聞討論的高峰。也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災後現場那些脆弱、殘酷且持續發生的真實處境。在這些感謝民間力量或政治陰謀論的討論熱度過後，已經很少有人再去計算，今天究竟是災後第幾天。

時至三月底，仍有超過2億立方公尺的土砂堆置於光復。被抬高四、五十公尺的河道與懸河，依然橫亙於地景之中，影響範圍內許多房屋仍以維修狀況不一。在事件發生後約三個月內，各村落內的房舍、廟宇、農具室等構造物仍然無法使用，居民們也時常要擔心屋內財產或是殘存的鐵窗遭偷竊。在新聞熱度過去後的現在，即便光復市區主要街道已經逐漸恢復商業活動，許多房屋也修繕完畢，但若將目光放到距離較遠的村落，仍然能看到許多受損的房舍，至今無法真正修繕。可見災害事件並不是時間軸上一個特殊的時間點，這次事件在水退了之後揭露了許多政府與民間在溝通、規劃上的弊病。這些現實問題就如同灰濛濛的土砂一般，以另一種更抑鬱、更慢、卻更深刻的方式，持續留在居民每日面對的生活空間裡。

2026年1月12日，由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副主任委員谷縱·喀勒芳安 (Qucung Qalavangan) 主持的「馬太鞍堰塞湖災後復原涉及原住民保留地徵用(收)、撥用或以地易地相關權益座談會」，邀請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等相關單位到場說明。在各機關報告結束後，一位族人哽咽著舉手發言：「你們還在那邊講條文，還在講規則，想辦法幫幫我們嘛！我都60幾歲的人了！啊各位，我還有幾年啊，我應該奮鬥幾年啊！」可見政府機關溝通的方式難以回應當下受災族人的需求。這兩方就像是接不起來的列車，時間一分一秒前進，但對居民來說災後的生活，仍然凍結在第一天。



這已經不知道是第幾場政府機關到光復舉辦的說明會。早在2025年10月30日，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便於阿陶莫部落的說明會中，首次提出「超級堤防」的構想。第九河川分署表示，在堰塞湖潰堤後，將先完成河堤修補，其次進行河道疏濬，最後興建開口堤加以銜接。為了提高防洪高度並加固堤防安全，預計於民國115年完工的新堤防，全長將達2500公尺。對國家而言，堤防是災後秩序重建最具體、也最可見的象徵，它意味著國家治理能力的展現，同時得以對地方再次給予「安全」生活的保障。

然而，當居民在現場提出最直接的問題：「有堤防就安全了嗎？」在座的官員卻無人能給出明確回答。看似是為了回應「不安全而出現的龐大工程，卻未必能真正回應人們對安全的疑慮。」

二、問題意識：缺乏信任「基礎」的安全「基礎」設施

堤防既是防洪構造物，也同時承載與維繫著國家對人民生存安全的承諾。透過工程技術，河流被框定、洪水被計算、風險被量化，自然成為可管理的對象。在「透過工程技術控管自然」的思維之下，雖將政府承諾具象化、創造出得以安全生存的空間，卻也改變人與河水相處的關係，如同過去日本殖民政府在南岸興建堤防，藉此製造出遷居原住民的理由加以管控；90年代興建的北側堤防，也透過改變河流方向創造土地的耕作與開發機會，逐步塑造出人們對安全與發展的想像。

專題報導：災難下的空間與韌性

然而，人類工程技術有其極限。當極端氣候、土砂移動與河道變異超出既有治理體系所能掌握的範圍時，原本建立在基礎設施之上的信任關係便可能崩解。2025年9月23日的災難，印證了原本被視為穩固的堤防，其實並不如想像中無懈可擊。這種斷裂，不僅出現在工程以及對堤防的安全信任上，也體現在政府單位與民眾之間的信任關係中。

基礎設施這樣一套由人、技術物、制度、預算、知識與政治決策壓力下共同構成的網絡，堤防除了本身發揮的技術效果外，在災害風險危機下更能發揮出政府有在保護、重視此處的作用，災後的超級堤防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被提出。對水利單位而言，面對社會壓力、政治追問與預算執行的時程，最有效、最可見的回應方式，往往就是透過大型工程快速重建秩序。巨大量體的堤防成為國家面對治理焦慮時最方便的工具。

問題在於，這種透過工程建構起來的安全感，未必真能被地方居民所共享。對剛經歷災難的人而言，超級堤防的保護效果未必能隨即被感知，而更可能是一個陌生、巨大的、壓迫性的存在。它矗立在原有的生活空間之中，改變地貌、切斷視線，也提醒人們災難仍未結束。於是，超級堤防所創造的安全感，其實帶有至少兩層矛盾。首先，居民並沒有真正的選擇權，只能接受這座堤防的存在；若他們日後對其產生某種安全感，那也往往是建立在無法拒絕的前提之上。其次，專家與居民對於「安全」的理解本身並不相同。工程單位相信的是防禦率、重現期、堤高與流量計算，地方居民感受到的卻是視覺上的威脅、土地被切割的失落，以及對未來仍無法確定的焦慮。

也就是說，國家所想像的超級堤防是一套可以馴服自然的技術裝置；但地方所面對的，卻是一個截斷視線、改變環境感知、並重新劃定生活邊界的異質巨物。這種對安全不同想像，構成本文試圖追問的核心：災後快速拍板定案的超級堤防，究竟是給予安全承諾，還是在生產另一種新的不安？

三、被高牆截斷的記憶：馬太鞍溪南岸的治理與生存

一月初的週末早晨，馬太鞍部落青年 Kulas 帶領城鄉所災後行動小組進入馬太鞍溪現地踏查。河床上，數十輛挖土機與卡車持續運作，機具轟鳴與揚起的塵土，標示著災後工程仍在推進（圖1）。Kulas指著河床：「這塊原本就是沖積扇，水原本就是會一直移動，但是堤防蓋好之後，水就被侷限住。」對族人而言，河道的變動是馬太鞍溪自然運作的一部分。沖積扇的形成、河道的遷移與洪水的漫流，都是族人長期觀察土地與水文後所累積的地方知識。這些知識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來自長時間與河流相處的生活經驗，是人們理解風險並調整自身行動的重要基礎。

相似的地景知識也存在於其他族人的生命經驗之中。Sakafiyaw工作站的Dongi ina 回憶童年時提到，族人過去會在河道上搭建「半年橋」，亦即一座預期在每年汛期就會被沖毀的橋。橋的暫時性並不意味著工程失敗，而是一種順應河道季節性氾濫的生活安排。族人也會依據河川氾濫的特性調整農作配置，例如在容易淹水的區域種植地瓜或西瓜，而將其他作物移至較為穩定的位置。「水會走水想要走的路」，在這樣的生活邏輯中，河水不只是災害，也是環境動態的一部分；人們不全然以對抗的方式面對河流，而是透過彈性的土地利用與生活安排，與自然維持某種共存關係。

然而，這樣的關係逐漸轉變。日治時期以來，殖民與國家治理逐步透過治水工程重塑馬太鞍溪的空間秩序。殖民政府為了統治與管理的需要，將原本居住於較高地勢的族人遷往平地，並以保護居民安全為名興建南堤，開始改變馬太鞍溪西側的河道走向。到了1990年代，政府為推動「鳳林綜合計畫區」，又在馬太鞍溪北岸興建長約9公里、寬50公尺的大型堤防，使原本具有寬廣腹地的河道被大幅壓縮。《我們的島》的調查指出，1948年的地圖顯示馬太鞍溪河道寬度約為2690公尺，而堤防興建後，主要河道寬度僅剩約400公尺。原本依賴氾濫區作為洪水緩衝空間的水系，因而失去了調節的彈性，也同時改變了族人既有的生活領域與空間配置。

因此，馬太鞍堰塞湖事件後的「超級堤防」，並不是單純中性的防洪設施，而是延續既有治水邏輯的另一輪強化。水利署規劃於馬太鞍溪南岸興建寬50公尺、高10至12公尺的堤防，並於第一道堤防後方設置第二道防線。這不僅是河川治理技術的加碼，也意味著土地使用的重新分配與部落空間的再度切割。為取得堤防所需用地，政府擬徵用原住民族保留地，使土地徵用（收）成為2026年1月12日說明會中的核心爭議。對世代居住於此的族人而言，這兩道堤防是政府透過工程治理技術，單方面地改變與重新劃定部落邊界再次壓縮既有的生活空間。

面對土地權益可能受損，在說明會中族人提出希望能使用兩道堤防間的空間，以維持既有生活與生產方式，卻被相關單位以「不符合法律規定」回應；族人提出「以地易地」作為替代方案，水利署則回覆「無法可依」。這些回應顯示出，現行制度並未準備好處理災後重建中涉及原住民族土地權益與生活延續的複雜問題。國家對土地的理解傾向將其視為可被測量、切分、徵收與配置的治理空間；然而，對族人而言，土地則是與記憶、勞動、親屬關係與歷史共同交織的地方。當重建被限縮為基礎設施的修復與強化時，地方社群所擁有的空間知識與生活邏輯便被排除在治理之外，災後復原也可能因此轉化為另一種形式的治理暴力。

註 1：ina 為阿美族語對女性長輩的稱呼。

註 2：有關鳳林綜合計畫區以及北側堤防興建前後對照，可參考公視我們的島採訪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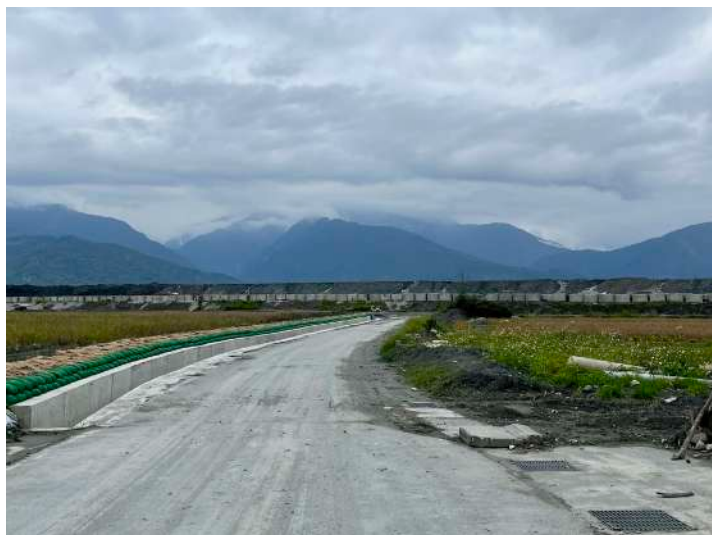
<https://ourisland.pts.org.tw/content/11904>

四、多重感官的地景危機——專家轉譯失靈的現場

災後的地景與人的感官認知是會不斷被工程作業所改變的。2025年11月，筆者第一次到 Atomo（阿陶莫）部落時，曾站在十字路口遠眺馬太鞍溪。那時堤防上已有許多工程車輛往來移動，冬季陰鬱的天空與堤防、農田上的灰色土砂幾乎快要失去界線，只有黃色工程車在灰色背景中顯得格外突兀（圖2, 3）。那種景象很難只用「施工中」來概括，整體地景被災後工程全面佔據的狀態，顏色、聲音與來往大型工程車輛所揚起的粉塵，一再提醒著災害已發生的事實。也許對我們這些一個月去一次的人來說，每次都是一種震撼，但對當地的居民來說，這些改變造成的



▲圖2 2025年11月Atomo的堤防工程進度



▲圖3 2026年1月Atomo堤防工程進度

感受，早已被更多的生存現實壓力蓋過。

同一時間，第九河川分署正在部落舉辦堤防工程說明會。技師們對著地圖與工程圖，快速使用大量從未聽過的技術名詞，向台下的族人解釋「超級堤防」的未來模樣。然而，前來參與的年長族人並不急著回應施工細節。他們真正關心的是：上游的堰塞湖何時可以處理？能否保證未來汛期不再淹過農田？超級堤防是否真的能保障生命財產安全？這些問題不是技術人員可以回應的，但卻是災後居民們最真實的關切。

到了2026年3月，我們再次來到 Atomo 參與縣管河川的堤防施工說明。河川周邊的土地所有權人幾乎都到場了，他們帶著施工造成的不便、對土地徵收的疑問，以及對未來生活的憂慮前來，然而迎接他們的卻是一大本密密麻麻、標示堤防範圍與徵收界線的地籍圖。工程單位自顧自地以小小的投影幕展示圖面與術語，試圖將複雜的工程規劃丟向台下的部落長輩（圖4）。這些用專家術語符號再現出來的空間，怎麼能期待僅是透過一兩次的說明會就讓人理解？更何況對話的對象，都是部落內對中文不太熟悉的長輩。這些說明會又多數舉辦在平日，只有少數有機會、能力留下來的年輕人可以協助轉譯。到場的Lamen議員最後也忍不住要求將圖面放在桌上，讓大家圍成一圈共同觀看，說明會才勉強回到某種能夠對話的狀態。



▲圖4 縣管河川施工說明會

說明會後幾日，我們再次與Atomo 巡守隊隊長來到堤防邊（圖5, 6）。超級堤防施工仍然如火如荼，不像上次只能踩著土砂斜坡往上，這次終於有道路可以走上去。只是，現在的堤防不只是更高，也長成了另一種模樣，現在更多了一道門，禁止非施工人員進入的告示。不過筆者好奇向隊長詢問是否可進去，他卻不以為意地表示身為Atomo的人當然可以。只是原本可以靠近、觀看、感受河流的地方，如今被納入工程管理與空間管制之中。若想看到馬太鞍溪，除了翻過高聳的堤防，就只能從遠處高地眺望。對長年生活於此的居民而言，說明會圖面上的河流早已與自己熟悉的生活脫節；過去透過涉水、觀察、勞動與口述記憶所累積的河流知識，也在工程改造之後逐漸斷裂。

當政府單位的溝通以及對生存、生活的理解只停留在視覺化圖面、技術指標與法

律程序上時，居民作為感知主體、身體經驗的承載者，便被排除在參與知識形成的過程之外。堤防或許可以擋住部分洪水，卻同時改變了人與河流之間的距離，遮蔽了視線，也阻斷了災害經驗的延續。高聳的堤防「也許」可以阻擋災害，卻也改變人們與河水的關係，工程結構物與視覺阻隔下創造了安逸生活，人們也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失去與河流共存的文化記憶。

五、結論：當安全成為高牆，災後重建是否也在製造新的斷裂？

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與後續「超級堤防」興建的經驗提醒我們，災後重建不單純只是工程技術問題，更是不同行動者與定義安全的政治過程。對國家而言，超級堤防是可見的治理成果，是對社會不安的回應，也是重新建立秩序的象徵；再度透過基礎設施將不確定的災害風險，轉化為可計算、可管理的數字。可是在公開說明



▲圖5 2026年3月Atomo堤防工程進度1



▲圖6 2026年3月Atomo堤防工程進度2

的場合上卻難以感受到溝通的誠意，分身乏術的地方青年不斷消耗自身能量與時間，進行知識轉譯的工作。對地方居民而言，堤防同時也是一道改變地景、遮蔽河流、重新劃定生活邊界的高牆。它所帶來的，未必是單一而穩定的安全感，而是一種夾雜著不確定與失去的複雜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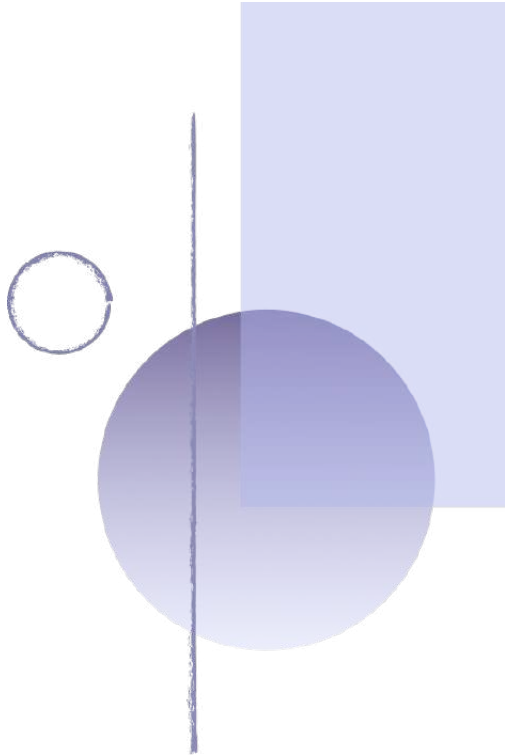
超級堤防反映出透過工程手段回應各界壓力的習慣，這樣的習慣帶來的是虛假的安全感，並沒有真正面對災害。當災後治理被限縮為基礎設施的強化時，地方社群長期累積的地景知識與生活經驗，往往被排除於決策之外。工程語言以防禦率、重現期與標準化圖面組織風險，但居民所感受到的，卻是土地被切割、生活空間被壓縮，以及與河流互動關係的改變。當安全主要透過技術指標被證明，而非透過生活經驗被共同理解，安全本身便可能成為新的距離：一種存在於圖面與數據之中，卻未必能被身體真正感知的安全。

因此，超級堤防所揭示的問題，不只是工程是否足夠強固，而是災後重建是否在無意之中延續既有的治理斷裂。當保護的形式是更高的牆、更嚴格的空間劃界時，我們也必須思考，這樣的安全是否同時削弱了人們與土地之間原有的連結。不過，我們也可以理解在官僚體制框架與政治現實上所面臨的難處。事實上仍然可以聽見許多工程專業技術人員對堤防、災後規劃有不同意見，對正在興建的工程持保留態度。只是這樣的意見在現況主流作法下，仍然需要透過比較委婉的方式實現。本文想強調，面對災後重建議題，正是重新思考規劃思維的時機，以納入能適應未來極端氣候的挑戰。重建是重新思考人如何與河流共存，以及如何讓不同知識能夠共同參與理解風險的過程。否則，當安全成為高牆，災後重建或許也正悄悄製造另一種更難被察覺的斷裂。

參考書目

張柏東 (2025)。〈萬一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壩造成水位上升 | 公路局：馬太鞍溪橋已改建完成，經得起考驗！〉。《東台灣新聞網》。搜尋日期：2026/04/11，<https://reurl.cc/lpQ5dq>。

林燕如整理 (2026)。張岱屏、簡惠茹文稿。〈災後半年：變貌的土地和家園 | 馬太鞍溪堰塞湖土砂災害後續〉。《我們的島》。搜尋日期：2026/04/14，<https://reurl.cc/9Wv9VO>。





▲ 攝影：吳承庭

規劃專業的實地協力： 馬太鞍堰塞湖災後行動小組

◎ 撰稿：黃仲崎 | 編輯：紀懷超

前言

2025年9月23日，花蓮縣光復鄉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堰塞湖溢流災害，造成24死157傷的慘劇。這場臺灣未曾經歷過的災害形式，不僅讓整個馬太鞍河流域，在災後仍持續陷入不安與焦慮，公部門災後重建體制也備受考驗。而作為規劃專業的城鄉所，便有同學迅速組成行動小組，實際進到災區陪伴居民、參與重建議程。本文藉由4月號的主題，記錄由城鄉所學生自發組成的「馬太鞍堰塞湖災後行動小組」，在這半年間的行動記錄、現地觀察與反思。



▲ 圖1 災後幾乎陷入癱瘓的光復市區（攝影：莊詠竹）



▲圖2 博士班Sera·Mika同學於臉書社團號召所上同學投入

在鏟子超人之後，規劃專業能做些什麼？

這場行動的起點，源於2025年9月23日馬太鞍溪堰塞湖水位溢過壩頂導致潰壩，挾帶土砂的大水重創下游地區。面對這起災變，地方逐漸有人力、大量物資進駐，在社群媒體上能看到大量的「鏟子超人」協助清理家園，同時也看到對於災後的前景、居住的議題逐漸浮現，然而重建相關資訊相當複雜且發散，有感於此，城鄉所博士生林妍伶Sera·Mika 於10月2日在臉書社團「NTU-BP 學生會」發文號召有志同學投身議題，迅速獲得城鄉所學子不少人的回應。經過密集討論，小組於10月15日正式成立，並發表了行動聲明「Mingodo to kacitodong no niyaro'; Micekeroh to kalalicay no siyakay」（中文：尊重部落要承擔責任的意識，推動社會相互溝通與交流），冀望小組能在自身所學與能力所及，以部落主體為核心的前提下試圖提供協助，協助消弭資訊不對等。

專題報導：災難下的空間與韌性

一、行動起點：災後居住路徑的倡議，推廣重視中繼、反思「永久屋」模式

災後一個月，無論是政治人物、學者專家、NGO、善心民眾都傳達想投入災區工作的聲音，然而對於受災地區了解不多，使得資訊相當混雜，也無能夠立即積極參與在地網絡。因此小組成立初期，便在「我們能做什麼」與「如何參與」的對話下開展出相關的行動路徑與決策。同時致力於從每日繁雜的資訊流中梳理脈絡，並嘗試轉化為相對易讀的資訊。過程中發現政府對住居相關政策說明特別缺少，沒有明確的方向，也經常聽到有民眾，對政令不清楚而擔憂。這樣的狀況不禁令人想起八八風災的前車之鑑，尤其是政府急就章產生的「永久屋」重建模式，時至今日仍有三方契約¹衍生的問題延續存在，更是令人警惕，不希望過去的負面案例再次發生。小組成員們透過回顧臺灣過往的災後經驗與文獻，也參考日本的災後重建案例，試圖梳理災後重建的各種可能，並簡化資訊讓各界可以快速參考。



▲ 圖3 行動小組Google Site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g.ntu.edu.tw/ntubpfataan/>

為了讓成果能有機會有所用，小組在一周內便建立了Google Site網站，也使用Facebook專頁宣傳。10月19日發布第一部懶人包「為何需要中繼居住？」，希望將「中繼」這樣的災後居住緩衝路徑的概念，推廣出去讓更多人知道且更容易被理解，不僅是提供給受災者做參考，也向公部門呼籲、向社會大眾說明中繼概念的重要性。此後數月內，小組持續依循此模式，產製各式災後相關知識懶人包。為了使較不諳華語的長輩也能理解，小組也不斷密集討論如何轉譯？如何言簡意賅傳達資訊？更聯繫在地的族語老師協助翻譯為阿美族語版本，設法將資訊傳達到部落。

同時，小組成員也於10月底開始，便分批前往光復鄉，積極到進入Fata'an (馬太鞍)、Kalotongan (加里洞)、Atomo (阿陶莫) 等部落，參與旁聽各單位所辦理的災後重建說明會。藉由實地訪查了解第一手訊息，試圖釐清當下資訊需求的所在，協助記錄政策進度，發佈到網站上。

災後住居懶人包系列：完整內容請參閱instagram: ntubp_actiongroup

災害發生後，復原家園早已忙不過來，小組希望提供一個簡單的方式，協助重要議題得以傳達而產製懶人包。以圖文簡化複雜的概念或政策，因此次災害發生地的具有原鄉特性，阿美族語與中文版本並行。除了災後應對概念外，也整理過去台灣八八風災經驗所造成的問題，供在地居民或大眾參考。



▲【懶人包系列1 - 阿美族語版】為何需要中繼居住？災後規劃需要時間及居民參與！
(中繼屋說明：Sifo Lakaw；族語翻譯：Komod Adop)



▲【懶人包系列2】為何需要中繼居住？災後規劃需要時間及居民參與！
(文字整理：黃舒楣老師)

註1：永久屋所說的「三方契約」，是指由政府提供土地、民間團體籌資興建、災民獲配房屋。該作法雖快速達成安置，卻因「土地國有、房屋民有」導致產權歸屬受限且曖昧不明。同時契約也多要求災民放棄原鄉居住權，導致族人陷入生活空間不足、生計困難與文化斷裂的困境。

二、從雲端到現場：Atomo分享中繼、拜訪Kalotongan

隨著懶人包與議題整理在網路上逐漸曝光，也因密集到地方旁聽說明會、表達願意投入的意願，小組有了一次機會從網路平台轉化為實地行動。11月8日，Atomo（阿陶莫）部落青年與巡守隊，邀請小組到現場分享中繼居住的概念，是首次有較多的成員一同拜訪部落。這次的座談會以日本的災後住居體制及能登半島的案例來介紹「中繼安置」，強調中繼的重要性：中繼不必然代表離開家園，而也能有機會考量舒適性與在地需求，讓人們有尊嚴地生活。希望陪伴居民一起有更具體的想像、向公部門傳達訴求的機會。

會後，我們與巡守隊交流，次日也參與了物資的發送。此時恰好面臨鳳凰颱風即將來襲的危機，面對最差情況可能會再次有生命危險的惶恐，大家都為了防颱準備忙得不可開交，但災後重建的會議、工作又接踵而至。這讓我們親身體驗了部落青年的處境，在任何事情都充滿不確定，給自己喘息的時間無法自主，更何況多數都還有原本的工作，疲憊程度可想而知。

午後前往Kalotongan（加里洞）踏查，途中遇到了家園位於馬太鞍溪河畔的受災族人，邀請我們進入他的農園參觀，成員們親眼目睹土石堆積在河床、緊鄰田地居所的景象，被土石填平的河床已經與田地同高，堤防就像是不存在，那種只要雨季來襲土石便隨時可能移動的威脅感，帶給團隊極大的體感壓力。



▲圖5 當天車窗外晴天的馬太鞍溪橋（攝影：李晨瑜）



▲圖4 11月9日，正值鳳凰颱風侵擾前夕，馬太鞍溪沿岸走踏的我們不時就會收到政府細胞簡訊警報。

緊接著到山悠電台²拜訪Dongi ina³，聽取部落的發展歷程、自身與河水關係的經驗，也分享了他對於這次與過去災害應對的觀察，後來ina成為我們與Kalotongan互動的重要領路人之一，也在後續帶領小組成員及老師到東富國小實際踏查，而這也都成為後續行動重要的參考。



▲圖6、圖7 至Atomo部落分享日本能登半島災後重建規劃案例（攝影：廖映嵐）



▲圖8 與Dongi ina討論中繼選址可能性（攝影：廖映嵐）



▲圖9 協助Atomo部落巡守隊進行物資發放（攝影：蘇靜純）

註2：「山悠 Sanyo」在阿美族語中有「八卦 (v.)」的意思，而山悠電台並不是真的廣播電台，是大家在這裡平時閒聊聚會之所在，有茶几凳子留言板讓大家「交換」部落大小事的地方。
註3：ina 為阿美族語對女性長輩的稱呼。

三、行動轉向：從資訊傳遞到實地協力

11月25日，臺大勞工社舉辦「花蓮重建之路：災民、學者、青年志工的觀點交匯」論壇，邀請Fata'an部落青年總幹事張志雄、阿美族知識中心研究員Kulas Umo與臺大土木系主任游景雲教授進行對話。當天參與論壇的小組成員，正碰巧地和與會族人搭上線，結束後一同在新生南路上聚會交流彼此想法。

此後，在小組成員長期經營聯繫下，有了一次與族人聚會的機會。2026年1月3日，小組成員們與所上教師黃舒楣來到張志雄總幹事的家，拜訪Fata'an部落青年。當日與會的Fata'an部落青年們，各自分享為何與如何投入災後的工作。聚會中張志雄總幹事提到，如果能有一個實體模型讓大家看到水流蔓延的路徑，讓風險被直接看見，居民才能真正體會環境的危險性，並確認討論有建立在相同的基礎上。

這項提議促成了小組從「議題產出」轉向「實體協力」，經過多次的討論，部落青年們決定要舉辦部落地圖工作坊，與政大民族系官大偉教授團隊合作，並請小組負責籌備模型的製作與教學，將這個想法化為實體。小組在這場陪伴行動也同時與城鄉所的高階實習課結合，正式轉化為深度的部落協力。



▲圖10 論壇上Kulas解說各部落的地理位置與傳統地名 (攝影：黃仲崎)

話說回來，參加活動很重要，會後的會更重要

這是一個認識關鍵部落青年還有了解水工模型研究團隊接觸的重要機會，雖然很臨時還是參加了勞工社所舉辦的活動。在那晚認識了部落青年總幹事張志雄、Kulas Umo及土木系的游景雲老師，講座結束後Kulas提出了要不要去「會後會」，但彼此還不熟的大夥們，其實也不知道哪裡適合「會後會」，所幸就在新生南路的人行道上坐了下來，暢言剛剛手持麥克風時不方便說的各種大小事。儘管在論談中我們有來有往，但「會後會」才是真正稍微認識彼此的時刻。也在此時我們才得知，兩位族人是為了這次的演講，特地遠道而來，會後還得開車四小時回到fata'an……

四、學以致用：模型製作與防災工作坊

2026年2月27日，小組協辦了「馬太鞍流域周邊部落立體地圖製作工作坊」。透過立體模型的製作，希望在未來不論是與任何單位或是任何人，在災害討論對話，或是在規劃上能有個容易指認的共同基礎。而製作的過程中也促成了與流域上各部落青年的交流，並且在一剪一黏之中，再次認識這片河流與土地。



▲圖11 光復鄉災後重建團體「仁愛43」 (攝影：莊詠竹)



▲圖12 1月初與黃舒楣老師一同至Fata'an部落拜訪

這段從2025年9月堰塞湖事件到今年2月底實體工作坊的歷程，展現了行動小組如何透過跨領域合作與長期扎根，以災害議題作為切入點，將專業所學具體落實於部落，建立理論與行動共作之經驗。

在首次立體地圖製作工作坊後，小組受到Kalotongan的Miku邀請，並在長老教會的促成與支援下舉辦了Kalotongan與Atomo的立體地圖製作工作坊。而後更在5月再度回到光復糖廠，主辦「風險認知下共作未來：原住民族觀點的災後規劃 - 國際工作坊」，目前後續將繼續發展「情境數位專題」，而未來行動小組會持續追蹤觀察災後動態，尋找適合的角色行動，陪伴持續進行中。



▲圖13 不小心接下重擔的四人(嘉修、彥霖、仲崎與電腦裡的懷超)，正在討論要怎麼讓模型能被「大家一起」做出來！(攝影：李晨瑜)

「情境數位專題」系列

【選擇・安居】

馬太鞍災後居住議題模擬專題

災害在空間上的發生分佈不均，各地受災與風險亦同樣不均，面對同一個事件災害，會因為所處的位置而需要不同的思考。小組盤點居住議題上的災後重建路徑，並將這些路徑情境具象化，做成互動式網頁，嘗試提供受災者在不同條件情況下他們可以選擇的路徑，以及選擇該路徑後會遇到的狀況以及需要面對的課題。



▲圖14 數位專題的實際互動畫面 (Beta版)

結語：致那些撐起行動的靈魂樂手們

在此也要感謝城鄉所的老師們，黃舒楣老師、康旻杰所長、黃麗玲老師與陳亮全老師從一開始就大力支持我們的行動。特別是黃舒楣老師，在百忙之餘仍傾力相助，與小組共享資訊並提供專業建議。老師不但自掏腰包支援小組的行動，更透過 114-2 學期的實習課與辦理論壇，搭建跨領域的對話平台，將更多專家學者與地方族人對此次災害議題的思考納入其中。感謝城鄉所所學會在經費上的支持，也謝謝劉怡君老師與臺大學生會、工學院學生會長蔡朝翔為我們尋找資源而奔走。

災後被各界湧入的資源以及在種議題之間疲於奔命的部落族人們，還能抽空接受我們的打擾真的很不容易，我們相當珍惜每次機會也非常感謝受到部落族人的信任。

小組成員大多都還在學，這段時間，大家在課業與工作的縫隙中，頻繁往返於臺北與光復之間，努力跟上部落的節奏，應對隨時在變動的災後生活。在沒有學分架構的束縛下，大家純粹為了共同關懷的議題而凝聚，這份熱忱實屬難能可貴。我們心中也曾有過懷疑，擔心小組的付出是否真能產生正面影響，但隨著與彼此、與族人之間逐步織就的信任網絡，才確信我們也能在不造成負擔的前提下有所貢獻。在這片會黏人的土地上，我們學習並收穫了太多，心中滿是感激。

最後要感謝小組成員(按筆畫排列)：

Sera Mika、李晨瑜、李嘉修、紀懷超、郭佩辰、黃仲崎、廖映嵐、賴彥霖、蘇靜純

以及曾經參與或在行動中大力幫助過我們的城鄉所夥伴Kuliw、Tipus、詠竹、哲源、辰章、承庭

還有勇敢有毅力，參與高階實習課程的同學翊慈、承忠、亞巡、筱祺、哲誠、允則



2025 年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小組行動時間軸

藍：小組行動／大事記；紅：小組會議／研討會／田野參與

9月23日 馬太鞍溪堰塞湖水位溢過壩頂，導致潰壩，夾帶土砂的大水衝擊下游地區

10月2日 城鄉所博士生Sera Mika在臉書社團NTU-BP 學生會，以貼文號召有志同學參與行動

10月15日 小組正式成立，發布「城鄉所馬太鞍堰塞湖災後行動小組」聲明稿

10月19日 第一部懶人包「為何需要中繼居住？」發布

10月23日 內政部國土署重災區中繼安置說明會

10月24日 災後復原與重建協調會議：中繼屋選址與風險治理

10月30日 水利署堤防興建說明 (@ Atomo阿陶莫部落)

10月30日 農業部災後農業復原重建座談會 (@ Atomo阿陶莫部落)

11月8日 Atomo (阿陶莫) 部落舉行座談會，邀請小組分享中繼住居概念，9日拜訪Kalotongan (加里洞) 部落

11月10日 鳳凰颱風影響台灣，大水沖進鳳林鎮明利村

11月13日 凌晨發現新堰塞湖形成，並在中午溢流，大水再次影響下游各地

11月20日 內政部中繼屋說明會

11月23日 花蓮重建之路：災民、學者、青年志工的觀點交匯

11月25日 臺大勞工社舉辦「花蓮重建之路：災民、學者、青年志工的觀點交匯」論壇



▲9月23日當天新聞畫面 (來源: <https://reurl.cc/R2QOZZ>)



▲國土署安置說明會現場 (攝影：李嘉修)



▲小組討論中繼住宅調查結果

2026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1月3日 在部落總幹事張志雄的家，拜訪Fata'an部落青年

1月3日 慈濟研討會：馬太鞍溪溢流的探討 (@ 花蓮慈濟國際會議廳)

1月14日 嘉蘭部落防災社區經驗分享會 (@ Atomo阿陶莫部落)

1月17日 鹽巴工作站內部培力會：堰塞湖與馬太鞍溪流域治理

1月17日 原住民修繕期間安置處所規劃需求會議

2月6日 講座：堰塞湖溢流後的馬太鞍溪安全嗎？蓋了堤防就沒問題？

2月27日-3月1日 協辦「馬太鞍溪流域周邊部落立體地圖製作工作坊」

3月27日 地方說明會：「瑪達娜溪、麗太溪排水、利哈岸溪及羅莫溪排水」系統性治理背水堤新建工程 (@ Atomo阿陶莫部落)

3月27日 參與討論會：展開災前規劃 對話風險 0%-100% (@ 仁愛43)

3月28日 大農大富、大興村 田野踏查

3月29日 再訪Atomo巡守隊更新近況、拜訪糖廠中繼屋住戶

4月18日 防災演練會前會

4月-5月 期間與長老教會共辦Kalotongan與Atomo部落立體地圖製作工作坊

5月2日 風險認知下共作未來：原住民族觀點的災後規劃 - 國際工作坊



▲各部落討論防災社區事務 (攝影：紀懷超)



▲Atomo、Kalotongan模型工作坊 (提供：加里洞農業觀光人文交流協會)



▲國際工作坊 (攝影：賴彥霖)

To be continued...

屋企樓下： 香港大埔宏福苑災前災後， 屋苑遊樂場的故事

◎ 撰稿：霍漢橋 | 編輯：張維哲

前言：失去「屋企」，被遺忘的「樓下」

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災難自2025年11月26日發生距今已數月，除了造成至少168人死亡，也導致超過1800戶，至少數千人失去家園。大部分宏福苑居民起初住在香港特區政府及慈善機構安排的臨時房屋，隨著時間推移，政府公布了永久安置計劃，以「業權收購」的方式，驅使居民入住其他政府安排的「居屋」單位，或以等值自行購買其他住宅單位，變相拒絕了「原址重建」的方案。這意味著，居民需要正式告別宏福苑的家。在社會關注宏福苑居民災後何去何從的同時，居民要告別的，除了「屋企」（大致是粵語的「家屋」）以外，更要與曾經每天經過、流連，甚至滿載回憶的「樓下」。

香港大部分人口都住在高樓住宅之中，「樓下」在香港的語境除了建築物的最低層以外，概念上更強調住家的周圍，通常指涉所在屋苑或社區的空間，例如屋苑的垃圾站就是「樓下垃圾站」、屋苑附近的便利店就是「樓下7-11」等等，無論它們是否真的位處所在建築物的正下方。無論香港本地、台灣以至海外留意相關新聞的朋友，大概都知道宏福苑居民失去家園，但普遍關注點都集中在單位的重建，或者籠統地關注「所屬社區」。這篇文章希望集中記下宏福苑的樓下遊樂場的前世今生，這個特殊的空間有居民的集體回憶之餘，其保存與突然消失也象徵著社區公共空間在災後權力運作下的無奈現實。社會與居民又如何嘗試重現關於宏福苑遊樂場的記憶？



新市鎮屋邨的「樓下」規劃

為甚麼會有「樓下」出現？這問題可以回溯到1970年代。經歷「六七暴動」與「石硤尾大火」後，香港政府推出「十年建屋計劃」，務求使大部分香港居民都住進各類具一定規格的住房，大幅改善住屋問題。住屋需要空間，大規模的房屋興建，也牽涉社區規劃與空間大規模重新分配的問題：於是香港政府開拓市區以外地區，在新界不同地方建造「新市鎮」，包括曾是新界東部政治、經濟中心的大埔。

早於「15分鐘城市」等概念，香港政府在新市鎮屋邨規劃時，就意識到屋邨的社區規劃應當以自給自足為原則，在把大量人口搬進房屋的同時，在房屋的地下以及周圍，規劃足夠的商鋪、停車場、公共交通總站以及各類社會康樂設施——第一個例子就是位於南區的華富邨（1971年建成），在隨後的眾多屋邨發展也大致沿用。同時，香港政府引入「居民來源多元化」的概念，避免新市鎮等新發展區只有住進公共屋邨（公屋）的中下階層，在1976年設立公營機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提出「居者有其屋」（居屋）計劃，給予中等收入戶以低於市價購買房委會興建及設計的房屋，並設立若干轉售限制。這些居屋原則上均鄰近公屋，一來可以豐富社區居民多元性，促進社會和諧，二來也讓收入提升的公屋住戶可以在購置住宅時，住在同一個社區，三來可以善用同一社區的商業與公共設施。

專題報導：災難下的空間與韌性

作為居屋的大埔宏福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建。1970年代末，政府決定在大埔新市鎮填海興建第二條公共屋邨「廣福邨」，而在廣福邨建物底下，則分為作為公屋的廣福邨部分，以及作為居屋的宏福苑。80年代初的規劃圖顯示廣福邨跟宏福苑是作為一個整體作規劃，宏福苑作為整個計劃的“Phase 1A”，與廣福邨共享道路系統、社區學校、巴士總站與社區商場、街市（市場）的公共設施。加上屋邨公園等設施，就成為了居民所泛指的「樓下」。1983年，宏福苑正式落成，並與廣福邨幾乎同時入伙。

在「十年建屋計劃」以及新市鎮建設下，香港有接近一半人口住在公屋或居屋，「樓下」的概念在香港的廣泛應用，即是上述規劃的脈絡下形成。從此，大部分居民都住在超過二十層高的住宅，「樓下」就是擁有大片空地、公園，以及不同設施的公共空間，並慢慢開始盛載居民生活的日常與記憶。如果說住宅單位內部是一種表面齊一，但實際上卻私密且殊異的個人或家庭記憶，「樓下」就是一個物理上共同使用，意義上共同分享的社區空間。



▲圖片是廣福邨-宏福苑一帶的社區，對於宏福苑居民大體可以算是「樓下」的範圍。黃色圓圈：宏福苑的三個遊樂場所在；紅色：來往市區的公車站；黑色：市場與商場。（底圖擷取自Openstreetmap）

樓下：「類睡房城市」的歸屬感來源

在新市鎮的原初設計上，屋邨作為一個社區囊括了居民的生活機能需求，而市鎮的其他分區則應能解決居民的其他需求，工業區和商業區應可使得市鎮基本自給自足。大埔新市鎮的設計，就包括了利用舊市鎮中心（大埔墟）作為商業中心，另建「大埔工業邨」創造大量工作機會，讓大部分居民均可原區就業。然而在宏福苑落成的1980年代，香港已面臨巨大的經濟轉型危機：工業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而北移，重心產業轉移為金融業與服務業等，在商業空間均位於中環、尖沙咀等市區中心，再加上連接市區與新界的基礎建設快速改良下（例如火車電氣化，新界高速公路建成），使得大部分新市鎮慢慢邁向「睡房城市」——居民作為「工作人口」大多早出晚歸，真正待在新市鎮的時間和經驗都不多。但即使是類近睡房城市的現實，因應屋邨內部齊全的設計，要上班的居民還是有「樓下」的共同生活經驗，例如每天都會經過樓下的遊樂場看見同一個小孩與老人，或者到社區商場買晚餐時會與老闆說個幾句，又或者在等樓下的公車站等上班的公車總是遲到。

不用到市區上班的居民，包括老人、家務照顧者以及小孩，則有更多時間浸泡在他們所在的社區，以宏福苑為例：由於幼稚園、小學均設在屋邨內，商場與市場，公園與遊樂場也是在廣福邨-宏福苑的範圍，相當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回憶，由早上耍太極舞，到接送小孩來往學校，再到市場買菜，與鄰居在公園聊天，到商場吃飯，其實都是在樓下。在新市鎮的規劃下，「樓下」在香港社會就是「地方」的基本單元，也因應大多數人的生活日常，「地方感」的產生也多來自樓下的種種。

由此可知，「樓下」無論對於上班族還是非上班族的居民，都是日常生活不能跳過的地方，話雖如此，同一個樓下，在彼此的使用方式或更加著重的空間使用下也會有不同。然而，至少我們可以大概知道為何「樓下」是對一眾居民都重要，那是他們記憶最容易重合的空間。而遊樂場，更加是設於屋苑之內，無論是上班、上學還是生活，只要居民需要出門，就無法跳過的空間，可以說是「樓下」中的「樓下」。



專題報導：災難下的空間與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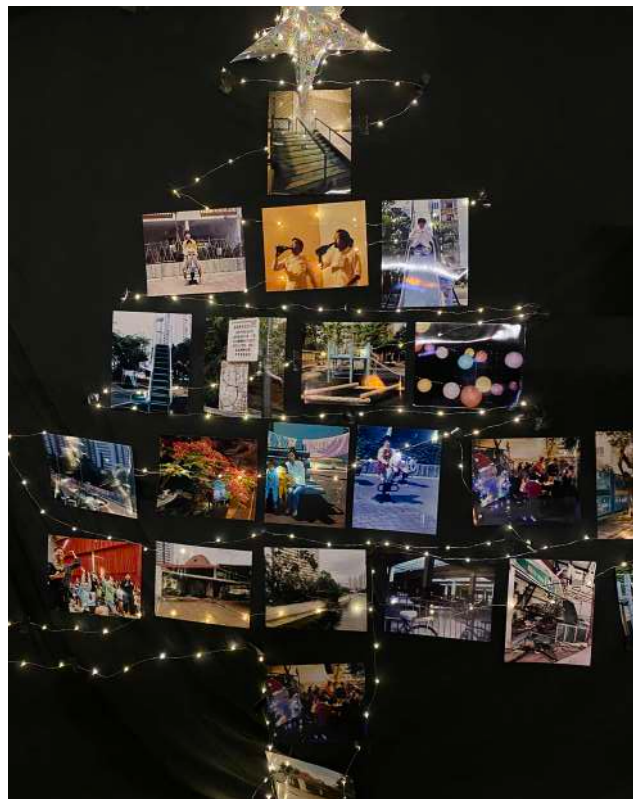
遊樂場的保護罩：業主立案法團

在宏福苑的樓下有屋苑落成之初已開放使用的遊樂場中，設有約三米高的鐵滑梯、「毛毛蟲」與「蝸牛」攀爬架，以及蹺蹺板、搖搖馬等設施組合。這些1980年代的設計組件，一直在宏福苑中被大家以居民自己的方式遊玩，成為一代又一代宏福苑和廣福邨居民的回憶。同為一個社區的建築項目，其實廣福邨與宏福苑曾經擁有十分類似的遊樂場。筆者在數年前曾擔任該區議員助理，與「街坊」一同籌辦聖誕活動時，便曾收集到不少廣福邨居民在樓下玩滑梯的照片，可是居民紛紛反映，那些遊樂設施在1990到2000年代逐漸被拆，換上塑膠製的遊樂場組件，唯獨宏福苑的碩果僅存。

同為一個社區，為何在公屋那邊的遊樂設施沒有保留，卻只有宏福苑的保留下來？這或許可以從兩者的空間管理結構來分析。宏福苑遊樂場用地是宏福苑地段的一部分，其業權為宏福苑業主共同擁有，並由業主立案法團管理；業主立案法團由所有業主組成，負責管理屋苑日常事務，需要自負盈虧，換言之如有修繕屋苑等額外支出，則需要由所有業主分攤。反觀廣福邨作為公共屋邨，其業權為香港政府所有，居民只擁有居住權，屋苑一般由作為公務員的房屋署駐邨經理管理，居民有權參與的，是具有部分決策和諮詢權力的「屋邨管理委員會」；其財政由政府負責，居民並不需動用自己的一分一毫。

在保護兒童意識高漲、家長開始更擔心小朋友遊樂安全的近年，總會有人投訴1980年代設計的遊樂場「太危險」：一來部分物料以堅硬金屬製成，小孩撞到比較痛，二來滑梯的高度令小孩一旦從滑梯跳出來，受傷會比較嚴重。

面對居民投訴，加上部分舊零件開始停售，公屋的管理機制讓屬於公務員的管理人員更傾向規避風險，以安全為上，而更換組件的花費也能由政府支付，故此更有機會聆聽投訴居民的意見，採用更「安全」的膠製新設施；而宏福苑的私有產權與法團制度，則使決定權歸於同為居民的法團管理委員會身上：居民更可能因為個人意願及自己的感情、回憶，更傾向於保留遊樂場，加上換新組件需要居民多花一筆錢，財政考量也使管理者更謹慎考慮遊樂場的存廢或維修。筆者曾有幸列席2020年左右的宏福苑法團委員會議，當時曾有一項議程討論遊樂設施的維修，會上的委員紛紛表達自己對遊樂場的情感，更著令管理公司：掉漆的問題可以補漆，但如非必要不要拆。屋苑決策者作為居民，對樓下公共空間有自然的歸屬感，成為了遊樂場的保護罩。



▲數年前社區聖誕活動，以樓下記憶的不同相片製作的聖誕樹，當中便包括宏福苑與廣福邨的遊樂設施。（筆者攝於2021年）

災後的「重返」希望與破碎

時至去年（2025）11月26日，宏福苑發生五級大火，在烈火熊熊的幾天，以堅硬金屬和木頭製造的遊樂場在火勢蔓延的另一邊倖存。在12月的一個早上，因應有消息指出一些人會假扮宏福苑居民到居民通訊群組「打聽」消息，很多居民因此在群組討論起如何「認證」自己是「宏福人」，意外掀起居民對「樓下」的共同回憶。

「希望宏福苑中間的木滑梯可以保留啦！……陪住我大，又陪埋我個仔大架。有時經過見到小朋友玩，自己都由個心微笑出嚟。」（希望宏福苑中間的木滑梯可以保留吧！（它）陪著我長大，也陪伴我兒子長大呢。有時候經過看見小朋友在玩，自己也會心微笑。）、「我住宏道低層，有人好夜都係滑梯上跳，好嘈！成日想掉個水袋落去」（我住在宏道閣低層，有人很晚還在滑梯上跳，超吵！常常都讓我丟一個水袋到樓下）、「（回覆另一居民的照片）細個玩大白（鯊）嘅首選位置」「係，我都有教我個女玩」（小時候會在這裡玩一個叫「大白鯊」的遊戲，這是首選位置！）（對呢，我都會教我女兒玩！）。

居民在承受家園付諸一炬，甚至親人離世的巨大創傷時，一同回憶宏福苑樓下的點滴，是一種透過懷緬，重現一種愉快而共同的「災前空間」，是一個難得而被容許的情緒出口與正面情緒的來源，在他們接受災難的過程十分重要；這還是在群組嘗試認證「誰是宏福人」這種定義「地方」的討論中出現，可見「屋企樓下」的種種回憶如何承載地方歸屬感。在一些居民表達希望保留遊樂場設施的話語當中，更透露出他們對重返家園以及回復舊有日常的一種希望。

然後就在此時，另一位居民把最新從旁邊高樓拍攝的照片放出來：「可是現在都拆了」。雖然從早上有消息傳出，有一些居民已經知道，但部分居民的反應十分錯愕，群組一片哀嚎——有人說那「陪伴了我半個人生」，有人則慨嘆「原來真的失去了，才會如此懷念」。



▲宏福苑中間的木滑梯。（筆者攝於2021年）

（消失的）公民社會：被限縮的權利，行動的微小可能

本來慶幸大火沒有波及遊樂場，或許會成為未來重建的重要文化財產，可是當筆者一看見被拆的照片傳出來，也是傷心非常。除了不住在宏福苑的筆者，連宏福苑居民甚至業主立案法團的委員，均只是在事後知道「遊樂場已經被拆卸」的消息。

宏福苑空間被禁止進入，政府動用法律、警力與封鎖線達成封禁，建立「緊急情況」的社會現實。套用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的「例外狀態」在宏福苑的物理空間，以這種「緊急情況」為名，讓居民無法涉足並失去進入家園的權利（儘管裡面可能的確是危險的），而部分有關產權的法律在此情況之下被懸置：正如前述，業主立案法團理應擁有決定建築物和遊樂場是否需要拆卸的權力，而遊樂場設施也是業主所共有的私人財產；可是在此情況下，業主權利只得到了部分的尊重：委員只有被事後通知，而並沒有事前的決定或諮詢權，更遑論一種沒有委員身份的業主了。事實上，政府在去年底也因應「法團委員也是災民，根本無法處理火災後複雜決定」的理由，經土地審裁處的法律程序解散了由居民組成的管理委員會，並另外委任一間管理公司擔任管理職務。



▲ 金屬製的機車形狀搖搖馬。（筆者攝於2021年）

無論政府的動機是否為居民著想，居民和公眾在此事上的行動空間，在上述狀態下被大幅限縮。加上在《國安法》與「23條」生效下的香港，大量政黨及公民團體解散，剩下會為公民權利或在地社群發聲和跟進的公民團體少之又少。在似乎無法組織力量「動員、抗爭」的地方，甚至被許多人認為已經沒有公民社會的香港，行動者如何為此著力？

人是有情感的動物，無論法律、理性以及社會氛圍如何規劃、規範人的行為，情感的本能並不會消失。除了有居民在社交媒體如Threads上抒發不捨，也有一些人嘗試將矛頭指向政府與工程人員。這些夾雜失落與憤怒的情感，有能力使人在沒有公民社會組織等中介下傳遞與擴散：包括《獨立媒體》、《AM730》和《集誌社》等傳媒就此事報導並向政府查詢，使得居民至少獲得一個官方答案——官方認為樓宇結構有危險，於是需要作緊急工程以移除危險物品，需要動用大型機械工具，於是需要移除樓宇附近的一些構築物，包括遊樂場。

一些認真的傳媒記者，更找來前議員與居民訪問，講述遊樂場設施對居民的意義與回憶，也找到香港研究遊樂場地景的專家，評論宏福苑遊樂場設施如何罕見；更派出攝影記者從旁邊廣福邨的特定樓層，成功拍攝在絕大部分角度因為區域封鎖而無從得知其狀況的宏福苑另一公園的情況，得知該處的「毛毛蟲」攀爬架當時仍然健在。相關報導在本地社會引起頗大迴響，至少不少主流傳媒也有提及。

傳媒關注在當今香港的政府政策未必有決定性影響，但至少使得政府得知「有人在意這件事情」。數個星期後的2026年1月，大家再發現「毛毛蟲」攀爬架也被拆卸，當《獨立媒體》記者再向政府查詢時，雖然前半段回覆與之前一模一樣，但卻加上不短的「補充」：

「政府十分理解和明白宏福苑中央公園內的休憩設施是居民的集體回憶，希望於可行情況下盡力予以保留，但重申為保障……（中略）……移除有關棚架及附屬構築物；當區又稱，聽到居民期望重置相關休憩設施的建議，政府會在研究重建方案時細心考慮。」

在地方行動者與傳媒的努力下，官方至少肯定了遊樂場作為居民集體回憶的事實，以及至少將重置宏福苑遊樂場放進災後重建的考慮之中。在2026年的香港，這可算是微小但重要的成就，也是一種公民作為行動者，仍有其些微能動性的證明。

再現空間：在Instagram上、在明信片上、在報紙專題上

重建後的宏福苑會否有重置的遊樂場尚未可知，但居民與對地方有記憶的民眾已不斷利用不同方法，記錄與匯集大家對宏福苑遊樂場的回憶。匿名的有心人在社交媒體Instagram上開設了一個「宏福記憶」@wangfukmemories 的帳號，專門收集居民和大眾對災前宏福苑的任何照片、影片、聲音記錄，大家透過Google表單投稿，他們便會發佈分享。幾個月下來，不同居民都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片段，例如居民拍下「樓下」公車站旁的木棉花，屋苑與窗外的吐露港景緻，更多是翻出自己童年時在家裡和「樓下」的相片和照片，除了讓人得知公園遊樂場幾十年來的變與不變，也是彼此的回憶匯聚於同一個IG帳號，並且有所重合地公開展現。回憶更加不只以過去片段的方式呈現，不少懂得藝術創作的居民或街坊，也把自己對宏福苑的記憶與夢想以繪畫等藝術作品再現。

備註：事實上，是否有「重建」也尚未可知：2026年2月，香港特區政府公佈宏福苑居民安置方案，當中明確抹煞了原址重建的可能性，而「覓地原區安置」的選項也不明確，政府只交代了居民可以用原有的業權，換取大埔頌雅西地段正在興建的新居屋單位，詳情尚未公佈。除了未被大火燒毀的一棟「宏志閣」，政府沒有給予居民任何集體決定的空間，在其方案中，居民的權利是個人的。故此，會否有一個「新宏福苑」存在，也存在相當大的疑問。

有另一些熱心的行動者與居民，則嘗試組織居民的聯誼活動，比如電影包場活動與新春聚餐，除了讓居民在四散的狀態下短暫重聚，享受片刻愉快之外，也在活動派發「宏福苑遊樂場明信片」，讓居民能實體收藏印有宏福苑遊樂場設施的記憶，藉此機會使他們談及自己對遊樂場的記憶。

另外，傳媒在記錄與重現宏福苑居民記憶的角色也非常重要。許多媒體持續寫有關居民的故事，當中有一群文字工作者發起長期協作計劃，以居民於災前與災後的空間和生活作對比為主軸並於香港主流報紙《明報》隔周刊登，當中最近一期（第四期）的訪問，便立體地訪問了居民夫婦與下一代對於樓下遊樂場的點滴，並以前後對比照片呈現。這些仔細而對焦的記錄，以完整故事方式呈現，帶來了一種更容易投入與想像的視角，使得居民經歷過的遊樂場時空以更全面的方式再現。

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談空間的生產中，「再現空間」正是充滿了使用者賦予的不同意義與象徵，雖然在政府的規劃與清拆的宰制的權力下，「空間再現」主導了物理空間的走向，限制了重建的可能，但因為行動者的努力不懈，「再現空間」還是在Instagram上、在明信片上、在報紙專題上重新出現。



▲ 一些印上宏福苑遊樂設施的明信片。

結語

宏福苑的災後發展，以及遊樂場等「樓下空間」的演變，仍然在一個變動的社會中有各種動態過程。作為與居民同行的行動者，除了以文字梳理遊樂場的前世今生外，更希望能以記錄的方式肯定各行動者協力營造的再現空間，大家的心機並無白費，同時也希望告訴更多人：宏福苑樓下曾經有這樣的空間，而且它的故事還未完結。

「城堡靠想像 仍可再攀爬

流亡荒野眼前都有 遊園地裏那羣木馬

置身廢城仍可建造人類最夢幻剎那」

——《隱形遊樂場》



▲ 宏福苑的旋轉鐵滑梯。這是筆者最後一次為它留下記錄，可見旁邊的棚架已經圍起宏福苑各棟大廈。（筆者攝於2025年4月）

為台灣找個未來：彭立沛老師專訪

◎ 訪談：林彥彰、紀懷超、張翼織
撰稿：林彥彰、紀懷超

國發會的工作：規劃、審議、協調、資源分配

當天一進到立沛老師在國發會的辦公室，編輯們就看見了牆上斗大的地圖，上頭貼滿了所有目前正在進行的案件。老師向編輯們娓娓道來：綜觀國發會的業務可說是無所不包。其中，老師主責的核心項目之一，乃是國家中長程個案計畫的審議，屬國發會業務者又分為「社會發展」及「公共建設」兩大類：當中央各部會的計畫項目，其性質或預算達到一定程度時，便需要轉陳行政院核定，而國發會便是扮演實質審議的角色，提供專業、客觀意見，供行政院進行決策。老師坦言，當前的位置擔負的正是協調、資源分配的工作，當想法不一致時，很多時候得直接在協調會議現場設法達成共識。與在學校相比，國發會的業務必須接觸到中央的所有部會，透過與各式各樣的機關協商時，在過程中會理解到「原來他們是這樣思考的」，正是這份工作有挑戰的地方。

老師向編輯們逐一說明國發會的組織架構，也提到國發會的重要任務除了協調、審議、管考外，也包括了涉及國家整體發展的規劃要項。「像GDP的預測或是人口推估...我



▲彭立沛老師(照片由老師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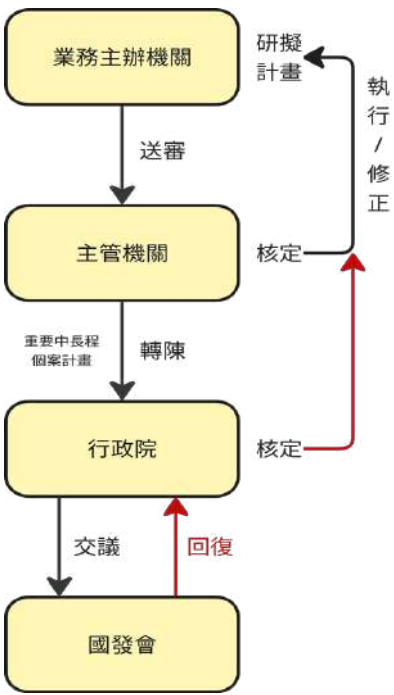
們每次講少子化、高齡化，什麼時候人口會減少到什麼樣的程度?...人口的推估是規劃的基礎，你們要為25年、30年之後的臺灣做規劃時，要先知道未來的人口。」在初學規劃時大家都熟知人口推估的重要，但當臺灣當今生育率只剩0.87的時，未來究竟適合怎樣的居住密度？需要怎樣的社會福利體制？如何將具體的作法內化到部會的計畫或政策之中，並透過管考機制確保能順利運作，正是國發會的核心任務。

談談地方創生

老師在國發會的關鍵任務之一，正是城鄉所學生熟稔的地方創生。若綜觀整個地方創生政策的推動框架，主要依據為行政院在2024年所核定的「打造永續共好地方創生計畫」(俗稱「地方創生3.0」)，其所涉及的11部會，各自會核定經費

老師介紹：

彭立沛老師目前任職於國發會，但同時作為生傳系與城鄉所合聘的教授，目前也有在生傳系開課。過去城鄉通訊曾於2020冬季刊訪談過老師，本次訪談主要著重於老師近年的職務轉變，與當前研究興趣，若想更加認識老師或可翻閱前次的訪談內容。



▲國發會中長期計畫審議流程示意圖(圖片參自：<https://reurl.cc/R2LYzG>，由編輯團隊重新繪製)

擬定相關計畫，進行培力、輔導、補助等工作項目。而執行上，主要是由鄉鎮公所進行事業提案，其必須整合內部行動者，召開共識會議，並敘明每項發展策略的實施主體，以及所對應上述11部會主管的計畫。除了鄉鎮公所的途徑外，也存在「多元徵案」的機制，並由國發會進行輔導、審查。「我的想法是，地方的NPO、協會、企業對地方改變有些想法...但可能一個地方有不同的單位都有想要提，需要把它整合成一個團隊來完成」。每個鄉鎮的課題大有不同，地方創生的工作重點在於適當媒合不同的政府資源，課題導向地協助地方追求想要的發展路徑。

但國發會的角色不僅是輔導與整合，地方創生計畫中更有著由國發會自身推行的子項目，也就是「青年培力」相關計畫。老師介紹起今年開始推動的「地方創生利他行動168」專案，拿出了自己親手繪製的手稿，向編輯們解釋地圖上24個廊道的劃分依據，「要想辦法透過他們的特性，打破行政疆界...從地理去思考，找到一個從文化、景觀上、氣候條件上，可能都很接近、比較均質的地方」。透過專案，有別於過往青年培力工作站的措施，讓尚沒有經驗但願意返鄉創業的青年，得以拿到第一桶金投入地方。



▲地方創生方式提案整理，在老師的訪談過程中提到了多種的地方創生徵案方式，我們編輯群重新整理了老師訪談的脈絡，讓大家可以更快了解地方創生提案的方式，也希望此表可以幫助到希望投入地方創生的同學們，更加了解如何提出地方創生計畫。



▲「地方創生利他行動168」專案中所劃分的24個廊道(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https://imndctier.github.io/RRAAP168/>)

而問起青年與地方政治的關係，應該如何看待政策帶來的影響？老師則認為「我發現培養他們，這群人對地方改變是願意講話的，他們會不會去從政我不知道，可是公民社會有多元的聲音其實是重要的。」不論長遠的結果如何，能讓認同地方的人們立足，為地方帶來參與公共事務的新血，都是邁向成熟公民社會的過程。在地方可能面臨僵化的派系結構當中，也勢必需要與抱持發展願景的青年維繫關係，如何評斷好壞或許難以一概而論，但作為社會工程的地方創生，勢必是臺灣將來需要持續面對的重大議題。

要留下什麼樣的未來

在訪談的過程中提到國發會對地方創生的協助時，彭立沛老師都會露出相當欣慰的笑容。老師認為，地方發展的邏輯與國家發展的邏輯是一樣的。發展本身即是一種往正向的目標前進的過程，而地方發展即是地方有計畫地在朝著正向的目標前進。也因此，發展本身也不僅是一兩年內的事情，而是更加長遠的未來。這也呼應了老師在三年前於《臺大校友雙月刊第145期》中提到的，對臺灣社會-生態的生產地景和海景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簡稱 SEPLS) 消失的擔憂。老師說道：「在鄉村淺山的地方或是在農地、海邊，有一些生產的地景態，我在談的是農業的地景，或是海邊的生產地景基本上都還有自然的成分，因為這是人跟自然銜接的那一塊，你沒有他的時候，其實生物多樣性是不好的，因為這個土地已經被我們使用過了，但是那之後呢？如果不管它，因為物種競爭，某一些物種會更強勢，所以他就更單一化，反而生物多樣性不好。所以要適度地去管理他，這是生物多樣性的概念。」

老師以相當知名的老鷹紅豆為例，老鷹雖住在森林裡，但早已以生存於紅豆田間的動物為食，當農藥毒死了吃紅豆的動物後，也會造成老鷹因食用被毒死的動物而死亡。然而，僅是保育森林環境也無法改變老鷹以田間的動物為食的狀態。也因此，保育生態本身應該也要思考人的生產活動會與自然產生什麼樣的交互作用。這也呼應了臺灣當前在發展高科技產業時，廠

房設址的環境困境。



▲ 圖為宜蘭山上夜景，正如老師所言，未來將有甚麼樣的台灣或許是現在要開始思考的問題 (林彥彰拍攝)。



▲城鄉通訊編輯群與老師合照 (徐岡拍攝)

房設址的環境困境。

老師一邊尋找著他今天才閱讀過的商業周刊，一邊向我們說著當前他對於臺灣發展憂慮「大家都想要台積電，都想要去各縣市設廠，因為他真的很厲害，這個是臺灣的驕傲，如果臺灣有好幾個台積電的話那不得了。……但是現在大家會講，我們有沒有k型化，這也會牽涉到未來公不公平的問題……以後在0.87的生育率以下，2050年會剩多少人？最適合台灣的發展密度是什麼？我們的生產環境要不要繼續維持糧食安全？另外一個關鍵是，要維持這麼多的糧食生產，要保留多少的農地？最適合的居住的人口數是多少？」

相較於臺灣，老師看著商業周刊上介紹的芬蘭提到，他們雖然孕育出了許多高科技產業，但同時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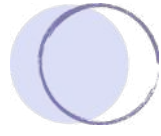
們也相當重視著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也因此他們訂定的發展目標中，第一個就是社交，也是培養小孩社交的能力，第四個才是培養ai數位的能力。也因此，造就了他們相當尊重每個人特質的價值觀。

而國發會似乎也扮演了這樣價值選擇的角色，以現在臺南沙崙一帶正在進行的南科沙崙園區的計畫為例，過往其作為台糖沙崙農場，不僅有種植鳳梨、西瓜、牧草等作物，更是草鴉的重要棲地。即便高科技廠房能夠帶來巨大的利益，老師依舊在思考這是不是我們要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價值觀，以及什麼樣的生活環境。「我要去選擇我的思考方式。只要高科技我其他都不要，那是一種選擇；只要環境，我口袋空空都沒關係，也是一種選擇。」

老師笑著說道：「我現在都在思考怎麼對你們交代，所以現在要做的、要想的事情，是我至少要幫下一代想，我不能把這個資源給耗盡啊。什麼樣的資源分配是現在最適合的，我們每天在想的东西都是這些，怎麼思考為下一代留下什麼東西，然後讓你們是生活品質最好、最高的。」也因此，當老師回過頭探討最一開始提到的人口研究問題時，老師認為人口數僅是一個數字而已，真正重要的是要如何讓國家走向最為適合的發展道路，也是老師在國發會中體悟最為深刻的問題。

開課計畫與對學生的建議

訪談的最後也不免回到老師在學校教課的經驗，即便因國發會副主委的身分而相當忙碌，老師這學期也依舊有開設「發展策略研究」這一門課，在下學期也會在生傳系開設大學的必修課。但是對老師來說，相較於學生能夠從他開設的課獲得甚麼樣的啟發，老師對學生的期許反倒是希望學生能夠與教授或者學校維持良好的關係。也因此，即便非常忙碌老師依舊讓他的研究室維持著相當良好的氣氛，過去曾拜訪過老師，且在研究室中被來自各地的零食招待的編輯懷超也同意老師的說法。立沛老師認為，學校以及指導教授作為學生的支持系統，必然能夠在學生有需要時，提供適當的幫助。即便在畢業後也依舊如此，因此老師在訪談的最後也建議學生與自己的指導教授保持良好的關係，或許在未來也能夠成為自己人生發展路上的一大助力。





多重身份的交織與自省—— 康旻杰老師專訪

◎ 訪問及撰稿：曾曉渝



▲ 康旻杰老師作為所長和高階實習課老師，最近忙於籌備城鄉所50週年展覽。(攝影：曾曉渝)

訪談那天下午，康旻杰老師剛結束跟十年前參加深港雙年展的學生的聚餐，同時也奔波於各種所務日常之中，近日總為著搬遷改造、五十週年展覽而操心。他是城鄉所現任所長，任期到今年七月底，他同時是一個在臺灣都市聚落保存工作裡浸淫了近三十年的人，汲取轉化這些經驗後也在所上開設「都市聚落與地景」、「藝術介入…」等課程，公館樓一樓在上課的晚上總是座無虛席。在所有這些現場裡，康老師同時扮演著規劃專業者、學者、老師，以及社會行動者。他在過去訪談中坦承，這幾種角色從來不好游移，卻是某種「部分城鄉所老師的宿命」。

規劃者：每個聚落都是新的學習

剝皮寮、寶藏巖、蟾蜍山、堀仔頭、社子島、過溪——每一個地名背後，都是一段曠日持久的協商史、一套在現有法規縫隙裡硬擠出來的策略，以及一批被開發體制逼到邊陲的居民。它

們在地理上或許不算邊陲，但在政治、經濟、選票、組織上，都是以相對弱勢的狀態存在於都市邊緣。「因為它的邊陲性，其實反迫遷過程要花的時間通常會非常、非常的久。」而且各聚落經驗並不完全通用。「我實話實說，並不是講什麼謙虛的話，每個聚落確實都是一個新的學習經驗。」康老師如此形容。

「每一次的經驗都是在看似沒有路、再找路的過程當中去尋找替代方案。」他解釋每個聚落都有自己的產權結構、政治處境與居民組成，「如果以都市聚落的觀點來看，比較大的差異是跟產權有關。」這土地屬於私人還是國家，決定了後面所有行動策略的基礎條件。剝皮寮是私有土地面臨徵收，康老師指出當時的核心難題在於，理性計劃難一刀定對錯，他後續反問道，「如果在都市計劃中，土地使用有一定的真實需求，你（專業者）為什麼堅持



▲ (左) 康老師帶領實習課學生到社子島進行田野調查；(右) 康老師與社子島福安社社長李元泉。(照片來源：張維哲)

保存？」。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只能一次又一次回到數據和現實去辯，就像發現剝皮寮面對人口趨勢銳減，缺乏擴大校舍的正當性，因而後續才提出將街區轉化為教育場域、徵收後回租等創新可能。至於寶藏巖和蟾蜍山，則屬於公有土地上的自力營造，但要讓居民名正言順地住在「公園」裡，又需要另闢法律途徑。可惜法源並不是工具箱裡現成的工具。

「作為所謂專業者，我們有時要從不同的法源去找出路。」寶藏巖走的是文資法，後來到蟾蜍山也沿用，雖然蟾蜍山的類別屬於文化景觀而非聚落建築群，但有了文資身份，仍是讓原居民得以繼續留住的關鍵前提。可是剝皮寮沒有這樣的身分，社子島的規模又太大。每一條路都要重新判斷，甚至嘗試與居民相互對話。

近年他也介入桃園的過溪聚落。外來資本試圖整筆收購聚落土地，他這次給的建議是讓不同家戶各自去買幾塊零散的土地，讓整體開發在地圖上變得支離破碎、難以推進。「沒想到他們就真的去買」，各家集資，東買一塊西買一塊，讓外來的開發意圖因此在時間上幾乎變得不可能。這個策略聽起來簡單，卻需要專業者對這個聚落的人、對臺灣都市計畫法、對開發商的邏輯都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但即便如此，「很多經驗都還蠻慘痛的」。他回想著，「在第一現場，你要想辦法能夠有一些解套，但不見得都成功。你嘗試過留屋留人，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做得到。這不是有一定的規則。」他提到萬華的堀仔頭聚落，整個家族最後只剩一支上想留住百年古厝和古井，其他人全數選擇都更，現場要面對上百個私有土地地主，「每個人都覺得這些建築物毫無價值，你在那個現場，老實說是非常、非常有壓力的。」

學者：從經驗到理論的深化

在行動的同時，康老師也持續嘗試把他多年的田野經驗理論化。而他關注的核心問題始終是：當邊陲聚落面對強勢開發體制，規劃專業者能介入的空間又在哪裡。要回答這道難題，首先得順著meshwork（網織）的線和社區的根徑脈，才能看見那些有機生成、難以被計畫理性收編的地方生命。伴隨著各種概念的深化與修正，在強化對社區動態過程的分析框架之外，這彷彿也是這位規劃者的一種省思。

一、研究轉向：意向化社區

「我從意向性社區一直到意向化社區，其實是一個我自己在觀察上的變化」，前者是已完成的共識，後者卻是一個持續進行中的過程

(becoming)。蟾蜍山聚落的居民是來自不同時期的移民，因緣際會住在一起，從未刻意共享某套價值觀。然而面對保存危機之後，他們逐漸凝聚，開始有了某種集體的方向感。康老師最初嘗試用「意向性社區」(intentional community)去理解這個現象，但後來就發現這個概念並不合身，因為國際上那種生態村(ecovillage)式的意向性社區，就如以色列基布茲(Kibbutz)，是一群本來就有共同理念的人刻意組建而成的，而且其領域感和排外性強烈，蟾蜍山卻不一定是個如此封閉的地方。

二、都市生態交錯帶：張力與活力的所在

在這種becoming的過程中，這些聚落本身也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狀態。生態學中有個「ecotone」的概念：即兩個截然不同的生態系統之間的交界。那裡通常是張力最強、物種最豐富，卻也是最脆弱的地方。放諸都市脈絡中，康老師則稱之為「都市生態交錯群落」(urban ecotone)。這些邊境聚落在地理上或許不算邊陲，但在政治、經濟、選票及組織上，都是以相對弱勢的狀態存在，卻是少數保有有機生命力的地帶。他因此特別強調這些地帶是邊境(borderland)而非邊界(borderline)，分別在於前者仍是有人在其中的棲地。「結果很可能一次都更(renewal)就全部把你夷平了，政權(regime)的外力是非常強勢的。每個ecotone都蠻脆弱。」

康老師進一步引入墨西哥裔女性主義學者Gloria Anzaldúa的「nepantla」概念：一種身處過渡、無法完全歸屬任何一邊的生命處境，這種狀態還涉及了情感基礎。那些聚落居民，正是這樣「living in the borderland」的存在——他們就住在邊境之中，有自己的生態、自己的時間感、自己的認識方式。

三、動態的線：3R框架

這種有機的生態既然如此複雜，就需要一個可以具體操作的分析工具。康旻杰從人類學家Tim Ingold的meshwork概念出發，把每一個居民理解為一條不斷變動的線，再從三個向度拆解這條線的構成，或稱之為「3R」：根(root)、徑(route)、脈(rhizome)，並指出或會出現一種「根徑脈化」的流動過程。「根」，是個體與地方之間的認同與固著；「徑」，是個體與外部世界的路徑連結；「脈」則是地下莖(rhizome)般潛藏底部、流動的脈絡。

他以社子島自救會成員王木琳舉例：這位大哥每天早上要去拜九座陰廟，一座一座繞，才開始一天的生活。那些埋藏在社子島人心中的地方精靈(genius loci)，是一種只有住在那裡的人才懂得流動的「脈」。從這些各自纏繞的線裡，康老師看到了一個聚落內部的生成邏輯。



▲ 社子島擁有深厚的在地文化，顯現出「根莖脈」的糾纏。(攝影：曾曉渝)

編織者的自省與自白：身至地方，田野未滿

那既然聚落是有機生長的，規劃者應該怎麼介入？康老師進一步集合前述的概念為「re-generating urban ecotone」。他首先質疑了「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一詞，「我們作為一個規劃專業者，只能去談regeneration嗎？」這個問題讓他拿起筆，在「re」和「generation」

之間加了一個連字號，亦即「再生成」(re-generation)，一個仍在流動、尚未被定型的「ing過程」。他舉蟾蜍山為例，當地土地使用分區至今未變更，聚落裡的人還居住著。「再生成的這個過程還沒有到再生，可是這正好是他非常有趣的機會。」但如果此時直接以一套一次性再生計畫介入，正在becoming的過程就等同被強制終止了。

這正是康老師最抗拒且希望大家反思的規劃方式。「如果純粹站在regeneration的角度，這個都更又沒有那個autologous(自體性)意識，那它就是取代性的，一方面再生，然後一方面替代。這最容易變成繙紳化的結果。」因此他一直思考另一種可能：「自體都市再生」(autologous urban regeneration)，這概念借用醫學上的自體療法，PRP治療把患者的血液抽取再注射回去，再生不靠外來物質，而是一種自體再生。聚落有機會不斷再生成，而不是被一次性替換。

「我們做規劃設計的人，其實是應該了解他原有的那個meshwork的狀態，我們讓自己編進去，而不是說我要來把你給換掉。」專業者進場，只是作為另一條線，進入那張已經在纏繞的網或跟他們一起編織，絕不是凌駕其上。也許有時候，規劃者只需要提醒和鼓勵在地居民說「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其實蠻好的，你其實

自己的某種能力還蠻強的」。

這個「編進去」的過程，他細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辨識並激發內部居民的能動性；其次是「身至地方」(emplacement)，扎扎实實置入田野；第三是「再地方化」(re-placement)：不是替代，而是讓空間仍能維繫在地知識的轉化。

在社子島，他曾經帶著學生把「上河圖」攤開在廟埕，居民圍過來指著卷軸說：「你怎麼沒有畫這個，沒有畫那個？」、「為什麼要畫觀音山？」最後才得知社子島沒有墓園，祖先過去都葬在觀音山，亦即島跟觀音山是不能分開的。康老師感悟道，「我們甚至比他們更像白紙。」

而隨著近年重新回到田野，康老師回望其規劃者及研究者的身分，對比起地方的滿盈，他意外發現了缺口。康老師稍停頓了一下，「坦白講，我認為我的田野工作是不足的。」進去各個聚落的起因一直都是「被議題帶進去」、「不行動就都來不及了」的：每一次的進場，日常的生命故事，就在這種不斷的緊急應對裡，一直被擱置在「日後再談」的位置。他在這幾年的社子島研究中，訪談了十幾位居



▲ (上) 康老師邀請社子島自救會發言人李華萍與實習課學生交流；(下) 當年康老師與學生製作的「社子上河圖」。

人；梅華的父親曾在社子島開農作種子店，與在地農戶建立綿密的網絡。

所長：一個行政主管的修煉

這三年間，城鄉所也是康老師另一個重點田野，每天往返於各種瑣碎所務日常之中。2023年正式就任所長，轉眼即將在7月迎來終點。「我只是知道我的個性很不適任一個行政主管，這是對自己的認識。可是如果需要我在這個時候擔任這個角色，我就想怎樣至少可以扮演好。」康老師回顧所長任期內的風風雨雨，沒有避而不談，反而顯得坦率直白。他列出一串正在同時推進的事務：城鄉所五十週年展覽、工綜館改建工程的發包延遲、校友會的籌組、接任所長人選的銜接等，但更多是手上很多日常的事情，例如一封要不要發出去、發了可能引起更多反彈的信，是工程到現在還找不到廠商的焦慮。

被問到擔任所長期間的溝通難題，和過去跟政府打交道相比，哪種更困難。他毫不猶豫的指出在抗爭協商中，他反而清楚知道自己站在哪一邊，「那個對話相較之下比較黑白分明。」但在所內處理師生衝突、學生情緒或老師之間的歧見，卻是另一種複雜。他嘗試努力兼聽，但明白最後的結果往往有人覺得不舒服、覺得沒有被照顧。溝通的拿捏因而是當中最大的挑戰。「有一種是說話說太多，有一種是你都沒說話，或是該說的時候，你以為不要說比較好，但就此錯過了一個時機點。」面對眼前最後三個月，康老師仍試圖在各種限制中看看能否走到某個階段的方向。

尾聲：繼續找路

「好朋友說你要不要來花蓮辦一個市集活動，你答應了之後就想說那好像還蠻久以後的事情，沒想到就四月就完蛋了。」康老師說的時候夾雜著一點苦笑。他也提到，希望在退休前把這些

年的研究整理成一本書，把從都市生態交錯群落、3R框架到再生成的討論放在一起，「可是我還不知道會不會真的寫出來。」

這更像是一種對自己的務實估計。身體也是真實的限制，他說得直接，「近來了解到自己的不足，身體真的沒有辦法負荷，時間上也越來越難依照自己想像的進程去好好的把一件事做完。」在所務與研究之外，康老師更需要每天往返頭城老家照顧九十六歲的媽媽，目前這就是一切的優先要務。

這三十年來，康老師同時扮演過很多角色——在現場談判的規劃者、在課堂裡傳授經驗的老師、於研究室埋頭理論的學者、應付公文之所長，以及每天通勤回家的照顧者。不是每次經驗可以直接沿用，每一次都是新的學習——他將一如過往，繼續找路，沒路再找路。



▲（上）康老師與學生討論50週年展覽設計；（下）「都市聚落與地景」期中評圖，康老師將把多位學生製作的地方小誌帶到花蓮活動展示。（攝影：曾曉渝）

在路上的旅人—— 李易安學長專訪

◎ 撰稿：曾曉渝 | 訪問：曾曉渝、林彥彰
◎ 照片提供：李易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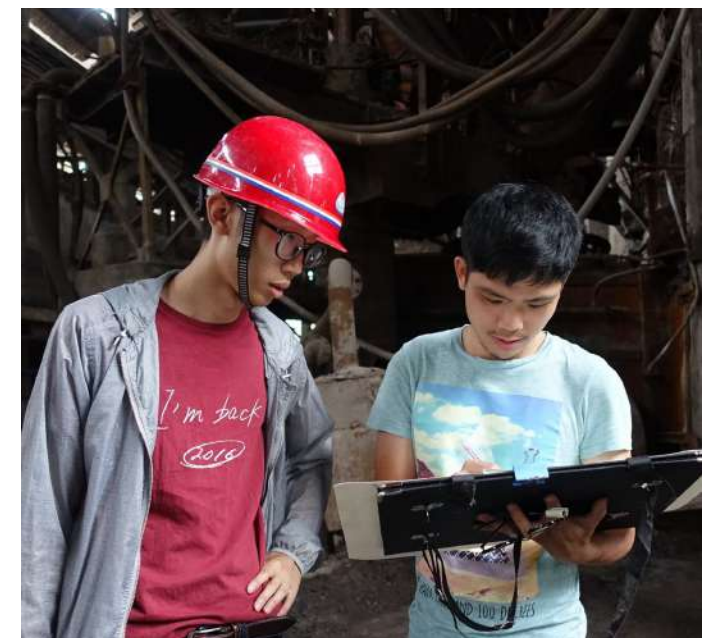


約訪的晚上，李易安學長下班後匆匆來到公館樓這個久未踏足的地方，離開城鄉所轉眼間已經五年。目前任職外媒駐臺記者的他，下班前正在處理當天的新聞稿，每天都過著爭分奪秒的生活，追求快、準、獨家的高壓現已成為日常。易安學長有多個為人熟悉的身份。他曾經為搭便車的多年經歷寫過一本書，也曾經服務於多家媒體，也許你也讀過他筆下多個深刻的報導，如中國盜砂、全球化晶圓代工的地圖專題。他20多歲就曾踏遍西班牙、吉爾吉斯和阿根廷等國。易安學長既是一個持續寫作的人，也是一個從不歇止的旅人，一直跨越各種邊界。他從國企系畢業並在職場一段時間之後，在2015年進入城鄉所碩士班，後來因職涯規劃決定退學。雖然在王志弘老師詳列其指導學生的列表中被標註著「退出江湖」（退學），但自幼對空間的觀察和王老師的理論關注至今仍影響著他分析世界的獨特視角，近年他與

▲ 2015年在土耳其搭便車旅行。



記者何欣潔合寫有關金馬的《斷裂的海》，並為黃舒楣老師翻譯其著作《困難東亞》。「我後來就覺得我整个人生都在同一趟旅行裡面。」



▲ 2016年參加城鄉所山西規劃實習課，在煉鋼廠遺址做測繪。

課本裡的地圖城市

易安學長在台北蘆洲的工業區旁長大，那是個農地與工廠混雜、排水溝沿岸長出違章廠房的地方。「附近也沒有什麼鄰里，也沒有什麼同年紀的玩伴，小時候就是一直被關在廠房裡面」。就是在那個封閉的環境裡，他開始對外面的世界感到強烈好奇。

家裡經商並沒有書香氣氛，他是整個家族第一個唸大學的人，「其他的堂兄弟姊妹、親戚，大家都是不要念書、趕快出去工作的那一種。」但那個喜歡寫字、喜歡畫地圖的衝動，從很小就已成形。他的國高中的課本裡都畫滿了地圖。「我都沒有在上課，都在畫地圖，就是想像出一個自己的城市，用畫地圖的方式在建構一個自己的城市的那種感覺。」

而他還沒等高中畢業，就已經按捺不住了。國三基測考完之後，他便開始搭火車在台灣到處跑，大學的每個寒暑假更會存錢去自助旅行。大五申請到西班牙交換，他並沒有按一般行程般直接搭飛機到達目的地，而是貫徹其流浪者精神，從基隆港搭船到馬祖，再坐小三通到福州，然後搭火車一路北上，穿過蒙古、俄羅斯、波羅的海三國、波蘭、捷克，最後抵達德國。他回憶著，那年剛好是2009年——柏林圍牆倒塌二十週年。

走進鐵幕，通往世界

那一趟旅行，他稱之為「鐵幕之內的旅行」，是整個人生的轉折點。當時的目的不只是旅行，而是想在二十年後，親眼看看這些前共產世界變成了什麼樣子。他在旅程中以沙發衝浪(couchsurfing)方式住宿並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包括一位住在柏林圍牆舊址附近的德國國會議員；在奧地利還遇上維也納大學學生佔領講堂，學生們更異想天開地在沙發衝浪網站上邀請旅人一起住進那個佔領現場。「自己的世界被打開了，然後覺得『哇，這個世界真的很有趣』。」

「我就是從那一趟旅行之後，到現在就是一直都還同樣在路上的狀態，這是最舒服的。」他補充道，「旅行就是我的舒適圈。包括越陌生越奇怪的地方。」後來出社會後做了一份策展助理的工作，做了一年多愈覺迷惘並覺得自己被困在辦公室裡，便辭職去搭便車流浪，一去快一年；當兵的時候也是自願去馬祖，因為想去不一樣的地方。

易安學長的第一次便車經驗是2009年在西班牙交換時。後來搭便車就成了他觀察世界的主要方式。「其實你可以在搭便車的過程中，認識到很多跟移動有關的一些有趣事情，這些事其實都可以反映你所在的地方的文化，或者是政治、經濟的狀態。」搭上貨車，就能看見哪些國家的貨車在走這條路線、車上載的是什麼貨、以及貨品流動的方向，就連歐盟整併的過程，也可以從便車的貨流裡看見。後來他把這些觀察和人物故事一一寫進了《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像是同時兼差甜甜圈小販的阿根廷警察、在加油站和連結車旁煮晚餐的經歷。

在路上久了，人也有所成長，除了世界觀更開闊，對人生的看法也隨著旅行的所見所聞而變得不一樣。在南美洲那趟七個多月的旅行，他才剛出發十天，所有東西就全被偷走。此後有一段時間，他只帶著一個隨身小背包和一套衣服繼續流浪。他淡然的說著這個像電影般劇情的真實故事，而這個故事帶也給他一個道理，「人的一生其實不需要擁有很多東西。真正重要的其實是頭腦裡面、或是經歷過的事情。」這種不受物質與現實牽絆的狀態何嘗不是一種自由。

易安學長在媒體訪談中就曾談及當時搭便車旅行是最自由的時光。現在踏入不同的人生階段，他對自由的想法也有所沉澱。他回想年輕時機會成本低，說走就走，幾乎沒有什麼放不下的。現在，要離開一份工作，就得盤算薪水、爸媽

年紀、積累起來的人脈……這些東西讓拋棄變得困難。「機會成本這個概念，就是如果你擁有的東西越多，你要放棄的東西可能就會越多，他其實根本不自由。」他把這種自由稱為「拋棄的自由」，跟很多人說的「選擇的自由」不同。面對現在的生活，他有時還是會嚮往回到擁有拋棄的自由的狀態。時光當然無法倒流，但他並非只停留於緬懷，而是仍對未來保有一種還原的可能，「我覺得我終究有一天會拋棄這些東西。」

成為記者，享受路上風景

「對記者的想像，一開始就是完全沒有任何想像，然後進來的時候就覺得，天啊好累。」他打趣道。記者生涯也像是一段充滿意外和驚喜的旅程。成為記者從來不是他的計畫，更不是他的志願。大學念商學院國企系，輔修國際關係，考過城鄉所，在科威特學過一年阿拉伯文，後來開始替《轉角國際》寫稿，寫著寫著就有編輯來邀稿，從自由寫作慢慢走進全職記者的世界。「我會當記者也是一個誤打誤撞。這對我來說不是一個我從小到大都想過的事，只是就自然而然就變成了一個記者，然後就走到現在。」

他在不同媒體的經歷，每一段都像是重新學習。在《端傳媒》，他自由發揮，寫長篇特稿、串史料、做議題設定。到了《報導者》，才突然意識到以前有點太自由，「有非常多的規則，寫作有一定的體例，一個專題要長什麼樣子、要幾個角度、要分成幾篇，其實都有一定的做法。」

進了外媒，又是另一種震撼教育。一如傳統大型媒體的生態，記者不時需要一邊聽記者會上發言，一邊快速篩選資料並撰稿。但易安學長最為之自豪的作品，仍然是與地圖和空間相關的專題報導，而非單純透過文字為資本家賺錢服務。他數算著數篇他喜歡的報導，包括五

指山公墓的報導——李登輝逝世後，他以這個中華民國國軍戰士墓園為切入點，談新台灣國族論述的載體；另一篇是有關台灣省政府所在的中興新村，那個凝結在特定年代的空間成為他討論中華民國歷史記憶的媒材。還有一篇台積電在晶片荒時代的地緣政治報導，他巧妙的運用地圖作為敘事的骨架。



▲ 2025年以彭博社記者身份採訪外交部長。

移動：一切的公約數

這些報導關注的也許是離散族群(diaspora)、資本與貨物跨境流動、調查走私和違規轉運，也許是基礎設施的政治性。而這種流動狀態其實也深繫他的個人生活。在那些有時不需要固定進辦公室的時候，他常常坐上一班遠途公車，一路到金山等遙遠的地方。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他並非闔眼休息，而是在移動中書寫，「這比較讓我更有生產力」。

有段時間，他開始認真思考這些興趣的來源。他認為追根究柢，這一切都有一個公約數，「這些我感興趣的東西，最後都可以連結到一個最終的、最抽象的一個概念，叫做移動，Mobility。」這剛好正是所上王老師的研究興趣，「這就是為什麼我很喜歡老王。」他還記得他未完成的論文研究主題是「韓國仁川中國城」，「我對全世界的任何一個離散族裔

族群都有興趣，其實就是人的移動，而且是一個非常大的集體移動的概念。它是一個集體的、一個移動的敘事。」

尤其是邊界的游移。在臺灣不會有用走路跨越國界的經驗，但在陸路旅行的國家，踏過那條線的感覺讓他深深著迷。「你光踏過去，就覺得世界就變了。人的行為舉止，怎樣做才是符合社會規範的，那個code（文化符碼）都不一樣了。」他記得從烏干達走到盧安達，明明兩國地理緊鄰、歷史地理相似，卻因不同的殖民史與後殖民發展走向截然不同的路。過了邊境，景觀一下子就從塵土飛揚變得整齊乾淨。

對飛地（enclave）的著迷，也是一脈相承。他過去更以這個主題申請到「第十三屆流浪者計畫」。他如此比喻，飛地是進入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之前，人類對「國家」那種點狀想像的活化石——以前國家的概念更像是忠誠關係的集合，而非明確劃定的封閉疆域。現代民族國家建立之後，飛地本應消失，卻因各種奇特因素保留到現在。「有趣的地方就在於到底是什麼樣的時空背景，讓這些應該要被淘汰掉的東西被保留下來。」他2014年就曾去拜訪當時仍存在的印孟飛地群，後來那批飛地在2015年完成交換後消失了。

這種看似漂泊不定的旅行方式，卻自有一套邏輯。他在課堂上曾以搭便車寫過一篇小論文，探討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搭便車的人看起來是一直在移動，可是他其實用以維生的那些物質網路都是固定的——固定的平台、共同的語言、相似的默契。「你會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顛沛流離的狀態，可是其實它對很多人來說，是很熟悉、很舒適的一個概念。」

學界常常談「田野」的概念，多年來浸淫於移動之中的易安學長，對此則有另一種理解。「我的場域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可是我觀察的是同一個場域。」車廂換了一輛又一輛，乘客各不相同，但若把搭便車這件事本身當作一個抽象的田野，那每一次上車都是同一個觀察的延伸，例如土耳其司機酒駕慣習、科威特人視搭

便車為認識同性對象的機會。「搭便車那本書，其實英文的書名就叫做《A Hitchhiker's Ethnography》，就是搭便車的人的民族誌。」不過他笑言當時怕被質疑，在中文書名中並不敢以「搭便車者的民族誌」為名。但他認為，其實田野不一定要在同一個地理座標蹲點，移動本身就是一種田野。

從一而終的旅程

作為一個持續書寫之人，雖然面對大眾閱讀習慣改變等各種衝擊，但易安學長對寫作的熱愛和堅持並沒有因此改變。對他而言，寫字不見得是要有讀者，也不一定與工作掛勾，「它就是一個內在的……不能說衝動，就是你會覺得有些東西，會很想要把它化成文字。」

易安學長在訪談中談到旅程中最深刻的經歷時，提到在南美洲遇見的一個中年男子，十幾年前從美國出發，希望以走路方式走到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島。在遇見的當下，這位男子已經距離目的地不遠了，「我就想，十幾年前我還在念大學，然後他就出發了；然後遇到他的當時，我都已大學畢業、做了一份工作，他還在走。」這件事打破了他對時間的某種慣性理解：也許一件事情從一開始都是同一件事情，只是它所包含的是數不清的步伐和路途，「把整个人生看作是一趟旅行。那個鐵幕之內的旅行，我到現在都還是在同一趟旅行裡面，只是去了更多地方、遇見更多人。」

至於這趟旅行要去哪裡，他並沒有答案。「我是一個很隨波逐流的人，但我就是有很多覺得有趣的事情，然後想要去寫，想要去看，想要去跟更多的人聊。」他停頓了一下，「我不是那種想要改變世界的人。我只想要體驗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對我來說是有興趣的。」

易安學長最後興奮地分享著手機一長串備忘錄，這裡存放著各種冒出來的有趣念頭：各國教科書的比較、臺灣公寓裡的和室空間、少數族裔與主流節日……還有跟韓國朋友吃飯時，因不能如常把飯碗拿起來吃而聯想到的飲食文化觀察。這都是他覺得有趣、抵抗遺忘的瑣碎日常記事。也許人生不總是需要一個確實的目的地，只要繼續走在路上，誰知道哪天會給你一個驚喜？



▲ 編輯團隊與李易安學長合照。



▲ 2015年土耳其公路邊的流動宴席。



跨尺度的空間規劃經驗談： 于欣可學長專訪

◎撰稿：張維哲 | 訪問：張維哲、宋燁博

相信大家對於于欣可學長一定不陌生，學長在城鄉所時以新店「溪洲部落」的抗爭與空間再造為題發展實習與論文，且在畢業後擔任「反造城市：台灣非典型都市規劃術」一書之作者群，並持續在規劃專業領域深耕、擔任報社攝影記者、關注社會的各種運動與抗爭，報導與評論散見各大平台。目前欣可學長在荷蘭臺夫特理工大學 (TU Delft) 建築與建成環境學院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同時也是歐盟DUT(driving urban transition) Initiative 計畫研究員，而本次越洋連線的訪談，則將從學長一路的規劃經驗談起，聊聊他持續研究的重點「參與式規劃」在不同尺度下的應用與體悟。

初入城鄉所：一起在空間中做一些事

欣可學長為本所R96的校友，回憶起當初為何要進入城鄉所就讀，學長跟我們表示，那個時候的他就已密切關注社會運動與空間抗爭，當時樂生療養院的抗爭運動十分激烈，所上很多師生都有參與，也喚起了學長對於空間的關注。

「城鄉所是一個小小的所，但我們關心好多社會議題，那些都跟空間有關」說到在城鄉所求學時期的趣事，欣可學長也可以順手捻來許多生動的回憶：從參與14、15號公園反拆遷運動，到反對校內日式宿舍的拆除，和同學們半夜騎單車將宿舍窗框「借放」到了公館樓，成

為如今地下室的日式窗櫺。關於空間的故事有大有小，但回憶卻仍然歷歷在目：「這種對物件與空間記憶的執著，其實就是城鄉所教給我們的第一課：空間是有溫度的，是有歷史厚度的。」。

回憶起當初懵懵懂懂的碩一，由當時剛來到城鄉所任職的黃麗玲老師，以及陳亮全老師帶領，欣可學長第一個實習課的題目其實是新莊大規模都市更新下「中港大排」的整治。如今時隔多年再次回顧，學長也才發現其中的「尺度感」，那個時候學長前往上新莊的工業區做調查，同時挖掘在地歷史，其實都在培養著如何將城市空間試圖拆解的感知能力，而這個「跨尺度」的思考訓練，也成為學長日後接觸溪洲部落議題的濫觴。

溪洲部落：參與、討論、規劃跟反思

在實習一結束後，下學期的實習課開放給所上同學提案想要進行的主題與場域，欣可學長選擇了新店河畔的溪洲部落投入，這個部落在未來也成為其學習與反思的重要場域。如學長所述，這個時候的實習課「彷彿超越了課程本身，是實習，而不是課。彷彿是一個不考慮財務狀況的顧問公司，裏頭有一群瘋子一定要把這件事搞定，老闆也很自由。」

那段日子，欣可學長與所上的師生在田野中做了哪些嘗試？因為部落面臨的空間牽涉在行水區居住，以及河岸開發的複雜議題，因此團隊走入部落，積極地跟34戶部落族人討論他們對於家屋的想像。在這漫長的討論過程中，議題跟田野狀況持續地在滾動，資訊量也遠遠超過當初實習課程的預估目標，於是，當時參與的夏鑄九老師、劉可強老師、陳亮全老師、張聖琳老師、客座教授延藤安弘老師，就帶領著同學們也在摸索中找到了參與的切入點。

「公共空間大家談起來會比較開心，因為大家可以一起用。」城鄉所同學們從部落的聚會所規劃開始，進而開辦工作坊、用紙箱建議簡易且可以一直調整的模型、把課堂學習到的模式語言(pattern language)拆解成族人可以理解的語彙。就這樣，溪洲部落的聚會所在當時的參與式規劃設計下逐漸成形。重建後，當時的實習課指導教授劉克強老師也回去看看，落成後的聚會所成功融入居民生活，如今看來，如欣可學長所述：「參與式設計最好的成果就是像溪洲部落這樣，好像事過境遷沒有什麼事發生一樣，我們保存了他們原本的生活方式」。



▲ 新店河畔的溪洲部落 (圖片：新北市政府)

校友迴流

投身規劃專業：城鄉所經驗能多看到的風景

在畢業後，欣可學長在職涯路上有著許多嘗試，他提到，因為一直對於空間感興趣，因此學長思考著要去隔壁的臺科大修習建築學分，考取建築師；還是報考公務員，嘗試在體系中做一個具有批判思考的存在。但後來，學長選擇先進入工程顧問公司。

我們也問起了學長在進入規劃專業界後，城鄉所的學習對於他有什麼影響。「我們好像被丟在荒野，慢慢發展出一條路，把解決方案想得更清楚，就像是大家都在邊走邊想，有些人想到答案了，有些人還沒一樣。」欣可學長跟我們分享，相較於其他建築與都市計劃系所，城鄉所的學習經驗其實並非直接教會學生可以上手的工具，而是從議題開始、從零開始，在空間中慢慢發掘一些問題，再開始著手找方法。「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可以在框架裡活得很好，因為他們有分析工具，但城鄉所很多人連議題都還在找，這樣的訓練更適合想要並願意自己去找答案的人」，因為學長認為學工具的時間其實很快，而城鄉所的經驗更能讓大家培養發掘議題、整理議題、匡構題目並且持續滾動發展的技能，而這也是學長經驗下的「實習課精神」：「實習課給我們的訓練是跟科班訓練很不一樣的，但掌握工具還是一樣重要，但是城鄉所比較著重是在做中學，且不要被工具所限制。」

帶著這樣的反思來到了規劃業界，學長也看到了一些從事規劃的現況，也讓學長認為他與空間規劃與設計的緣分未竟，因此萌生了前往國外進一步攻讀博士的想法。「我想透過念博士去整理過去人生所學與所發生的事情」，申請期間，學長多管道的考取教育部公費資格、申請獎學金，尋找各種資源，最終輾轉來到了荷蘭臺夫特理工大學。

來到荷蘭：規劃的工具集 (tool kit)

在臺夫特大學的建築與建成環境學院，學長觀察到其實大家討論的主題都很跨領域，包括不動產管理、地理、經濟都是討論的範疇。學長自己博士的專業是Spatial Planning and Strategy (空間規劃與策略)，剛到荷蘭時需要克服文化與英語作為工作語言的隔閡跟調適，再加上適逢疫情，用了一段時間熟悉，但也是這個過程，讓學長能夠慢慢地摸索，並發現臺灣與荷蘭兩地的學術風氣差異。

譬如，欣可學長延續了碩班時期的參與式規劃經驗，將其作為博論主題。大多數人都預設認為「參與」的規劃是好的，但忽略了參與的空間效果，有鑑於荷蘭的研究更注重實證，因此學長研究指出參與式規劃具有四個分析軸線，每個軸線段落都代表著參與的一些效果，以及對應誰來參與？怎麼參與？參與的效力為何？也因此，學長的研究創新之處就在於不僅是談空間的參與，更是討論空間參與效果。學長的論文野心龐大，也期許著未來能夠將分析取徑應用到許多參與式的空間計劃中。

完成論文後，學長留在了荷蘭進行研究與教學工作，擔任系上碩士班課程的老師，引導學生發想出其想了解的議題，且密集與市政府、建築師、學者接洽講授，因為對學長而言，規劃能否從藍圖到空間落地生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欣可學長同時也是布魯塞爾歐盟總部driving urban transition計畫的協調者(coordinator)，這個計畫旨在透過跨部門與單位的合作，讓規劃得以落地。譬如學長就密集地跟義大利以及希臘的學術單位與在地社區組織合作，嘗試利用區塊鏈技術作為平台，讓居民得以在其中透過交換工具、材料、知識來改造公共空間。在歐洲，政府沒有足夠資金與心力來整理公共空間的前提下，就會透過這個跨學術機構鏈接在地單位的方式進行協作，讓居民之間的DIY、循環經濟模式以及公共空間的設計與打造能夠落地，也達到實踐與研究的雙管齊下。

從臺灣到荷蘭，面對不同尺度與性質的規劃，學長也有了一些體悟。欣可學長跟我們聊到了工具箱／工具集的概念不同：「工具箱裡的工具用完就用完了，但是工具集是互相連續的」學長跟我們表示，我們不僅要學會如何使用工具、掌握工具，更要能夠在工具之間穿梭，去理解哪些工具在哪些情況下更適用。換句話說，工具集帶給我們的，是能在規劃過程中同時掌控各方面與尺度下的各種效果。

回到臺灣：我們該如何使用工具集？

最後，我們將討論的主題回到了臺灣，我們與學長說明了本期主題後，他也有了一些回饋。「空間到底是拿來規訓人的，還是真的有在規劃過程中看到他們的生活樣態？」

學長想到了之前在八八風災的倡議經驗，當時風災後宗教團體協助重建村莊，但也同時劃設了族人在村莊內的一些規訓，這個過程往往忽略了災民的實際需求。

學長認為，災後重建其實有兩層連結在一起的含義：心靈的重建與具體住宅的重建。大家都是帶著善意進去協助，但自詡為專業的規劃者跟技術官僚是否也能有同等的善意，看到災民的實際需求？而不是秉持著「我在幫助你，你就要接受」的態度。「常常大家會覺得，我幫你就是有道德制高點，感覺就能做很多空間上的決定」，但也呼應到了學長長期對於參與式規劃規劃的研究，真正的溝通在於產出的結果是否能夠被執行者所理解，甚至讓執行者也被說服，共同朝向一個目標執行，這才是溝通的「效果」。



▲ 學長與李敖於所上合照（拍攝於2009年）

「災後重建也是一種社會運動」帶著這樣的想法，學長也想說的是，溝通會疲勞，也會麻痺 (participation fatigue)。「參與本身是該做的事，但我們不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煩人家，因為人家不是只有在那邊等待我們，而是要讓大家看到參與後的成果跟過程。畢竟我們今天拿參與的策略去找執行者，若他們不接受那該怎麼辦？」。從臺灣到荷蘭，重新回望這些經驗，在不同脈絡的參與跟規劃下，唯一不變的是動手找到解答的精神。在溪州部落，欣可學長與同學們一步步摸索，透過不斷的溝通打開居民對於家屋與公共空間的討論。在荷蘭，他也跟跨國與跨領域中不同技術官僚、專業者協作，以實務導向開啟一系列的參與規劃。

最後，學長也分享了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在《看不見的城市》中，馬可波羅對忽必烈描述虛構城市 Tamara 的一段話：

"You take delight not in a city's seven or seventy wonders, but in the answer it gives to a question of yours."

「你喜歡一座城，不在於它有七種或七十種奇景，而在於它對你的問題所提示的答案。或者在於它強迫你回答的問題。」

在這本書中，Tamara 這座城市充滿了符號奇景，但若只看這些，城市就只會是冷冰冰且被定義好的景觀。學長認為城鄉所也是這樣一座「城」，表面上塞滿了各種價值、理論與主義，「絕對超過七十種」，但只有當你帶著個人的生命問題走進這裡，這座城才有意義。它不再只是理論堆砌，而是一面映照出你對空間實踐、對社會關懷最深層渴望的鏡子。

城鄉陸生十五年：訪談錄

◎ 召集人／主持人：楊一萌 (R07)；李舒恬 (R05)

2011年，中國大陸學生首次獲准以學位生身份赴臺灣高等院校就讀，迄今已逾十五年。然而，相關政策於2020年以新冠疫情為由暫停，後延續至今；原本已在台就學的陸生，近年來也陸續完成學業、相繼離台，這項「試點」政策至此走入尾聲。這個被稱為「陸生」的群體，曾在特定時代下湧現，如今悄然落幕，他們值得被更多人看見與理解。

遺憾的是，在兩岸關係日趨緊張的當下，陸生的形象往往被化約為統戰或對抗的工具，個體的真實經歷也常遭掩蓋與忽視。

這其中，來自城鄉所的陸生或許尤為特別。城鄉所一向強調民主與參與、批判與改革等核心價值，聽來似乎與被刻畫為「威權」的中國大陸形成對比。那麼，這些陸生當初為何選擇來到城鄉所？他們在這裡收穫了什麼？又將什麼帶回了中國大陸？城鄉所的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於對岸付諸實踐？需要經歷怎樣的轉譯與調適、面對怎樣的掙扎與衝突？他們又會如何描述這段「來時路」？隨著陸生陸續畢業，或走向職場，或選擇繼續深造，這些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

自2013年以來，已有47位陸生從台大城鄉所畢業。他們返回大陸後，足跡遍及規劃院、房地產企業、政府機構、科研院所、鄉村及非政府組織等各個領域，展開了豐富多元的實踐。他們既是經由城鄉所訓練的「局內人」，也是持續見

證城鄉所發展的校友——「城鄉所」構築了這群陸生共同的經歷、記憶與社群網絡。值此城鄉所五十週年之際，我們相信，陸生群體作為城鄉所過去十餘年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在此留下印記。

本次訪談的召集，正是出於這樣的思考。我們希望在兩岸關係急遽轉變、陸生政策走入歷史的背景下，回望城鄉陸生的經歷與實踐。我們不預設結論，也不囿於宏大的政治敘事，而是透過回憶、講述與對話等樸素的方式，還原他們返程後真實鮮活的故事。

為此，我們邀請了十位畢業於不同時期，目前在不同行業中工作的城鄉所校友參與：

王瑤 (D03, 高校教師)
蔡舒翔 (D03, 高校教師)
王歡 (R07, 城鄉規劃師)
黃潤琳 (R01, 社區規劃／社區治理培育導師)
周勇 (R03, 博士後研究員)
董其樂 (R07, 數字化產品項目經理)
楊伯中 (R08, 建築設計師)
姚麗金 (R08, 項目策劃)
李彧 (R09, 城鄉規劃師)
姚之璇 (R09, 公務員)



一、為何臺灣？為何城鄉所？

在特殊的政策背景下，去臺灣求學仍然是一個小眾的、甚至有風險的選擇，相比其他常見的留學去處，還要考慮到「三限六不」等等限制。陸生是出於什麼原因來臺？為什麼會選擇城鄉所？今天再回頭看，他們如何理解當時的選擇？

一本書、一個人、一棟房子、一個新的想像

王歡：（申請城鄉所之前）我在規劃院待了兩年之後，感覺可能沒有成長。一直都做同樣的東西，好像這樣的環境也挺舒服的，但就是沒有什麼發揮的空間。這裡不得不提到一個人是張和強。他很喜歡分享，那時候給我最大的觸動是城鄉所的實習課，他們做的是寶藏巖。（我）當時就覺得好像在做很好玩的事情，原來上課還可以這樣上。另一個讓我決定要申請的原因是，和強給我發了一些資料，其中有一本書叫做《減速慢行》。據說是王老師「小時候」為了賺稿費寫的，先是投到報紙上，後來又把那些文章集成一本書。《減速慢行》裡不僅有專業的思考，更多是一些雜談。它傳達的對於生活、生命的理念完全戳中那個時候迷茫的我，王老師寫說，腳步慢下來，慢到可以看到路邊一株小草的生長。這本書讓我決定一定要申請。

蔡舒翔：我本科念的建築學，當時教學主要是培養符合設計院的技術型人才。但我在設計院實習沒幾個月，就覺得設計的流水化和空間的快速生產模式很可怕，毅然出國改讀了室內空間設計、偏藝術方向的碩士。當時在國外看到很多保護很好的老城區，就感覺中國的老城都怪怪的，又說不出哪裡怪，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心裡。碩士畢業後，我選擇了去高校教書，但每年都教一樣的東西，覺得沒有成長，就想去讀博。申請博士時，對城鄉所僅有一個模糊的印象，

是一則老房子被拆的新聞報導，臺大的師生去抗議。當時其實不太清楚自己要幹什麼，進了城鄉所後，才發現城鄉所這麼獨特。它（城鄉所）會給你打開很多不一樣的門，雖然學習的過程挺辛苦的，但其實很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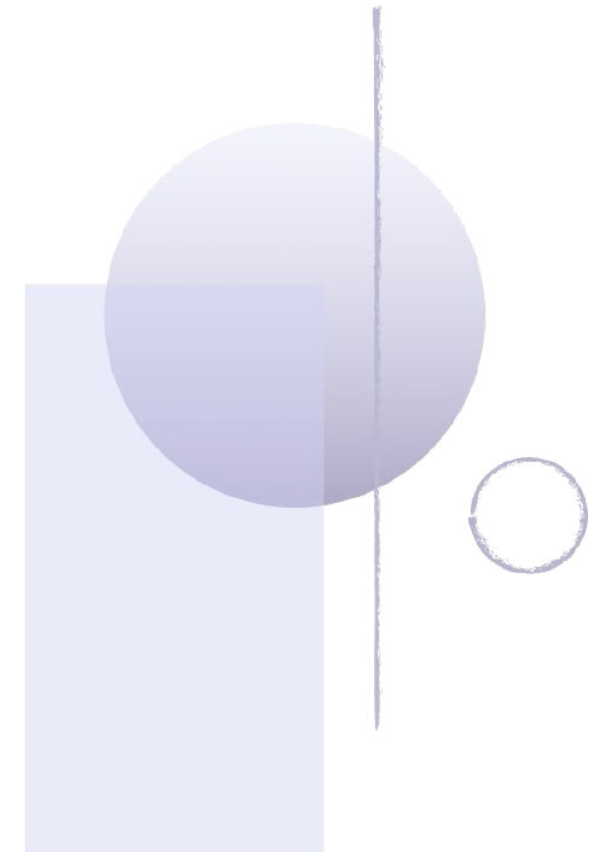
李或：我大學其實就是學的土地管理。我在大四上土地政策的時候，其實我一直在做社子島的區段徵收，當時一直在關注土地正義相關的議題，然後我查了一下，最開始很心儀康旻杰老師，他做的方向和我比較契合，所以一開始就是奔著他去寫的研究計劃書。

洞琳：我的本科在中大心理系。最開始對城鄉所感興趣，是因為大四那年有一門質性研究的課，其中有一篇小畢寫的有關婦女家的空間的文章。我看的時候很受觸動——這篇文章幾乎同時囊括呈現出所有我感興趣的領域的痕跡，包括心理家庭支持、物與環境空間的心理學分析、紀錄片拍攝、藝術策展敘述……大三大四期間，曾對日後人生方向該如何選擇的極度迷茫和焦灼，都在看到這篇文章的瞬間平靜下來——原來不用非此即彼，而可以共存共好，多元共力地去幫助幸福的達成。

在此基礎上，我開始想瞭解更多，試著查找跟小畢、跟城鄉所有關的更多的資料。當時的城鄉所網站還沒改版，只有一些課程名字，缺少細節內容；其他老師的文獻在這邊也查不到，自己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參與式規劃設計、空間批判等等這些寶藏在。幸好小畢有自己的網站，讀到了他更多的文章後，就堅定了申請的決心。後來回想起來，城鄉所打動我最重要的底層邏輯，是它的人文關懷。當對人的尊重和關懷足夠的時候，無論踐行哪個科系、領域、載體，都能達成和傳達出來。來城鄉所，真正追求的就是那種人文關懷。

姚麗金：我當時是對國內的學術體制產生了一些質疑，讓我想換個專業讀一讀。然後通過媒體瞭解到蔡博藝，知道她在城鄉所就讀，我就去順藤摸瓜瞭解一下，發現城鄉所的理念和我當時不太開心的一些點，比較契合。本來有考慮過香港的高校，但有老師建議我可以往臺灣這邊看一看，臺灣的教學比較契合大陸，有朝一日可以把臺灣的所學搬到大陸來用。我一聽好像確實還不錯，我又是一個比較喜歡另闢蹊徑的人。

王瑤：我跟大家比較不一樣的是，福建高校其實很早就跟臺灣的高校有閩臺合作計劃。我們當時會有那種三加一合作項目。三年在大陸讀，然後有一年要去臺灣修課，拿學分，然後也有兩邊聯合培養博士的計劃。所以我們學校其實有蠻多的老師都會申請臺灣，來提升自己的學歷。2013年我去武漢理工大學做了一年的訪問學人時候，就把去臺灣的proposal給寫了，我也問了我訪問學人期間的指導教授，我說臺灣這麼多學校，我要怎麼選？他就建議說，從國際排名來選好了。排最前面就是臺大，所以最開始我其實對城鄉所沒什麼概念，純粹就是按照世界排名。



二、城鄉所在對岸：認同和翻譯

相比其它更常見的留學地，陸生畢業離臺後常常面對的困境是，瞭解臺灣、瞭解城鄉所的人不多，甚至臺灣會連結到更多負面的想像。回去就業，「城鄉所」的標籤、理念、價值，常常要經過一個艱難的翻譯、解釋與再確認的過程。這其中：



- 陸生如何介紹自我？如何解釋城鄉所？
- 記憶中的城鄉所的價值為何？如何可能實踐？
- 如何重新翻譯和詮釋城鄉所的价值、理念和認同？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

黃潤琳：畢業後，我會很驕傲地自我介紹——「大家好，我來自臺大城鄉所。在座大家是不是沒聽過？但我跟你講，城鄉所是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翹楚，早在七、八十年代還沒有什麼人關心的時候，它已經開始在推動參與式規劃設計了。你不知道什麼是參與式規劃設計？也沒關係，但你不是講社區營造嗎？臺大城鄉所和城鄉基金會也是最早開始推動的單位之一，遠在臺灣還沒有正式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出來之前，就已經在推動社區營造，做到現在已經三、四十年了。很有幸我就是在那裡學習出來的。有參與的社區，是非常動人的，有極強的凝聚力和溫暖感。畢業時我帶著爸媽不跑景點，專門去社區，他們都超受感動。歡迎大家有機會，親自到城鄉所，到參與式的社區，多瞭解，多看看」。

現在會要有一些調整。因緣際會，我常受邀擔任黨建引領基層社區治理（和社區營造）人才培養計劃的導師，這些培訓多由各市、區、鎮街的組織、黨群、社會工作、政法、民政等官方牽頭，面向社區書記和基層黨委骨幹開設。我政審沒問題，但大概在2019年起，開始會被提醒，不要強調畢業於臺灣。自那時起，在開課或評審等自我介紹時，就往往一筆帶過，更多介紹畢業後在大灣區的各種實踐經歷累積，以及被授予的社會身份，也更強調凸顯制度優勢和本土經驗；等到了課內講參與相關的具體方法、案例引述、核心理念時，再找合適機會為大家引介城鄉所。

王瑤：我們這裡對臺大的認知特別弱。我記得我在去臺灣之前，我們領導就問，你去臺灣哪裡讀書，我說臺灣大學。他說是臺灣什麼大學？我說臺灣大學。就是他們不知道有臺灣大學這回事，他們就知道什麼中原、雲林，那種和大陸這邊交往比較多的學校。這幾年在建築和規劃學界，因為老夏在大陸，而且到處去參加各種會、做主旨演講，所以臺大城鄉所在大陸的建築和規劃領域還相對比較出名。

姚麗金：在媒體領域或者是國內的學術領域，我覺得城鄉所還不夠火。他們會面試我的原因多半是因為他們知道夏鑄九，所以願意跟我聊個天，然後覺得我是適合他們工作的。反正我畢業有兩年了，中間找工作其實還蠻坎坷的，經歷了一段到底要不要繼續做城鄉相關工作的糾結期。我也可以完全摒棄城鄉所教給我的這些東西。去做時下比較熱門的，比如說直播行業，只要我把全做架構的東西全都給丟掉。但是又覺得說，好像還可以再發揮一下餘熱。

楊伯中：我那時候畢業，主要有兩個訴求，一個是念到更多的知識，無論是什麼方面知識，然後另外一方面是就可以更瞭解臺灣這個地方。因為之前在東海大學，雖然待了五年，但對社會瞭解還是蠻少的，如果到臺北的話感覺就還不錯。

但是，念了城鄉所，在臺灣的建築語境下，所有人都覺得你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異類。然後念完之後，居然還回到建築師事務所找工作，

校友迴流

這就是一個更加奇怪的事。雖然我們叫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但我是完全沒看到跟建築設計有什麼關係，也沒有教你任何做建築的方法。對於我來說，從很功利的角度來看，如果抱著要找到一個更好的建築的工作想法去念城鄉所，不僅是完全沒用，甚至是在技藝上有所退步了。我工作前期還有點痛苦，需要尋找一些做設計的手感。

周勇：我入職的時候，他們（工作單位）有進行政審考察，對社區、大學、以及工作地的一個審查，因為我是黨員，是需要從之前的黨支部開政審說明，並且也會詢問你在單位的學習情況等等。其實回過頭來看，從就業角度來看，高校間的學術合作交流並不樂觀，在臺灣讀社科方向的碩博士的性價比是不高的。但是，我遇到了城鄉所的好老師，也因為城鄉四十接觸了城鄉五老，多花幾年、多折騰段青春時光，也不是壞事。

姚之璇：（臺灣背景）不算優勢，但也不算劣勢。他們（工作單位）主要還是看你這個人的想法，來我家鄉政審的時候，更關注我的成長軌跡和愛好，並在交談中瞭解我的性格，學業上更關心我的研究方向，對工作上是否有幫助。後來在聊天中才得知，由於兩岸關係，我又是他們遇到的第一位有臺灣求學生活經歷的人，所以比較嚴格，但說實話他們具體考察了什麼我也不知道。

楊伯中：像我回來求職，其實很難去找那些國字頭的單位，也就是各地的大型設計院。而且我那個時候，2022年底2023年初求職那個時候，這個行業（建築）已經血崩了。想要進入設計院，可能還是要有一些社會脈絡在裡面，比如說像長三角這個地方，可能還是要跟設計院有或多或少的關係，無論你是學生、還是你在哪個大院工作過、或者是你要在那個遊戲圈裡面。

像我就屬於是狗不理，誰看你都不爽。一個就是你本身就是臺灣念建築回來，然後這個國字

輩兒的就覺得：你誰啊你，我不熟悉你的這個學歷，而且那麼多老四校老八校的學生根本招不完。所以我就去了現在的這個臺資設計公司，但又覺得你念了城鄉所，名聲更臭！雖然這個想法本身是很莫名其妙的，但現在就是，老老實實做一些本分的工作。

李彧：我回來後也在想，去做一些跟臺灣相關的項目，所以去了福建省（規劃設計）院。當時我剛進去的時候，是在負責跟平潭相關的一些項目，他們是在做住建廳下面的「高質量發展」項目，主要就是去講他們（平潭）的社區營造，然後就可以把學到的內容和國內的社區建設融合。平潭是離臺灣最近的地方，當時他們就是在借鏡臺灣的經驗。

其實當時我的領導可能也不知道城鄉所在幹什麼，但是他知道臺大，以及是臺灣頂大的背景。臺大給我最大的優勢，就是領導把我歸到了和同濟、東南、浙大同一批人，所以他會願意帶著我去做一些發改委、住建廳、自然資源廳的項目和課題。但進去之後覺得跟一開始的期待還是有一點點差距。和臺灣有關那一部分一般都是做課題（實際落地項目不多），會涉及到借鏡社區營造的一些經驗，但還是比較有限。

從「我們反對」到「做中學」

王瑤：對我而言，我覺得城鄉所最核心的標籤是「我們反對」。我記得當時還收到城鄉所的一份伴手禮：一個布袋、一條圍巾，上面就有（我們反對）。我覺得這個「slogan」其實反映的是城鄉所比較強調的一個批判精神。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受益蠻多的。就是有「critical thinking」之後，你在面對主流的一些規劃的時候，你才會有人文關懷的那部分。我覺得，如果作為學者，是要有那種批判性的精神，你才有辦法指引著你繼續往下走。

黃潤琳：「我們反對」對我而言反而觸動不是太大。可能因為我從小就是個粵語裡面說的「反骨仔」，從小就對很多事情有不同看法，會跟許多師長、跟家長對著幹的那種。有一半老師會很喜歡我，但是另一半就很討厭我。所以，批判這事對我來說很早以前就有，當然也包括如何與所帶來的代價相處。

但是有兩件事情，城鄉所對我影響蠻重要的。一個是「做中學」。我自己覺得蠻幸運的是有機會參與各種高階實習和跨域實踐。首先，它們都會直接把你丟到一個真實的場地，既鍛鍊磨合溝通，也能快速收穫積累各種經驗。其次，高階實習課程之後，我還有去搞社區藝術節，搞鄉村教育支持，都有得到師長和同學們超多的牽線搭橋和支援幫助，而且哪怕不是以一個開課的形式，在城鄉所和臺大的平台上，都能找到夥伴，然後一起做。

而更重要的是，這個過程的收穫、反思、體悟，對我自己日後到底要走怎樣的路，起到了很重要的參考價值。它給我提供了很重要的機會，去看不同的路是怎麼走的。然後在這個過程中，我更好地去問自己：既然走過一次，以後你真的想要走這條路嗎？這些事很難光靠腦袋想出來的，是靠身體的感覺體悟出來的。我畢業後如今會有些無奈的地方是，培訓方給到的傳授時間，往往都是短短的兩天、最長也就四、五天，然後就沒了。很難有特別完整的機會，去帶著社區的人去「做中學」。

另外一個對我比較重要的是，親自感受到「參與」是一種價值觀。畢業回來後，每次我講「參與」，都會強調它除了是一套方法之外，更加是一種價值觀。對我來說，它是一種生活方式，

是一種更深層的處世之道。在城鄉所這四年裡，會打動我、讓我覺得這件事情可以值得往前走的，其實不是學識或理論，而是老師和學長姐們身上的那個狀態——大家就像在困難巨浪的沖刷下，一直堅定地在那裡。不是那種硬著要去打仗的那種堅定，而是雲淡風輕地在那，不至於躺平，但就在那裡有一個放鬆又堅持的狀態，踐行著「參與」。我很欣賞和觸動於人可以活出那個狀態。

蔡舒翔：「critical thinking」也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但你也要去做，你不能停。城鄉所強調的質疑，是讓我們懂得去行動、去做。從思考、到往哪個方向行動，這個過程就是把自己當成一個行動者。這是城鄉所讓我蠻有觸動的，讓我知道自己是有那個能量的，有機會去做一些事情的。

姚之璇：城鄉所確實鍛鍊了思辨能力。當然這有一個弊端，就是大家說的話，我每次都想要反駁他，都覺得人家說的不對。時間久了我也在反思，我為什麼要以一種這麼「刻薄」，但可能沒有什麼內容的角度去看人家，好像為了反對而反對。

但對我現在的工作來說反而是積極的。剛開始工作頭兩個月的時候，有一些設計單位來匯報，人家講的天花亂墜，我剛開始真的覺得挺好的。後來我們的分管領導就提了一些建議，是更多偏向於一些落地性，我就發現（這些設計）確實不符合我們的現狀，然後我就會聯想到（城鄉所）哪位老師跟我們講過，這就讓我開始回憶在城鄉所的日子。

李彧：但規劃院好像就不需要你有想法，你只需要滿足甲方的意見，你有想法就代表你的工作量反而會增加。

董其樂：城鄉所給我的感覺是一種情緒，就是憤怒。我自己很想保持那種憤怒的。但我現在上班

上多了就沒什麼憤怒了。就是城鄉所教我的那種批判跟思考方式在上班的時候沒有用。因為你面對一個客戶、面對一個老闆，然後面對著（給）你發錢的，你敢（憤怒）嗎？你也不敢怒。你就算知道這個東西不對，他畢竟付了錢，那你想怎麼樣；然後你想你的客戶是政府，那他想這麼做，你也理解他的立場，因為他也有他的領導和他的處境，我有我的立場跟我的處境，然後我們就和平共處幾項條約，把這個事情做完就過了。反正我很明白我在做個什麼事，他也明白他做什麼事。這就是我現在一個尋常工作狀態的處境。非常不年輕。我也很想憤怒，我看到這些事情，我憤怒不起來。

翻譯「批判性」？

蔡舒翔：「批判」這個詞，在高校裡，或者說在社會的大多數人眼裡，似乎是一個不太好的詞。經常有人會覺得你為什麼沒事要批評，要搞激進，要反對什麼。他們對這個詞的理解跟「批判」其實是不一樣的，他們不太願意去接受、甚至都不嘗試去理解你所說的，就覺得你是脫離現實。其實很難去把你思考的，包括城鄉所告訴我們這些價值觀念去傳達給他們

所以從城鄉所回到自己生活、工作的地方，這幾年也讓我反思，很多事情要學習像打太極一樣，不能一拳直接打在對方身上，可能要通過一些方法去轉變。在教學和研究方面，我更多是去做一些實質性的記錄，主要是跟歷史有關，也引導學生去這樣做，從歷史中反思當下的問題。

王瑤：我覺得是這樣的，你不是直接講批判這兩個字，應該叫做批判性思維。好像現在還有一種新的翻譯，叫做思辨性。

我記得我當時在廈門給學生授課的時候，有

一位來自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校內督導團成員來聽我的課。我當時就在跟學生講批判性思維。那是一位很老的老師，很資深的學校督導團老師，他也蠻贊同我在教學生批判性思維，他覺得學生需要有這種批判性思維。

我覺得倒是不衝突，就是我們不要特地把批判這兩個詞提的特別重，我們其實就在講批判性思維，相對來說講得更委婉一點，或者在我們設計學的學科裡面，這也叫做「創新」。設計學其實有一個板塊叫做社會設計，還有一個就是社會創新設計，其實這兩部分就比較接近我們的參與式設計，然後它裡面也會有一些批判性思維在裡面。

我另外一個方式，是藉助讀書會媒介。有一些馬派的書，我也會通過給學生開讀書會的方式讓他們知道，比如說德波的《景觀社會》。剛開始，設計學的本科生可能不是很清楚那個概念，但是讀書會上我就跟他們解釋，然後我的學生會馬上把理論結合到一些案例、或者放到自己的身上。我們設計學科，其實也有一本書叫《批判性設計》。我們也在讀那本書，然後還有一些空間人類學、設計人類學等等的書都選入讀書會書單裡頭。這些書裡面都會包含一些批判性思維的概念，我現在帶的碩班學生，他們可能一開始都不知道什麼叫做批判性思維。當我們開完讀書會，開一個星期、一個學期之後，她／他就很清楚批判性思維是什麼，也能在她／他的實踐的部分，或者是在寫作的部分中開始注重這方面。

黃潤琳：廣東旁邊的香港，他們的通識教育改成了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從以前的批判性思維為核心，調整為強調明辨性思考、國情認知、法治與國民身份認同。在我們廣東這邊，無論學術界，還是官方，還是民間，這邊的語境很少用「批判／

批判性」這個詞，我心中也有一盞燈亮在那裡。其他領域也有類似的邊界，比如說兒童友好 (child-friendly) 領域，你查未成年人保護，現在不講校園霸凌，改講學生霸凌。姑且不談師長、校職工等會不會霸凌學生，但有些詞，國家法律條文或地方社會規範不會去談。

李彧：我在做平潭的課題的時候，其實平潭發展不起來很多原因是在政府層面的，但當時我們最開始將意見提上去之後，領導說要（把這部分）全部拿掉，就是你不可以說人家的政府沒有關注到這方面，所以就是還是蠻痛苦的，就是你要換一種詞彙、或者去換一個角度去聊。

黃潤琳：所以對我來說，不是去翻譯這個概念。相反，回到大家會遇到的具體處境中，邀請大家多想想，什麼才是真問題，什麼才是背後的癥結？視角豐富了之後，除了老方法，還可能有哪些可為有效的新方法？這樣往往就能打開一些新可能。在參與式規劃設計和社會治理的課程裡，我也回到老本行，從心理的角度，儘量讓大家體驗一次，當你和他人不一樣，但依然能被尊重和聆聽，大家也能共力共成的時候，你的感覺是怎樣的。當大家有了更多安心的切身體會，才更有可能去理解和實踐「不同」與「和」。

王歡：我跟張和強聊，我說我們從城鄉所學到的東西好像又要拋棄了，再度回到同一個行業工作，我又要重新撿回中大（廣州中山大學）學的那些宏觀、具有規劃理性的戰略技術，我才能繼續在規劃院混下去。他當時說，你在城鄉所學到的那些邏輯已經融入到你的思考裡面去了。其實在這個訪談過了兩年後再想想，確實有融入了。我是那個被城鄉所的思維影響過了我的我，但我也不是完全認可了城鄉所，而是把城鄉所教給我的東西，在新的實

踐中驗證了不可行、要如何「調適」（這也是我的碩士論文的關鍵詞）、要怎麼解決在規劃院實際遇到的問題。

三、實踐中的阻礙、堅持和調適

城鄉所畢業的學生多半會遇到一個問題，即學到的知識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用」的。陸生也有相似的境遇，但在中國大陸的實踐背景下可能又有獨特之處。



- 城鄉所的知識可以在中國大陸被實踐出來嗎？有怎樣的阻礙？
- 陸生在特定項目和脈絡下，可能會有怎樣的調適和策略？
- 這些實踐多久才能看到其效果？結果是積極的嗎？



學以致用真的可能嗎？

黃潤琳：完全可能，我很幸運遇到各種學以致用的機會。畢業十年了，首先，前五到六年裡，自己在大灣區不同城市親自做了大量第一線項目，取得好多成績和認可。但這段時間裡身體熬壞了，如今可以動腦，但不能動太多腦，氣不足，更難以長期奔波或在外駐點。此外我也一直堅信「助人自助」更為重要，哪怕我不在，那個地方依然會繼續轉下去，就像城鄉基金會支持過的社區那樣，那才是可持續的。所以，我這幾年轉向培育和支持在地人才。

不過培養人才真的很難。大家不是學生的狀態，往往已經在崗位上，比方說一個社區書記，或者說一個社區黨委委員。他若要調整優化的思考和工作習慣，首先就需要他自己願意和努力。即使他願意、他的團隊或上級領導也不一定很配合支持。另外在我們的脈絡中，這些夥伴往往時不時就會被安排換崗換社區。這些都很考驗緣分。產出百分比不高，但一旦開竅和時機合適，已經有很多社區人才開出了花，有的甚至從人人看不起的軟弱渙散村變成全區明星村，上榜「學習強國」或獲得國家級榮譽稱號。近幾年則多了另一個更深入的新挑戰，來自政經緊縮下，公共支出比例的調整。

一句話說，學以致用完全可能，但真的很考驗機緣。而在外缺少彈性和機會的時候，從自家社區、自己身邊做起，更能夠超越困境，在沒有有項目支持、沒有靠譜資方的情況下，能名正言順且低成本地繼續發揮自主性，讓低門檻但貼地氣的小事情繼續發生。哪怕這同樣也講機緣，但自己的實踐經驗和對大灣區其他夥伴觀察裡，這樣做相對更易持續。

姚麗金：王老師對我的影響還是挺大的。他在某一次讀書會說，我比較適合回到嘉興工作，我也不太理解為什麼當時對我說那樣的話，但現在我似乎真的按照他的說法，在嘉興找了一個，跟城鄉所比較契合的研究所工作。在工作方法上蠻相似的，就是直接對接政府，幫他們從零開始對地方做田野爬梳。

我們會從我們的角度去梳理地方的問題，告訴他們地方的問題在哪裡，然後會把、比如說文物領域等等相關各個部門的負責人都聚到一起，大家一起來聊一個天。相當於是一個蠻系統的地方諮詢的角色。我還蠻享受的。我覺得比較有特色的一點是，我們跟設計院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有絕對的自主性。雖然說日常跟設計院一起工作，一起評議，但是他們完全不會來

干擾我們的想法。這蠻奇妙的。

但我並不覺得未來它可持續，主要是因為錢。我覺得做類似的工作，經濟狀況很差的情況下是很難得到支援的。非營利組織是很難得到政府經費支援的，你只能從兩個管道去獲得支援，一個是企業，如果你要從政府那個方向拿錢的話，就得做很多可能違背研究院初心的事情，然後政府還不買帳。我在基層看到的狀況是，現在只能花很多精力去做願景規劃，其實就是「畫大餅」，這個大餅很多基礎條件都沒有辦法滿足的。但是拿出來能夠幫助官員完成他的指標，但是對於整個城市的發展來說，我覺得是沒有用的。

而且，我能夠接受在職業初期領很低的工資，但是我覺得我沒有辦法一直領很低的工資，未來可能會考慮轉換角色。怎麼說，我覺得城鄉所教的這套東西對社會來說很有用，但是沒有辦法幫助我變現，這是可以說的嗎？

周勇：不能持續「用愛發電」。我們當時一起畢業的一個學生，後來在臺灣還會每年一起聚餐，他們還在做都市計劃，他們就一直吐槽城鄉所教大家的是：進入社區、進入那個場域，但不告訴大家如何退場。但這類場域都是靠自己的熱情，然後當你熱情消耗完的時候，怎麼辦。憑什麼我們做這麼多的事情？

我就覺得現在我越來越不像城鄉所的人，或者說，認清生活的現實之後，城鄉所教導的那些很多是烏托邦的東西。你是要評職稱的，你要非升即走的，所以，現在人家（研究者）找我做事，我都先問這個有沒有績效，然後能否發論文？城鄉所強調的是，要對社會有益，但如果對社會有益，其實是要你去燃燒自己，用愛發電，但到後來，你發現，自己可能都照顧不好自己。

我工作後第一年，春節以及法定假期會去一個300公里外的偏鄉村落免費幫忙他們做設計與營造，但是，這個對我的職稱有用嗎？學術圈的現實，不論是臺灣，還是大陸，你去看看有那些最快評上職稱的人，不用看他說了什麼，而是做了什麼？比較一下，是不是跟城鄉五老或者老一輩城鄉所老師教誨我們的不一樣？

董其樂：就很直覺的，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有沒有錢，錢從哪個口出，什麼時候到，然後我要派幾個人。完全沒有情緒，全部都是技術。我本來作為一個項目經理，就是對我的公司負責，對我們的成員負責。可能因為我在公司裡面，做這些事情的立場或思考的維度沒有那麼掙紮。可能像勇哥這樣子，就是會考慮這個事情的公益性。我本身就是政策研究，我跟你講，我沒有價值，我的價值可能是錢，這個項目是多少錢就做多少錢的事情，我能達成什麼目標就是什麼目標。

但你仔細想想，城鄉所教的還是有關係的。比如，我在想這個裡面的張力是什麼？該怎麼去利用這個張力，再重新找空間？一個資本運作的項目怎麼做？當然你可能講，城鄉所想要教你的不是這個事，但它教了你裡面的邏輯和原理。

姚麗金：我覺得城鄉所經常說的行動者網絡體系，落實到具體的工作當中，我覺得還是一直都有在用，在田野的時候，在報告寫作的時候，在跟政府建議的時候，包括真的去辦一個活動，把大家聚在一起座談的時候，其實都有運用到理論。怎麼說，這個東西其實也在一定程度上幫我們去正視目前的處境。

這個社會或者說政治體系裡面存在一些的問題，擁有這一套話語體系，我就不會因此陷入情緒，而是會更好的自我消化，去發現問題，然後去理解我可能就是一個小角色。但我也可以試著去助推、解決有些問題，我也會嘗試在內部的文章當中體現出來。

李彧：我們當時做發改委的項目，是福建省的區域發展戰略，從一個地塊的問題，變成了所謂的都市圈跟城市群，要求你去看整一個省份的經濟和產業發展為什麼差異會這麼大？（城鄉所）還是限制在一個比較微觀的視角。

楊伯中：我也有做一些鄉建（鄉村建設）。我覺得鄉建可能是我工作一年多以來和城鄉所最有關係的了吧？因為這個東西就比較小，週期也短，可以直接面對村支書。我其實有去場地幾次，還是蠻感動的，我終於看到在體制裡面活的人，在做事情的人，而不是天天看什麼發言稿。

鄉村基層真的是太多事情了。村子所有的事情，每年的指標，是他們要達成的。一級一級政府命令下來，他們全部都要在某件事情上有所體現，包括村裡誰去撿垃圾，然後什麼去幹社區食堂，然後這些東西每一件事情都要對應某個指標，或者幾個指標，所以他們其實事情非常多。

剛好我們這個村支書也算是蠻有設計追求的，他們不想去做那種很制式化的新農房！我在做這個時候，我中間有那麼一瞬間覺得我好像又行了，我可以學以致用了，然後我還想說要不要參與式設計一下，然後我還跟潤琳要了他之前做的案例的經驗。

我是那天突然想起來，是不是第二天見村支書可以提一下這個事，然後我再問他（潤琳）要；結果第二天早上起來，我跟我主管商量一下，發現根本沒有時間講。這個議題要在很早之前就提出，否則就完全沒有一個可以讓你提起這件事情的機會，或者是即便提起、它也不會被安排到會議上。我現在更覺得做這件事情還是蠻不容易。

認真來講的話，城鄉所做的事情，如果從很經濟、很利益的角度來看，確實對設計公司來說幫助不大。我們通常是扮演了一個幫助企業、剝削他們的勞工、跟地方政府同流合汙的角色。我們基本就是幫他們蓋一個血汗工廠的房子。他們很多甲方都是跟地方政府有一些角力，尤其是臺商過來的。然後我們的責任就是當好小弟，當你的甲方覺得他今天要用點手腕跟地方政府battle一下，那我們就開始加班加點幹活，趕緊幫他把他的籌碼做出來。

能不能有立場？能不能有價值？

董其樂：老實說，在技術方面，（城鄉所學的）對我目前的工作確實沒什麼幫助。但我覺得，政治分析也是一種技術，那麼城鄉所教的東西就是有用的。比如說我現在，跟街道、跟各個局、單位去做交流的時候，你理解整個官僚系統在怎麼運作的時候，它是作為一種分析技巧，然後你明白你的角色是什麼？你的立場是什麼？然後最後回到你到底在為誰做的規劃？我明白我的角色怎麼在這個項目中定位。

這個也可能教會你的是，在歷史長河中、或社會變動中，自己身處在哪裡？我作為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去面對現在的處境？自己的心態是怎麼放置的？這可能是一個安身立命的根本。這可能

是有幫助的事情。你看不見這個東西多久會影響到你，但它確實在你心裡面會有一些改變或有一些啟發。

我給你舉個例子，我是科技公司，我們服務的是政府或者及其旗下的一些城投公司。那他們中間有一些張力，可能是某書記、某某局某領導（政府），跟某集團的副總（政府旗下的城投）之間的關係。你做項目，有的時候你的發起方不一定是出錢方。你要會去平衡這個張力，知道誰出錢、誰出力，誰拍板、誰決定？你的PPT、陳述報告和你做的產品，要明白怎麼去解這個題目，或者拿到這個錢，這中間有很多的政治教育過程。

你要知道他到底要個什麼東西。他為什麼要這麼說？他這麼說是因為他的領導跟他這麼說，但是他的領導這麼跟他說，可能背後的引申意義並不是他真的想面對那個問題。你並不能直接解決他的需求，你要繞過他的需求，解決背後的立場的問題。這個東西其實是城鄉所教過的。

我從一個公司的角度來講，我的目的是賣了這個產品，能夠把這個款給結了，然後為公司創造利益的。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的生意是很難結款的。這就會牽扯到我剛才說的錢誰出的問題。我要去拓展一個市場，就要跟當地新上台的領導打交道，去博得一些資源和佔到一些位置。

我明白我在什麼立場、什麼語境，講什麼話。我可以當棋子，但我知道我在下一個什麼棋。但你說我對這個事情認不認可，那是一個價值判斷的問題，但我現在的角色不允許我有價值判斷。

所以我在現在的處境裡很難憤怒，但講回來，這也是為什麼我渴望憤怒。

王歡：在規劃院，我們現在做的是縣級國土空間規劃。它涉及到各個部門之間的利益博弈。城鄉所教給我的，可能是如何去協調這些利益。比如，國土空間規劃，它其實是自然資源部門負責的，企圖把水利部門、生態部門、歷史文化部門、住建部門這些工作組織在一起，所有關於空間的決策，都在國土空間規劃圖上面去體現並實現法定管控。因此這個規劃編制過程就會有各種各樣的衝突與協商，因為都涉及到權力跟利益的較量。

我作為一個規劃師要去干預這個過程的話可能會比較難。但有一個能夠做的事情是技術解釋。比如我做的項目是在新疆，然後新疆的部門對這些專業的事情其實不太理解。那解釋這個東西的權力會落在我手上，我們作為一個技術官僚能夠發揮一些作用。我可以從技術上說服他，這個事情怎麼辦才是合理的，大部分時候也許技術的說服沒有用，但有時候也會有對我而言很正面的回應，這個正面效應是很鼓舞人的。

我舉個比較詳細的例子，在我們做的一個規劃方案裡，有一條主幹道是我們判斷後新增的，我在總體規劃的層面要去決定它的走向，這牽涉到三件事情：一個是二手車的市場，它是商業用地的一個經營主體，是講利益的。這個二手車市場想要擴張。然後它旁邊有一個小學，這就涉及到教育部門，這個小學好不容易很多年後建成這樣子，教育部門也不希望因為道路擴張而拆掉。所以這條路要怎麼走？要往二手車市場用地？還是要教育部門把小學拆掉之後另行選址？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作為規劃師，我能很自豪地說，我還是要從公共利益的角度去考量。比如自然資源部門會遇到一些行政上的干預，可能某個縣級領導被二手車市場老闆所影響，他會支持二手車市場擴張。但是我們就會鼓勵自然資源部門去跟教育部門協商，如果教育部門不認同的話，提出反對意見擋掉二手車市場方面的施壓，從而保留小學。

在這個協商過程當中，我有機會去選擇一個立場，做出一些我想要的影響。我記得我們的總工程師有一次自豪地說，深圳的大學城共享公共服務設施，是他們那些人當年堅持下來的新理念。希望20年後我也有機會，很自豪地說，這個小學用地是我當時堅持留下來的，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意義。這一點點意義就是我還能在規劃院堅持下去的一些精神上的理由。不過，再後來故事是，政府不斷再跟我們提出，這條我們認為需要新增的主幹路，也不一定是必要的，更可能發揮不了我們想要的紓解壓力的效果，反而會增加現狀交通壓力。所以有時候規劃技術並不是具有可被反覆驗證到「唯一答案」的「科學」，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而在規劃院內部，對於一個技術的價值判斷也不一定是一致的，總會有一些碰撞。我們需要跟院領導協商技術，他們也會告訴我他們的判斷，這件事情怎麼做才是合理的，而我也有機會說出我的看法。我現在的公司，有一個能留下我的地方是，大家會對技術有一個討論過程，並且內部協商一個結論後，再對外去跟甲方協商。這種機會現在越來越少，就像其樂說的，有時候甲方就是付錢的人，你很難去說什麼你想怎麼做。但前幾年，我做規劃的動力來源可能還是這裡，雖然我拿你的錢，但我不一定非要聽你的話來辦事。

再等等！

王瑤：從教學的角度，我有把城鄉所的參與式設計帶到本科生教學中，在做一些教學上面的變革。我有一門「景觀設計二」的課，我把參與式設計融入進去，最後成為教育部首批的一流課程，它是社會實踐類型。能拿下來也很不容易，我們當時全大陸的高校獲得首批只有168門社會實踐類的課程。在景觀設計學科，應該整個華南地區就只有我這門課。能夠入選說明這門課確實很精彩。

我覺得還蠻有效果的，很多學生一開始上課的時候，他們是沒感覺的，只是覺得這門課就很特別，整天就往外跑，也不需要做很多的圖，但是需要一直跟場地的使用者、多元的相關利益群體打交道。但慢慢的有些學生畢業之後、工作之後、或者考研之後，他會回來給我發消息說「王老師，我當時可能不理解那個課，現在我工作之後發現，其實人是最重要的」。從學生的反饋上，我覺得他們還是有學到參與式設計的一些核心的部分，真正去關注人、關注社會。

平時上普通課的時候，有些學生就不是太在狀態下，但是他一旦上我這個課程的時候，不管他平時成績好還是不好，學生們都非常全身心的投入。有一次讓我很感動的是，一組學生為了早上七點鐘在菜地裡跟村民們一起摘花菜，他們凌晨五點鐘就起床，就從學校搭車去現場了，去村莊。他當時給我拍的那個視頻，外面天都是黑的，當時還是冬天，因為我的課都是11、12月上課。

蔡舒翔：很多時候需要平常心，你需要等等學生、要給他時間，不能急於當下。我會在我的設計課上鼓勵學生去調研、去訪談，去根據住戶的

真實需要(做設計)。目的是讓他們真的瞭解社會，瞭解我們所謂的多元社會群體到底是什麼？這件事情可能在很久以後才對他們產生影響。

比如之前有一個班，當時我讓他們去老城區調研，要求他們一定要與跟居民交流，特別是那種好幾個家庭合住在一起的老房子，找這些案例來做設計。那個班有個學生後面考上公務員，回去做了村官。非常多年沒聯繫，有一天他突然打電話問我，老師你有什麼鄉建的書可以推薦嗎？他說「我知道你當時好像有給我們講過」。就是他有印象，雖然印象不是很深。所以我覺得，有時候要等，有些人彎彎繞繞可能最後會有機緣去做一些事。但100個學生中，能影響到兩個，我覺得就已經很難了，已經有成就感了。這個成就感像王歡說的那樣，它是一個很小的點，但你要把它放大，但同時你要等一個很長的週期，他們的成長沒有那麼快。所以也要說服自己。

蔡舒翔：我們從城鄉所出來，能在大陸慢慢去推動一些事情，其實也挺不容易的。我會願意往那個方向去努力，但不是說一定要它馬上發生什麼。我們缺乏制度彈性，所以要去找縫隙。然後很多事情也得等，像規劃局之前來找我，說泉州城南片區想做社造，是可以給經費的，但後來一直在擱置，到現在都沒有下文。我當時也有聯繫過潤琳和王瑤，說如果有機會，我們還可以在這邊聚一下，看看能做點什麼。

我們要等誰？可能是上面的政策，可能是剛好在上位的某個人有意願去推，等各種機緣出現的時候，有些事情可能就順理成章地發生了。我最近也有在幫民盟(中國民主同盟)寫調研報告，現在福建有很多地方引入臺灣社造團隊(的嘗試)，我就會寫一些社造的內容。就想以各種方式去引

導他們看看不一樣的視角。

姚麗金：你很難在當下去思考一個非常積極的前景。我之前在《城鄉通訊》的時候採訪過學姐，她說的是，城鄉所帶領你去學的，可能是終身的。你真正開始琢磨這套理論，可能是從離開城鄉所才會開始。我覺得可能要從一個人的一生這樣的維度上去展望城鄉所的意義。

四、情感動員：悲觀中的樂觀

如果城鄉所的理念和現實存在差距，如何在挫敗中找到堅持下去的動力？除了實踐之外，陸生也在尋求情緒上的調節，或是短期的自我安慰，或是策略性地情感動員，又或是城鄉所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在這種複雜情緒中，陸生們如何：



- 1.如何從現在的工作中找到堅持下去的動力？
- 2.面對未來，是樂觀還是悲觀？如何平衡？



孤獨中的「小小」成就感

王歡：我覺得，重要的是要抓住那個能夠鼓舞到自己的瞬間，然後放大那個瞬間，不然很難支撐下去。我去年有一段時間，狀態很差，就是因為我在畢業之後，幾乎所有精力都投入在那個工作的適應上，然後沒有所謂的斜槓。當工作出現困難的時候，真的會感覺很受挫，很難從中度過；當度過之後就發現，重新去找到那個可以被放大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城鄉所那些東西，都很理想。在落到現實中的時候，肯定會受到一些衝擊。我覺得我們可能自己要去處理這樣的問題。我又想保持理想，但又不得不面對衝擊，我要怎麼去做一個銜接。特別是，陸生在回到大陸後產生了怎樣的「異常」，這個異常就是需要處理的問題。城鄉所的思維在面對一切現實問題的時候都會碰壁，不單純是工作上的，還是整個個人成長上的，但是城鄉所的精神讓我在一部分時候不那麼圓滑、有了撞南牆的勇氣和力氣。

但是說實話，這是一種令人痛苦的消耗、磨損和重構，我現在還不知道要如何讓這種思想自洽地、穩定地生長，而不是每一次要依靠偶然地「撿回」城鄉所經歷，再去面

對下一個現實問題。就是那種，常常頭破血流，然後又要默默接受和消化結果，太難的時候想放棄，告訴自己算了，反正老王不是也安慰過大家，碌碌無為的人生也值得過。然後過一段時間重新碰到了城鄉所有關的一切人事物，又「續命」了，西西弗斯般勞動。

黃潤琳：一個人無論是生活還是工作中，當很難有一個自己滿意的收穫感時，確實是會很低落的。其他人可能會跟你說可以這樣，我覺得很好，但不一定能幫到那一刻的你。因為你自己才是在那個情境當中最有感受的。對人家ok的經驗，可能對你不一定ok。所以首先是很尊重心裡的感覺，哪怕那是受挫的、低落的、孤獨的，我們允許它存在。

另外，像舒翔可以有這樣一個平靜的狀態，我的一個小猜測是，會不會是因為你不是只限於在學校裡面去獲得？我現在重新去看斜槓這件事情。斜槓這件事情在現在這個時代還蠻重要的，它不是一種所謂的能力疊加這麼簡單而已。在所有東西都收縮的情況下，你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是更容易受阻的，那這時候帶來的失敗感就

會更強；那這條路不通，斜槓可能給你另外一條路，稍微還有一些成就感返回來，可以維持到你的日常生活或工作中一定頻率的良好感覺。我覺得這對人的心理狀態是重要的。臨別時，育貞老師也提醒我，要保持自己拉小提琴的興趣愛好，而非只投入在社區和工作裡。

這幾年來，社造：「景觀改造化」「地產促銷化」「共識表演化」「開發合理化」的趨勢，在這邊都越來越強。我也從知己夥伴那，瞭解到這邊許多知名「社造」組織或知名人士，如何打著「參與」「共創」「做生態」「支持夥伴」等名義，做著掛羊頭賣狗肉、甚至欺騙剝削夥伴、一旦過河則拆橋等各種騷操作，許多光鮮明星案例背後，其實滿地雞毛。很幸運的是，我依然有一小群靠譜的小夥伴，大家能一起吐槽，互相安慰和學習「不執於相」「柔以克剛」「中庸適度」的智慧，互相陪伴度過那些難熬的時刻，分享日常的生命點滴，然後一邊避坑、一邊再各自回到自己的「社區」去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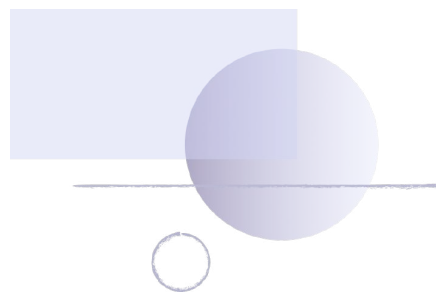
王瑤：我覺得參與式設計也是一種用批判性思維去做設計，我在我們學院基本上也是孤軍奮戰，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在做（參與式設計），然後其他老師就很不理解，「你為什麼這麼做」，他們就覺得，我們是在做前期的田野的部分，所以他們的認知還是在要那種傳統的（思維），設計只要把效果圖做好。我也理解目前這種處境，不可能遍地開花，所以需要慢慢去改變學生。我在課堂上就需要有一些案例，然後慢慢地引導他（們），我覺得還是會有改變。學生為什麼上我的課，他能夠那麼積極，是因為他先感動自己了，那他才有辦法去做那個事情。

還可以樂觀嗎？

王瑤：你在制度裡面做，沒有辦法自己新開一片，只能在既有的制度裡面去做一些創新，雖然沒有那麼快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就像我們剛才說的，你的學生不可能馬上培養出來，他可能要過一個比較長的週期才會有認知。

我們也是會跟社區去合作，有些社區書記願意做，特別是參與式設計。比如上海的「大魚營造」，他們基本上是跟街道合作，他們在街道做了一個社群的中心。所以，東部、南部沿海城市我覺得相對來說比較open。他們的基層政府也比較能夠接受這方面的一些資訊，能夠做一些調試。當然，它的前提或那個title，還是在什麼黨政引領的角度下。但我現在發現有一些社區書記，他也是願意改變、願意往這個方面走，但是他不可能以臺灣的方式去做，它有一些黨政的KPI要處理，但我覺得也不排除我們能夠在裡面做一些改變，然後可以慢慢累積，所以相對來說，我還是比較樂觀的去看待這個事情。

（不光是在沿海）我們去年7月份是在雲南財經大學，我們跟他們做聯合工作訪，就是把我們的參與式設計帶到雲南。他們的老師也跟著我們學著一起在做，比如一些參與式設計的部分。



校友迴流

王歡：我也沒有很悲觀，我覺得可以在制度裡面去找到適應的辦法，而不是要去推翻這麼激烈，而是可以一點一點撬動，最後會有一個結果。比如，李郁他們做的「共同締造」，他們也做出了一些事情，會結合「駐點幫扶」這樣的大的政策脈絡。他們可能也是把學生拉過去在那邊建造房子；（但）我覺得這個事情也是挺了不起的，他有了實際的行動。

蔡舒翔：我覺得像我和王瑤都是在學校教書，還是挺幸福的，我們有一份比較固定的薪水，同時又可以在校外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所以在學校裡面找不到認同的時候，也可以在外面發展另外一條線。像我最近在修一個華僑的老房子，就會發現，要修這個房子、維持它、保護它，讓很多人來一起使用它，其實這件事情很困難，要花很大的心力和錢去維持空間的正常運作。後來陸續有其他人加入，形成了一個相對有默契的運作方式，大家也越來越有認同。

這還是讓我還蠻開心的，像城鄉所教我們的東西，它不是一個硬性的規定或是範式。它好像都會突然在某個瞬間啟發我，告訴我這件事情怎麼去做。就像剛才潤琳說，可能你突然有一天就發現「參與」可以應用在家庭關係上。

我最近在泉州晉江一個鎮上做華僑早期的一些地方建設情況（的研究）。像這種家族研究和地方的建設研究，以前都很少有記錄。我帶了一個研究生一起，她當時對訪談是沒什麼概念的，我帶她去做了几個訪談。她出來後說，「老師，我有被感動到，因為這些老人家說的東西，就突然間，他們好像很自豪，有真情流露的那個感覺」。對我、對她

來說，這都是在「做中學」。它沒有那麼規範，不是一定在教學上要怎麼樣做，其實就是在日常中，讓這一套理念方法浸潤我們的生活。

王瑤：我覺得結構性的原因就在那裡，孩子從小就被教育得乖乖聽話，從幼兒園開始就必須要學會要服從權威，然後別人怎麼樣，你要保持一致，這是整個結構性的原因。我們做參與式設計，我覺得就是要從微觀方面去慢慢做這件事情，因為結構力量太大，我們是沒有辦法去做處理的，我們也只能從微觀。但是微觀不代表因為它小，我們就不做，它還是能夠慢慢改變。

王歡：我有做一共48個村子的規劃，肯定不可能說48個村我每個都去做參與式的，我沒有人力，也沒有資源。但是，在我參與的村，我會跟村長去溝通，然後我會選擇，哪些村長更好溝通，更有可能去促成一些我們想要做的事情。上次我想要邀瑤姐來一個村子，想去促成這樣的一件事情。我覺得很難，但還是會有機會，當那個機會出現的時候，要去想辦法把這一件事情抓住，抓住那一個能做的事情先做了再說。

黃潤琳：我選擇做個行動上的樂觀主義者。大趨勢和時空偶然往往難以判斷，但行動可以積極樂觀一些。城鄉所一進門就看到「我們反對」，好像大家很負面，看什麼都不爽，包括同學也容易互相對；但是後來接觸城鄉基金會，尤其是去了宜蘭分會之後，我就發現事情不是這樣的。是真的有在一線跑的那群人，他們會把上街當成最後的選擇；而在這之前，其實有大量的各種溝通和協商。我覺得對我的啟迪還蠻大的。育貞老師很明確地跟我講，一個事情（做起來）

都是五年到十年，上街是他們最後的選擇，實在不行才會這樣。我就看，有哪些人是真的把事情做成了？他們是怎麼做成的？批判是一方面，但如果同時你還是要讓事情做成。那你從事情做成的人身上就會學到，原來是這樣。

我們所生活的地方，它整體的運行邏輯是清晰的、恆常的。在這種大的邏輯下，我不會妄想說一定能做出太多東西。但是，親身的經驗，給到我樂觀的種子。前面做中學有提到過，直接的體驗，創造出學習的內生力。不是道理上講給你聽「這是對的」，也不是只是給你看一個案例，而是你真的到這樣的社區走一走。我覺得那個的衝擊是很大的。

畢業旅行時，我爸媽來了之後，我都沒有帶他去看什麼景點，而是都把他帶去宜蘭和坪林的社區去一起吃飯，然後我爸媽就很感動，就是說我們有這樣的社區就好。那一種感覺，一旦體驗過了之後，是會在人的心裡面多少要留下一些印記的，哪怕它沒有馬上發芽。我自己就很希望說，可以多多少少創造一些這樣的印記，將體驗的機會給到不同的人。可惜的是，現在兩邊不通，暫時沒有辦法帶（人和經驗）相互感知，而且也受限於身體狀況，我也知道自己暫時沒有辦法帶來太多，能做多少是多少就是。

如果「YES AND」不只是停留在溝通技巧，而成為包容型思維模式，也會增加一些些樂觀。畢業後曾和光曄共事時，我們都會看不起和吐槽別人，比如「你看那個誰做得多淺」、「那個什麼事做得多不好」……但現在回過頭來看，我開始覺得他們在做的那些事情也很重要。比方說，現在有大量說自

己做社區參與的機構，實際操作上是先去探索社區，然後再去提一些假的提案。以前就會覺得這些很不好，但現在回過頭來想，我覺得那個也很重要，就是起碼讓大家有了這樣的一個體驗性。那以後能不能發芽，那就隨緣吧！基數大了，其實總會有一些會長出來的概率。

最後，很感激城鄉所給到的不堅持、不樂觀的寬容。從育貞、聖琳、麗玲幾位老師那，都聽到過類似的寶貴分享——不是自己硬去堅持多久，只是因緣巧合不知不覺就一直做下來了。無論一直在做，還是換個領域繼續踐行，還是暫停一段時間，還是得要放棄，都是可以的。參與是珍貴的，但城鄉所沒有讓我們把它當道德包袱來背著。

周勇：我就覺得很無力，明明可以讓社會變得更好，或因為沒時間、或因為沒錢，或因為功利性的思維。不論是學術圈，還是規劃圈，我有時候都感覺我們像是在象牙塔下跳舞卻沒人欣賞的業餘舞者，我們呢都太容易把自己當回事兒了。我們以為我們懂，當我成為了一個木工，再去看家具產業；當我成為了茶農，再去看人地關係；其實我們對研究對象真的不那麼懂。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我們可以讓我們的研究更有生命力，比如真實記錄那些小人物的故事，比如真誠對待並教導自己的學生。去年與導師發郵件，詢問自己的困惑，「當我在帶碩士生的時候，我才理解導師當時教導的，正直的做研究，踏踏實實的做調研，一步一個腳印，慢就是快的道理」。導給我回郵件，鼓勵我繼續保持，正直地做研究。今年，我花了好多時間帶著第一個學生去做她的田野調研，然後催著她艱難的完成了她的碩士論文初稿。

校友迴流

我對論文也不滿意，但正如城鄉所十年前教我的那一套方法與做事的態度，讓我這個平庸的學生也成為了老師了，所以，雖然當下有不滿意，但只要正直的持續的做研究，一定會讓平凡變得不普通。

五、未來在哪？

在兩岸關係轉向緊張的大背景下，陸生還可以起到怎樣的作用？陸生在今天如何回憶城鄉所、如何想像臺灣？又有怎樣的展望和遺憾？

交流何以可能？

周勇：在工作後，可能因為角色不一樣了，我重新審視自己讀書時讀的一些論文，在臺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有一些調研並不嚴謹、也經不起推敲。我後面進入科研院所之後，我們從政府層面去重新瞭解大陸的省、市、縣級發展的政策研究，這些東西怎麼落地，這些條條框框怎麼博弈與談判的。當然，我也能理解，學術研究很多時候是與現實有距離的，我現在在做家具研究，也感覺自己是鏡中看花、水中看月。

最近我看到城鄉所第一屆陸生學姐又一次在大陸的設計頂刊發表了一篇參與式規劃的期刊論文。大陸有太多好玩的有趣的東西，可以跟臺灣學術圈一道，與西方一起對話。以規劃圈來說，大陸規劃師基數這麼大，只要設計圈有萬分之一的人在做參與式規劃，那呈現出來的都是百花齊放的一個盛景。真誠在大陸做調研，與受訪人交朋友，你會發現好多可以拓展寫的新題目，但是，兩岸社科學術圈之間的交流大不如前，互相之間也不夠信任，能合作能開展的研究空間彈性越來越小了，這是個很可惜的地方。

楊伯中：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大多數陸生做的題目可能還是跟家鄉有關，但城鄉所的學生好像都沒有太問問題，陸生

和臺生之間還是隔著一層東西。我之前有建議過，是不是可以在某堂課舉例的時候多加一些中國大陸的案例，因為我知道城鄉所也會講歐美的事情；但我覺得大陸這麼大，對面也有很多可以提出的點，雖然語境上不一樣。我有時候真的很懷疑，城鄉所同學真的有理解我們在做的這些研究的背景嗎？它帶來意義到底是什麼？所以我覺得把大家聚在一起還是蠻有意義的。

我們也在努力做事

周勇：今年我也在考慮要不要捐錢，雖然我工資挺低的，才幾千塊錢，但我真的一直有考慮。後來我問城鄉所的老師，1000塊錢能不能捐，會不會被城鄉所瞧不上。我覺得深深地感念它，在那邊讀了四年碩士，讓我可以完成博士論文。不知道以什麼形式，希望能幫到城鄉所，也幫到我們這些畢業的城鄉所學生，維持這個心中的小美好。

王瑤：我把參與式設計的經驗融到我的課程裡面，然後評上了一流課程，那個時候我們學校獎勵了十萬人民幣，然後我轉換成新臺幣就捐了15萬給城鄉所。

周勇：可能我們一聊天的時候，我們會再有一些共同的特質，是在城鄉所留下來的。但我覺得我們（城鄉所陸生）一直沒

有形成一種集體的能源。明明我們那麼感恩，但有時候會覺得好像我們這個孩子不爭氣，好像媽媽沒有以我為榮，會有一些自卑情緒，但明明我們在各自的領域都蠻辛苦、蠻努力在做事。

回不去的第二故鄉

楊伯中：對我來說，不止於城鄉所的三年，包括之前念大學的五年。整體上，我在臺灣待的感覺還是很好的，其實很少有劍拔弩張的時刻。有好像比較衝突的時候，但總體來說還是能在一個理性的狀態內，可以被端上台面，然後可以被討論。總體來講是一個好事情。我覺得在城鄉所的這些同學感覺都蠻純粹的，可能因為我們學的是一個比較理想性的東西。

董其樂：我跟伯中一樣，在臺灣待了七年，你大學的朋友，你的研究所的朋友都在臺灣，然後你又見不了。我常跟他們講，我去不了。而如果他們又不肯來中國大陸，你知道，我們就只能在這個世界上第三個地方見面。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可以去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我連朝鮮我都可以去，然後我不能去臺灣，這個事情實在太奇怪了，它成為了你永遠都回不去的第二個故鄉。

黃潤琳：我很早就做好了離開的心理準備。在這念書的第二年，大概第一個學期中間，我就決定了，我要把我拿到的四年簽注用到盡，好好探索這裡的種種。於是拖遝

著沒有積極寫論文，也到最後一刻才去上交論文。交完一個月內，剛好踩著四年盡頭的線離開。

哪怕那時候還沒有完全封禁，我也知道，很多東西我留不下。我也沒有辦法，很不捨。那時甚至有很多人邀請我說，我們可以一起繼續怎樣一起弄，有人甚至調侃說要不要找個臺灣女生結婚。但我知道，留不下。所以我很珍惜那四年的時光，更感念期間相識的諸多良師益友。

畢業後偶爾離境出外時，我還是會去翻一下社交媒體，看看大家都怎麼樣了。我在做的事情，不是生活化、娛樂化的事情，跟公家走得很近。兩岸語境的夾縫中，太容易被片段化和誤解。所以我一方面幾乎沒有點讚或留言，沒再怎麼跟大家互動，一方面自己也沒有主動說。但看到大家安好，就特別開心。雖然說離開了，對我來說也有一種沒有離開過的感覺。

拉回前面那個話題，「如果要再念一遍，有機會你還選不選城鄉所」，對我來說，肯定還會選，哪怕最終要離開。

後記

楊一萌，李舒恬

圓桌訪談先後進行了三輪，從最初的召集到今日成文，不知不覺竟過去了一年半。

最初想做這件事，多少帶有一點衝動：或許是陸生聊天群裡久久的清靜，提醒著我們「沒有新成員加入了」；或許只是想藉此機會，和畢業後散落各地的大家再聚聚；又或是，在這個不尋常的政治氛圍下，作為從城鄉所畢業的陸生，想做些什麼，想重新尋找些什麼。

十位受訪者的入學時間，跨越第一屆至最後幾屆。有些學長姐與學弟妹，甚至是第一次見面與交談。即使大家身處世界各地、橫跨多個時區，卻因「城鄉所」這個共同的記憶與認同，毫不猶豫地撥空參與。有些為圓桌組建的臨時群組，至今依然活躍。對此，我們尤為感動。

縫隙中的行動力

陸生的處境，從一開始便是雙重邊緣的。在台灣，他們被政策性地排除在外，無法真正融入；回到中國大陸，台灣求學經歷又不得不面對諸多疑問——為什麼要去台灣？台大是什麼學校？城鄉所教的又是什麼？——甚至因此被貼上敏感、高風險、需要接受審查的標籤。在工作中，有些所學不能強調，有些憤怒需要克制，有些質疑則需要一遍遍地解釋。

即便如此，在清楚瞭解主流知識體系與社會規則的情況下，城鄉陸生仍以各自的方式，在工作的縫隙裡尋找一些不一樣的可能性——無論是王瑤的參與式設計課程、蔡舒翔在泉州老城的建造實驗、黃潤琳在社區營造中與領導的溝通之道、李或選擇在平潭這個「離臺灣最近地方」的項目實踐，又或是王歡在48個村莊的規劃任務裡，找到那個最可能支持自己的村長。

正是在這些微小而具體的行動中，「城鄉所」的價值與理念，正在對岸展現出生命力。

「翻譯」作為策略

行動，當然不是一帆風順，而是需要一些策略，比如「翻譯」。

城鄉所「我們反對」背後的批判性，在這裡不是以對抗的形式出現，而是包裝進設計學科的「社會創新」中，潛藏在馬克思主義讀書會裡，又或是融入到社區營造的技術交流、鄉村振興的政策報告中。蔡舒翔用「打太極」來形容這種方式——不求正面衝突，但求慢慢孵化。這並非簡單的妥協，而是在當下維持實踐可能性的現實選擇。

當然，「翻譯」也不僅僅是替換辭藻。黃潤琳有更進一步的思考：批判性說不出口，是否恰恰是一個回到真問題的機會？他的嘗試是創造真實的、在場的社區體驗——不急著解釋立場，而是讓人在具體情境中感受到「被尊重」和「被聆聽」，以此將價值觀傳遞出去。也就是：不管怎樣，先做起來，然後在過程中不斷調適、修正、和尋找轉機。

用時間換空間

行動，也不是隨時能開始並見效，很多時候不得不「等待」。

等政策的窗口，等上級領導的換屆，等一個有追求的村書記，等一個學生畢業五年後發來的消息。在姚麗金那裡，這種等待甚至是終身的「可能要從一個人的一生這樣的維度上，去展望城鄉所的意義。」這種「等待」，不是消極怠工，而是一種時間換空間的策略。不是每一件事都要在當下看見結果，不是每一粒種子都必須在自己手裡發芽。這是許多陸生仍然堅持的最樸素的理由。

當然，這種時間觀與現實常常有衝突。快速更迭的領導偏好、短平快的項目制、資源與資金的現實局限，很多時候根本「等不起」，對未來的判斷因此有時是悲觀的。但黃潤琳所說的「行動上樂觀」仍然可以在大部分陸生那裡找到：放大當下那一點點微小的成就感，又或是主動採取「斜槓」的策略。這條路走不通，另一條或許還有迴響。

允許受挫的、低落的、孤獨的時刻存在，對可能到來的成就感仍然保持期待。

城鄉所作為「生活方式」

行動，可能也不必然關聯到「做什麼」，而是其本身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城鄉所在專業上是否「有用」，或許早有共識，陸生也不例外：它無法轉化為規劃院或設計院的圖紙能力，無法像姚麗金所說的「直接變現」；即使是參與式設計這種更具操作性的方案，在向上遞交的項目策劃中也未必真正得以呈現。

但相比在臺灣走上街頭的「城鄉所」，在陸生中，城鄉所可能正在演化成一種「生活之道」，其是一種「在困難巨浪的沖刷下，一直堅定地在那裡」的心態，一種理解「家庭關係」的倫理，一種「看清自己身處何處，自己以什麼角色面對當下的處境」的世界觀，一種不斷自我調試和反省的人生姿態。這一點上，我和舒恬也不例外。

這實際上早已超越了「有用與否」的工具理性，也和處在什麼工作崗位無關，而是如周勇所說，關乎人性、正直和勇氣。這不是專業之用、而是做人之道。

未竟的故事

遺憾的是，2022年後，不僅陸生政策走入歷史，隨著國際局勢劇變，兩岸之間的往來也幾乎全面中斷。許多陸生可能再也無法回到那片曾經熟悉的土地。但城鄉所帶來的影響，仍在城鄉陸生的日常中以不同方式延續。

陸生的故事，是一段關於疆土與流動的故事，一段關於知識如何在異域紮根、理想如何在不同脈絡中被理解與實踐的故事。政策或許已經結束，但行動遠遠沒有，其正在城鄉陸生各自生活與工作之中，那些微小的、具體的、或許很長時間才能看見結果的努力中，生根發芽。

我們相信，在今天記錄這些故事，本身也是這場行動的一部分。

不只是里長辦公室： 學生會主體性與服務期待的拉鋸

◎ 編輯：宋燁博、林彥彰



▲所學會舉辦春酒照片(照片由所學會提供)

為何會想要選所學會？

回憶起最初競選所學會會長的契機，宇韜認為是來自於他對於所上事務的興趣，起初宇韜本就打算參加所學會，或者參與其他所上相關事務。起初參選所學會僅是他與朋友間因為所上新聘老師而起的玩笑，但在仔細思考後續籌組所學會的相關事宜時，愈加覺得如果由自己來找有相似願景的成員一同參與，或許可以讓自己在參與所學會的過程中更加輕鬆。因而更加確定了參選的動機。

芯玫在參加所學會上不同於宇韜對於公共事務的熱衷，芯玫答應參加所學會的契機為在實習課上參與了工綜的改建過程，讓芯玫對於公共事務逐漸改觀，並認為可以透過參加所學會將一些對於空間改造的理想落實。因此，在確定不參與城鄉通訊時，便與宇韜一同決定要參選所學會。

組織架構

所學會的組織架構大致可以分做正副會長與財務及出納，在最初宇韜與芯玫便已找好維嫫與毓璿(Jeff)一同參與。起初在交接的過程中，前任會長仲崎告知宇韜所學會最基礎的運作僅需以上四人即可，但是由於上屆在四個人的狀態下，許多活動都需要仰賴其他同學一同舉辨，加上維嫫因為身體因素退出。因此，最終宇韜與芯玫決定將幹部的人數擴編至七人，也因此減輕了他們許多的負擔。

財務與獎助金

所學會的財務支出以所學會舉辦活動，以及各種獎學金為主。這之中公共事務獎學金在申請上的改動或許是這屆所學會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提到今年的許多公共事務獎學金的申請案時，宇韜與芯玫也露出相當苦惱的神情。由於交接時尚無法確定本年度可以使用的經費多寡，加上也無法估計整學年的使用量，因此Jeff在此處的審核較以往嚴格，也是為保障後續若有其他支出時，可以不造成所學會的財務負擔。

因此在審核上，Jeff首要考量的便是申請的標的是否具有「公共性」？其次便是相關活動的計畫完整性，有不少申請案都在這個過程中被回絕。宇韜雖然認為這些活動或許會很有趣，但也因為這些考量，而必須仔細思考，這些申請案會不會排擠到後續更有公共性，且需要補助獎勵金的活動。目前所上的獎勵金大多皆使用於女書會的電影放映與50周年系列講座等活動之上。

年度活動回顧與執行

不同於往年既有的活動，本屆所學會在活動的構思上也增加了許多以往不曾有過的活動。當中便包括聖誕節活動與植栽活動，提到植栽活動，芯玫相當開心地向我們提到，這也是有關於她當初希望加入所學會的一個目標。最初在參與工綜改建時，芯玫希望在城鄉所的空間中能夠有一處綠化的空間，一方面是源自於她自己與朋友對於植栽的興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夠幫工綜館較為單調的空間設計一個較為特殊的空間，但在與劉柏宏老師討論後發現要達成整個空間的改造過於困難，也因此寄望於透過舉辦植栽相關活動，以完成自己的夢想。

同時，在過往的活動流程上，所學會的大家也對流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良，特別是春酒與期末大會的時程，以及「指導教授學」的相關活動。過往由於春酒與期末大會的時程分為兩周進行，不但會降低同學參與活動的意願，更會對所學會的幹部們帶來過大的工作量。因此，宇韜也將春酒與期末大會改在同一天舉行，以增加大家參與所上活動的意願。

同時，所學會作為保護學生權益的組織，時常需要承接許多指導教授與學生之間的張力。這之中也不乏許多超出所學會所能處理的範圍，也因此，在今年的指導教授學上，為讓學生更加了解老師對於指導學生的要求，以及老師指導學生的風格，所學會在今年的「指導教授學」中詢問了老師對於指導學生的規定。

在所學會一年的感想與願景

訪談的最後，我們也詢問了宇韜這一整年下來作為所學會會長的感想，宇韜認為自己最得意的創舉便是以家族的方式



▲鐵道博物館走讀活動



▲彰化白龍庵遶境活動

劃分直屬，以解決過往有學弟妹找不到直屬，在所上無人可以詢問的狀況，但同時，他也無奈地表示許多當初上任時的願景都因為現實考量而無法實現，這之中更包含對於所學會定位的迷茫。在這一年之中有許多事件都已超越了所學會的職責，但如前述提到的，作為一個保障學生權益的組織，所學會的存在必然承接了大家對於保障權益的期望。但與之相對的是，所學會的眾人實際的精力有限，並沒有辦法滿足許多同學的期望。「不要讓大家覺得這邊像里長辦公室」，這是在參與所學會工作一整年後宇韜最真實的體會，也是在這一年之中不斷承接大家希望，卻無法達成自己原先目標的真實寫照。

同時，過往所學會的大家大多燃燒自己對於公共事務的熱情來服務學生的狀況，也讓宇韜與芯玫感到相當疲倦。也因此，他們也希望提出讓之後的所學會可以有相應報酬的組織，「劉柏宏老師之前有提到，是不是可以利用代管所上空間(例如一樓整修後)的名義發薪水給所學會幹部。這樣好像比較有正當性，也能讓更多人願意參與。台大學生會是有業務費的，雖然我不知道其他系所的情況，但我覺得如果有的話蠻合理的。」這個問題或許也有賴後續接任所學會的學弟妹們思考了。



▲ 反拆公館圓環行動中的「城鄉所繫」旗幟。圖片來源：「下一代人本交通促進會」facebook粉絲專頁

回望半世紀—— 新世代需要/想要什麼樣的城鄉精神？

適逢城鄉五十與即將迎來的大搬遷，我們如何期待下一個五十年的城鄉所精神？

◎ 撰稿、照片提供：林玟圻 | 審閱：林彥彰、曾曉渝

（本文內容改寫自本人於2024年12月23日發布於Facebook個人頁面的公開貼文。）

除卻所上的內部紛爭，城鄉所在近年依舊投入零星街頭運動及遊行當中。在這些運動中，一面旗幟能夠作為號召眾人的符號，也能夠做到對內及對外的整合凝聚。因此，R11這屆的所學會在任內

舉辦公開徵集，希望能讓大家集思廣益，也在參與的過程中重新想像何謂城鄉所的精神。

以往城鄉所學生提到抗爭、倡議時，往往下意識聯想到萬年的「我們反對」。在現任所長康旻杰的觀察裡，「我們反對」四字在過去「烙印成城鄉所的鮮明印記，甚至被刻板化為一間專門製造社會運動，卻欠缺空間專業能力的系所。」

然而，街頭上也未必盡是抵抗政府公權力及企業財團的「正義之爭」，而有訴求多元、希望能促成包容與友善的遊行。我們可以想見，在人權辦桌、同志大遊行、「為野生動物而走」中，高舉「我們反對」對不熟悉城鄉所脈絡的社會大眾而言，將顯得衝突而荒謬；何況當代也鮮有人能將這四個字與城鄉所相連結，眷戀「我們反對」未免不合時宜。

與此同時，隨著臺灣社會的民主化與現代化，不同思潮百花齊放，大學裡各學科的分野也進一步消融，這也使得原先以「專業通才」培育機構自居的城鄉所，面臨學科焦慮。脫胎於土木系交通乙組都市計畫研究室的城鄉所，自創所以來，便不乏建築背景相關的師資，在招生時亦向建築系畢業生招手。不過，我們所稱的「建築」卻並不是主流的Architecture，而是Building。這使得我們的簡稱持續在「城鄉所」與「建城所」間來回擺盪。其中的張力相當值得玩味，目前已經離職的賴仕堯老師曾在所上四十週年專刊中寫文章討論過這件事。

如今又過了十載，我們如何回應這一道題目？

對此，「城鄉所繫」或許可能是個可以考慮的答案。很榮幸「城鄉所繫」也在前述公開票選中獲得所上大多數學生認可，成為所學會新製作的關東旗旗面文字。令人發噱的是，才短短幾年，便聽聞剛入學的新生以為該旗幟是歷代流傳下來的精神象徵，讓人好氣又好笑。因此在適逢城鄉五十的現在，感謝《城鄉通訊》編輯團隊的邀稿，由我來和大家聊聊「城鄉所繫」的發展緣由。

「城鄉所繫」，第一眼看到這四個字，你會想到什麼？



▲ 人海中飄揚的「城鄉所繫」旗幟。

圖片來源：「下一代人本交通促進會」facebook粉絲專頁

R13有組實習課的同學們將這四個字跟法國歷史學家皮耶諾哈 (Pierre Nora) 所提出的「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 結合，並把「繫」的概念詮釋成「連結」；事實上，「城鄉所繫」的一部分發想靈感，確實就是回應了「記憶所繫之處」。

「記憶所繫之處」強調的是集體記憶如何映照在特定空間，而成為維繫社會認同的憑依。城鄉所自然無法與這樣的討論切割，因為空間與社會的辯證與分析，始終是我們標榜的招牌。值得一提的是，法文的Lieu de mémoire在進入到漢字文化圈中後，翻譯有不少版本，諸如「記憶之地」、「記憶場所」，而「記憶所繫之處」是臺灣譯本的名稱，這賦予了這個概念更高的文學價值，也才有機會成為「城鄉所繫」的靈感來源之一。

不過，這四個字才沒有這麼簡單。應該不需要特別強調，明眼人都會發現「城鄉所繫」中藏著「城鄉所」三個字。城鄉所師生以熱衷投入公共事務聞名，臺大

校園也不時有學生公開集結、對特定議題挺身表態的集會。「城鄉所繫」作為旗幟，其實意在含納、而非排除「我們反對」的義憤填膺，同時作為對外的明確主張。「我們站出來，因為這個議題是城鄉之所繫；我們站出來，我們是城鄉所，這是城鄉所的旗幟！」

部分人覺得「城鄉所繫」不夠直觀，認為「繫」字多餘。然而，我倒認為多了這個字，非但不影響旗幟對城鄉所的代表性，反而使其不純然只代表城鄉所這個學術單位。在街頭上，看到「城鄉所繫」旗幟揮舞，這代表城鄉所的出席；因為這面旗是由城鄉所「繫」上的，這件事是維繫城／鄉與社會的重要課題，這件事是城鄉所師生的「心之所繫」——「城鄉所繫」其實也回應了「心之所繫」。

比起純粹的校系名稱（如「台大社會」），這面旗幟也是種價值的展現，而能夠連結回城鄉所的專業與實踐；況且，全臺灣也就這麼一個城鄉所。誠如「記憶所繫之處」連結了群體、記憶與空間，「城鄉所繫」繼承、並進一步整合了這些概念；同時，也將這些或抽象、或具體，或物質、或象徵的something拉回城鄉所自身。「城鄉所繫」，正是「城鄉所之所繫」。

拉回來到「城鄉所繫」，我們可以從字義上進一步拆解。

首先，「繫」字兼具動詞與名詞的詞性，並有「連結」、「糾纏」、「綑綁」、「懸掛」、「固定」等不同意涵，可以指前述動作的本身，也可以是動作的結果或意圖；因而得以回應聚落、建築和地景之間的關係。「繫」自帶的多義辯證也能回應城鄉

所近年由王志弘老師領頭的基礎設施研究，成為一種樞紐(hub)的概念，是為STS研究領域面對結構觀與網絡觀兩種認識論觀點的交集；亦有論者將其連結至Tim Ingold的meshwork(團絡、網織)概念。甚至進一步說，「繫」的「維繫」意涵也有機會引申為照護、永續與韌性等當前城鄉議題的關鍵概念。

其次，「城鄉」二字同時具有分而視為兩個主體的「城」與「鄉」、同一環境整體的「城鄉」，以及概念相生相對的「城／鄉」三種不同解釋。更別提「所」字除了作為虛詞之外，也表被動的狀態。這使得「城鄉所繫」的各項概念排列組合下，有機會充分回應那個「捨Architecture取Building」的城鄉所，那個兼容甲組都計、乙組建築、丙組地景與丁組其他的城鄉所；因為我們並不把建築視為結果，也並不在這一前提下獨尊建築，而是把空間放入環境、社會與政治的場域中，在不同尺度與觀點間切換視角，做一個「專業通才」。因而「城鄉所繫」能成為「城／鄉之所繫」，我們看見「城鄉」作為「記憶所繫之處」的價值，也將建成環境視作「城與鄉之所繫」。

後來，所上也以帆布為材質，製作一面印有「城鄉所繫」字樣、搭上城鄉所徽作為背景以及城鄉所英文全稱的旗幟，懸掛在工學院綜合大樓面向心理系南館側的出入口處。此舉打開了這四個字全新的可能性。在城鄉所即將遷至工綜一至三樓之際，這面旗幟意外成為劃定領域的界碑；也才讓我反過來意會到，「城鄉所繫」四字刻意保留的文學性，使它成為一種邊界物(boundary object)，能夠凝聚不同想法，為過路人保留各自



▲ 在街頭上，看到「城鄉所繫」旗幟揮舞，這代表城鄉所的出席。圖片來源：「公館圓環守環行動」facebook粉絲專頁的解讀。部分師生在面對過往邊陲而奔放的公館樓即將被校方收回，被迫遷移至校園中心的工學院綜合大樓時，感到悲憤與無力，擔心這將箝害城鄉所的主體與性格，好在至少未來有個張狂地宣示地盤的「城鄉所繫之」，在臺大校園裡。

最後，這四個字的墨寶出自我的侄子，當時就讀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碩士班的林宏翰之手。一開始其實請他寫了兩個版本，一是「城鄉所系」、二是「城鄉所繫」，後來選用前者的「城」字以及後者的「鄉所繫」三字，拼湊成現在大家看到的「城鄉所繫」。事實上，我一開始私心是希望四個字能寫作「城鄉所系」，因為「系」與「繫」的意思基本相通，在簡體字裡甚至後者寫作前者，城鄉所也確有發展大學部或學院的意圖，「城鄉所系」反而才能表示這一層涵義。不過，因為臺灣人依舊傾向將兩者視為不同字詞，加上成立大學部或自立學院這兩件事在過往所務發展史上均受限於當時的客觀條件而未能實現，就暫且在維護前面提及那些我認為更重要意涵的情況下，而被我捨棄掉了。或許未來某天，條



▲ 工綜館外的「城鄉所繫」旗幟，旗幟意外成為劃定領域的界碑。

後記

在這波城鄉五十的活動中，籌備許久的Podcast也即將問世。專屬於城鄉所的節目名稱定為「空間就是」，同樣由我所發想。「空間」自然是城鄉所的核心關懷，但這個看似話沒說完的懸念，其實是致敬畢恒達老師的「空間三部曲」：《空間就是權力》、《空間就是性別》和《空間就是想像力》，以及康旻杰老師的「藝術介入…」課程。

空間無處不在、也無所不包，與本所相關的領域與空間能有各種排列組合的對話，因此「空間就是」作為節目名稱將能突顯空間的特殊性，並便於與不同主題、企劃相結合，具備高度彈性。換言之，我們刻意在節目名稱中創造一個「空間」，那可以被視為空缺，實則具無限可能的留白。空間不是一個靜止的容器，而是一個永遠在生成中、由社會關係不斷折疊重組的動態過程。

在非正式的場合中，由部分學生自主發起經營的Instagram帳號「城鄉擋一根」(@ntu_bp)或許也值得一提；這名稱同樣由筆者所發想。這個帳號一方面回應所上學生慣用社群媒體的變遷，也是一個網路文化的見證。成立初期，這個帳號發布不少以城鄉所內梗製作而成的迷因梗圖(meme)，後期也成為響應並協助推播部分同學行動的平台。

至於名稱，則回應了前述這個社群的隨意性——是源自某次聚會。當時的場景發生在公館樓，由於位於校園邊陲位置，幾位癮君子得以肆無忌憚在頂樓天台「呼吸新鮮空氣」。談笑間，眾人聊起了時下由衛福部管制風味菸(俗稱「涼菸」)的政策。其理由是此舉將減損菸品的順口度，使人較不容易在吸食後上癮。這當然是相當荒謬的理由，然而在民間團體的提倡下，卻成為現實。

城鄉所有意無意的吸納進有意挑戰體制者，而面對此幾成定局的政策，在缺乏施力點的情況下，也難以發展成為大規模的請願行動以反制。然而私下的笑罵自然是少不了的，取「城鄉」諧音的「橙香涼菸」便成為代表物之一。加之以菸友間的默契「擋一根」，便成為新的象徵。





▲ 成果發表會大合照（來源：鹽巴工作站）



▲ 行動小組寒假期間於公館樓先行試作（來源：黃仲崎）



▲ 工作坊前一日的前置作業（來源：黃仲崎）

馬太鞍溪流域 周邊部落立體地圖製作工作

◎ 撰稿：紀懷超 | 審閱：曾曉渝

由Fata'an部落、阿美族跨部落青年聯盟主辦的立體地圖工作坊，在2月27日—3月1日的連假在花蓮糖廠舉行。這次為期三天的工作坊，除了參與製作的成員來自馬太鞍溪流域的各部落外，也匯集了許多關心本次議題的行動者。期許在災後重建工作陸續展開的同時，透過親手操作模型，一同更認識這片土地的樣貌，不只在描繪地圖中，促進跨世代的傳承，也對於未來生活環境有更進一步的想像。

從事前籌備到齊聚一堂

Fata'an部落的Iwan曾說道，模型除了能夠一目了然看出水流的方向外，同時也是呈現遷移史的好工具。因工作坊的參與者來自Fata'an鄰近的各部落，模型也提供了一個平台，讓彼此都能互相指認及協助將來土地議題的討論。

這次工作坊的協辦，還包括國科會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發展平台、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阿美族知識研究中心，而城

鄉所馬太鞍堰塞湖災後行動小組，則擔任助教的角色，參與課程規劃、帶領成員製作。在工作坊一個多月前，小組成員與Fata'an部落、及有豐富模型製作經驗的官大偉老師，就開始密集討論細節，包括如何框選範圍、如何兼顧成本同時精準呈現地形，都是必須考量的要素。即使城鄉所學生對於模型相對熟悉，但要符合在地使用需求，並讓與會的每個人都能享受其中，並非容易之事。



▲左：由馬太鞍在地部落族人貼上自己部落的名牌（來源：「島嶼原起」團隊）

「承擔重任」：透過模型團結彼此

「今天我們不是來辦活動，我們是來承擔。」第一天早上的開場儀式，Fata'an部落青年總幹事張志雄便語重心長地說道。在許多部落長輩、耆老的見證之下，來自各部落的成員們，一同許諾會齊心協力承擔重建家園的重任。大家各自貼上自己部落的名牌，並象徵性地放上土和石頭，完成特別的剪綵儀式。三天當中，主持人Iwan更不斷強調，要讓每個人都發表到想法。秉持阿美族傳統的精神，從自我介紹開始，學員、工作人員、老師，都一同圍成大圈圈，逐一拿起麥克風說話，感受到團結的氣氛。

對行動小組成員來說，製作上最困難之處在於須同時呈現高地與低地的落差，因而準備不同的珍珠板材，拼出從中央山脈到市區、再到海岸山脈高達2500公尺以上的落差。也為了凸顯堰塞湖災害中水流的去向，選擇用略為變形的厚度來呈現低地的地勢。行動小組成員與黃舒楣老師高階實習課程的學生，在前一天就事先到現場描圖、黏貼，以



▲第一天上午課程（來源：「島嶼原起」團隊）

確保成員的工作量能在預期的時間內完成。

第一天下午，成員分為三組開始珍珠板的切割工作，大家無不聚精會神，拿起美工刀俐落地切好每一層等高線。令主辦單位和助教們皆出乎意料的是，經歷一個下午，所有人就成功拼起超過數百層的模型，壯麗的地形便出現在大桌時，全場不約而同地歡呼，當下的成就感不言而喻。

暫停手邊工作，深度走訪Fata'an

為期三天的工作坊，並不僅僅全力投注在模型的製作上，第二天早上Fata'an部落也安排了精心規劃的走讀活動，大家依序走訪了大馬天主堂、馬太鞍豐羽館、光復國小、馬太鞍教會、第一公墓、Fata'an部落納骨碑、佛祖街，並邀請當地重要人士進行解說。其中，好幾位講者都描述起了洪水來臨當天驚險的逃難過程，說到當天寧靜的午後，突然聽到水與石頭沖刷的聲音，沒過多久家園就已經被吞噬。在許多地方，牆上也都還遺留著當時的水痕，極為怵目驚心。



▲製作流程：依序為切割→黏貼→批土→上色（來源：鹽巴工作站）



▲佛祖街「拖鞋阿公」(來源:鹽巴工作站)

面對災害及重建之路,傳統知識能不能帶來啟示?多位世居部落的居民,都提起了過往長輩曾說道,馬太鞍終有一天災難會再次來臨,而此時應該要怎麼做準備、往哪邊跑,都印證了災害的發生並非偶然,而是生活在土地上應當面對的課題。災後媒體爭相採訪的佛祖街「拖鞋阿公」,直白地說道「怕死就會有勇氣逃命」,表示這次在災前3天就知道有生命危險,縣府卻沒緊急撤離,但在政府失能之下,仍要展現天助自助者的韌性。大家看見一旁的保安寺在災後被淹沒,知道信仰中心遭沖毀無疑是心理上很大的衝擊,但縱使艱難,居民們仍堅定地互相攜手投入重建工作。

模型作為文化傳承的見證

經歷切割、黏貼、批土、上色後,第三天早上終於來到標註地名的環節,這也是作為參與式工作坊最重要的環節。不同於前幾天的分組,所有與會成員齊聚在同張大桌前,打開Google地圖討論「哪裡是重要地標?」、「地名的族語名稱怎麼寫?」,細心地指認每個地點、插上小旗子、拉出線條,紛紛呼喊著「我家在這!」。



▲黃舒楣老師說明水利工程與河道變遷之關聯



▲標註地名與重要地標

成果發表會上,大馬村村長Kapa' Looh (王梓安)中氣十足地拿起麥克風率先發言,從馬太鞍的起源地Cacora' an開始,一一講述高山到平地每處的地名。而後,在黃舒楣老師補充說明下,大家也再次理解,當時左岸的堤防建設如何影響河道變遷,進一步讓水流更容易影響右岸的Atomo (阿陶莫)、Kalotongan (加里洞)等部落。未來這座模型也將存放於災後重建團體鹽巴工作站,供各部落需要時借用。

結語:災害下人的韌性

回顧整場工作坊,行動小組成員在規劃三天的課程時,並未排定嚴謹的標準作業程序,而保留臨機應變的彈性,嘗試和與會成員共學共作。在邊做邊聊天的過程中,大家都認

識了不少新朋友。其中,不少與會成員都是來自當地的高中、大學生,發表會上他們也都提到了想在家鄉有難時盡一份心力的心情,令人敬佩。

最後,本次工作坊的另一個目的,便是提供關心馬太鞍溪災後重建的專家學者,一個可以互相討論、交流的場合。三天之中,老師們與部落青年、到場的民代,隨時都持續在場邊討論未來各項會議上的意見整合。而對參與此次工作坊的城鄉所師生來說,能利用所學為災區工作盡一份心力,實屬寶貴的經驗,更重要的是,也藉此看見災害下人的韌性和無論如何都要從原地再站起的精神。

BP's Picks

城鄉所靈感清單

每一期我們將邀請受訪老師與校友跟我們分享最近的靈感來源，也許是一本書、一部電影、一首歌，又或是一個展覽。

◎ 撰稿：曾曉渝、紀懷超、張維哲



彭立沛老師

康旻杰老師

李易安學長

于欣可學長

李易安學長

❶ 《安第斯山脈的生與死：追尋土匪、英雄和革命者的足跡》

◻ 非虛構作品

作者：金·麥誇里 (Kim MacQuarrie)

「它沒什麼了不起的大道理，只是用奇特的視角，呈現出南美幾個議題的複雜性——文字平實，但後勁很強。作者會把自己的遊記或是他自己採訪的材料跟歷史故事這兩條線交纏在一起。」

❷ 《跳舞的熊》 | 作者：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 (Witold Szablowski)

◻ 報導文學

「作者把被解救卻不知如何適應自由生活的熊，和東歐共產體制解體後的人們放在一起談。這是一個天才！那種交叉的感覺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❸ 《埃及的革命考古學》 | 作者：何偉 (Peter Hessler)

◻ 報導文學

「作者把很多中國的經驗跟養分帶到埃及，他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視角。他談伊斯蘭社會女性對於內衣的想像，再把中國這個因素拉進來。你可以看到中國商人怎麼在世界各地拓展。」

彭立沛老師

❶ 《台日關係史(1945-2020)》

◻ 歷史

作者：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

❷ 《從邊緣到核心：台灣半導體如何成為世界的心臟》

◻ 財經

作者：史欽泰、陳添枝、吳淑敏

康旻杰老師

❶ 《弟弟》 | 作者：陳慧

◻ 小說

「剛讀完這本小說。所上有些香港學生或曾經歷過去十年香港變化的研究者可能會特別有感。我又正好有個年輕的香港朋友和書中的弟弟同名，也同樣有種弟弟角色的體貼、純淨但憂鬱、複雜的性格，乃至讀的過程一直帶入個人的聯想。(弟弟，都還好嗎?) 這本書關於一座回不去的城市，但也寫一個「後」香港的時代。故事收在一個絕望卻曖昧的結局，當然香港還在，生活繼續，但少了魂的弟弟讓城市變蒼白。姊姊的視角，即使抽離了特定的時代和空間，情節依然立體、真實，卻讓人更想從弟弟的創傷，近身反看那些年輕人一起在街頭撐過活過的香港。」

❷ 《穿越地獄之門》

◻ 電影

導演：奧利佛·勒賽 (Oliver Laxe)

「這部電影我不能也不想透露太多，必須／應該在電影院看，但千萬不要先知道劇情。觀看時，我不自主用手捂住嘴好幾次，真正的horror, horror, 但不是恐怖片。它讓一個理性如我者，彷彿體驗了trance的舞感。」

❶ 《水泥烏托邦：末日浩劫》

◻ 電影

導演：嚴泰華

「這部電影完美的替我解釋了我的博士論文的前半段核心提問: "how tough choices are made in complex situations, who gets a say, and who gets left out for the 'public interests'." 不過這類末日場景，跟我們當前的地球環境跟都市不是很類似嗎？全球氣候變遷下，做決定異常困難，每一個決定後面的結果你難以預測，公共利益、道德難題、誰該被拋棄以保全大局，這些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超級大難題。但話說回來，誰又有權力為誰做決定呢？」

❷ 《看不見的城市》

◻ 小說

作者：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馬可波羅對忽必烈如此描述虛構城市 Tamara:『你喜歡一座城，不在於它有七種或七十種奇景，而在於它對你的問題所提示的答案。或者在於它迫你回答的問題。』但只有當你帶著個人的生命問題走進這裡，這座城才有意義。它不再只是理論堆砌，而是一面映照出你對空間實踐、社會關懷最深層渴望的鏡子。」